我不允许你独自旅行

马嘉骊 / 著



我感恩这不知来自何处的运气，让我一路遇见好人；
战火夺去他们的家园和亲人，却不曾摧毁这份本真的善良。

爸爸常说，女儿，一样米养百样人，这样的好人你以后还会遇到很多。
关键是，不轻易落泪。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我不允许你独自旅行

作者：马嘉骊

ISBN：978750868293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HAPTER 1 中东奇遇

埃及/约旦/以色列




耶路撒冷街头

开罗，奇迹之都

2011年初，我突发奇想，要去以色列看一眼。得知在国内办理以色列签证不易，又听说在埃及的办理难度相对低很多。带着实习挣来的不多的积蓄，我到了埃及首都开罗。

当时入住的青年旅舍位于解放广场一侧，地段极好。解放广场在开罗市中心的心脏地带，毗邻尼罗河，埃及国家博物馆、埃及中央政府大厦、开罗美国大学等都在步行范围内。作为各类游行示威的固定场所，它如同埃及政治的晴雨表。

一日早上，我被楼下震天的喊声吵醒，跑去阳台一看，发现楼下聚集了乌泱泱的人群，他们正在示威。从没见过这阵仗的我既好奇又害怕，只敢趴在阳台观摩，看那蚂蚁般大小的人儿举着标语高喊。

一会儿，同宿舍的韩国女孩萨拉回来了。我挑起话题，“他们疯了吧”，想博得认同。



呐喊的方式多种多样

没想到此前少言寡语的她竟认真地纠正我：“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疯了’。他们只是在提出诉求，这是他们的政治自由，而我尊重他们表达诉求的方式。”

她的解读让我的言论显得无知和浅薄，也让我当即决定下楼走进集会圈子里，去了解他们的诉求。

广场上，有老人在孙子的额头上系了标语，小小的孩子跳上了车辆，高举着他看不懂的横幅，老人则因为体力不支，坐在椅子上高声呼喊着。有看似温文尔雅的中年人突然脱下鞋子，去拍打手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画像，还有人烧起了埃及国旗，被身边愤怒的人群齐声制止，更多的群众则是高举着国旗在呐喊。

渐渐地，有愤怒的老年人上前来向我控诉，手里握着一张印有人像的报纸。身旁有好心人来为我翻译，说报上图中的人是老人的儿子，他因为加入反穆巴拉克团体而被处死。也许是错把我当成记者，也许是希望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多关心埃及局势，向我控诉的人越来越多。有控诉国家银行吞钱不吐的，有控诉国民经济衰退的，也有控诉国家经济结构存在极大缺陷、自己读完了研究生却不如本科生就业前景乐观的。还有认为国家政治体制僵化、人权遭受侵犯的，有认为埃及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不透明的，有抗议政府腐败又不思改革的。尽管每张嘴说出的理由和境况各不相同，但诉求却是极统一的：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渴望一个更民主的新政府。





在埃及旅行的时日里，我感受到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又在民间看到截然相左的国家认同观念，于是我问那位渴望民主

政府的路人：“新政府做到了你要的民主，就能实现人民有权利选择并监督政府，就能解决就业、贫困、经济结构等问题吗？”对方思忖一番，答：“不尽然，但起码我们清楚穆巴拉克政府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这一头，我认真地倾听着偶尔夹杂英语的陌生人的控诉，尝试厘清内容；那一头，竟有青年人过来找我合照。

这些青年人无论在前一秒有多么愤怒，总能在见了我之后，露出一副“哟，外国女生”的讶异模样，嬉皮笑脸地提出合照请求。自拍过后，他们又能马上恢复愤慨，走回那支震怒的队伍里。

这让我想起在埃及最大的市场罕哈利利市场里的一幕：我和萨拉正走马观花地逛着店铺，一位埃及男店主晃动手中的玻璃球，问：“只卖10美元，要吗？”我摇头，拉着萨拉要走。对方又说：“1美元，你拿去吧。”我还是摇头。对方不罢休，“给我一个吻，这个免费送你。”我和萨拉只笑，还是不要。店主哭丧着脸，指着地面问我：“你看到了吗？”我扫视一圈，地上什么都没有，便问：“看到什么？”他捂着胸口道：“我破碎的心啊。”埃及男性的搭讪功力可见一斑。

再后来，我与萨拉买了一元一枚的假银戒指，戴在无名指，遇着搭讪，就说自己已婚。若是遇到脸皮更厚的人说“那你还需要一个埃及老公”，我们便装出着急的模样，说“我的孩子在旅馆等着我回去喂奶”。此法万试万灵，对方听了掉头就走。



午后3时，刚刚还在游行的人群齐齐礼拜



午后3时，刚刚还在游行的人群齐齐礼拜

经历了这个合照插曲，我才观察起现场的女性参与度来。悲哀的是，整个解放广场的革命现场几乎没有当地女性，只有记者和游客模样的外国女性穿插其中。我去问身旁会英语的路人，为何不见当地女性身影。他扑哧笑出来：“埃及女性？她们能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但不能来参加革命，因为女性是不会成为领导者的。”

午后3时，到了晡礼时分，宣礼楼的喇叭开始唤礼。只见先前还散于各处的乱糟糟的人群，在听到喇叭发出的经乐时，都迅速聚到了广场中央，集体朝着克尔白的方向跪拜。完全不需约定，是信仰的力量把人们此刻的行动变得如此一致。

这场让我感受复杂的革命，成了“阿拉伯之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突尼斯发起“茉莉花革命”带来国内政权更迭后，这股情绪迅速

蔓延到了其他文化、语言和社会背景相似的阿拉伯国家，而埃及正是第二个受此影响发起革命的国度。

那之后几天，我独自前往埃及南部的卢克索等城市，就在我沉醉于尼罗河的日出日落时，有卢克索人告诉我，在开罗的革命已不再温和，反政府的活动形式从最初的集会和游行，已发展到罢工、示威和骚乱，有人放火焚烧了政府大楼，有人朝政府车辆扔火球，参与抗议的人已达百万之多，有人在混乱中被开枪打死，情形十分激烈。

卢克索的街头闲逸依旧，身在这里，倒是丝毫体会不到那股来自开罗的热潮。一天，我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正在街头慢悠悠地前行，遇到一位主动问好的埃及青年。他很有礼貌地说，自己的妹妹很希望结识外国人，问我可否同他回家拜访他妹妹。见我犹豫，他说，家就在河对岸的村落里，如果我到了村口不愿意进去，大可乘船回来。那是大白天，我见渡河的船夫向青年问好，态度平静，便相信青年是住在附近的人。

跟他进村到了家，他的妹妹迎上来抱住我，弟弟则羞赧地躲在屋角。他的家由土坍砖砌成，家里除了木质长椅和书架外几乎没有家具，更不要说电器。他的父母非常开心，母亲跑到后院去抓了一只鸽子，我怕给人家添负担，连忙说我已用过餐。但他母亲执意要给我做饭，我只好请她不要杀鸽子。

菜上桌后，丰盛得叫我傻了眼：四块面包、两个馕、一碟鹰嘴豆、一大砂锅的炒鸡蛋配着小碟的孜然粉、酸萝卜和中东奶酪。当然，更叫我傻眼的，是随盘配上了一把生的油麦菜。

为了不辜负心意，我把大部分的食物都吃完了，最后还学着他妈妈的样子，把生蔬菜也吞了下去。见我下咽的表情难看，他们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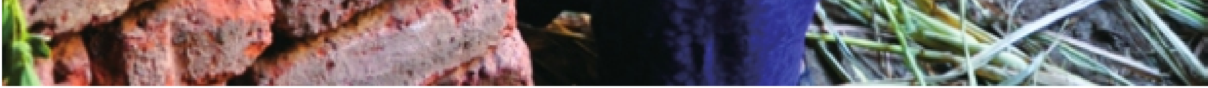
我：“难道中国没有这种蔬菜吗？”我只好笑笑，不说话。

这家人好可爱，待我用完餐后，母亲和姑姑串了几户邻居，借齐了工具，要给我化个埃及妆。

离开他家时，我把随身带着的笔和记事本送给弟弟和妹妹，还在看了弟弟用我手机拍的照片后，给他写了张英文小字条：“你有成为摄影师的潜质呢！”希望他有天会看懂。

当我再回到开罗时，埃及政坛已是另一重天。穆巴拉克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了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站在金字塔之巅30年的他，一定料想不到被民众推翻的这天，就连地铁站里的穆巴拉克人像也像他手中的权力那样轰然坍塌。





她激动地抓起家里唯一的一只鸽子



换了一身埃及装束

那时的我已经在埃及旅行了数周，再回到开罗，所有的景物都已不再新奇，就连楼下那家曾叫我流连忘返的比萨店也去腻了。于是心里想着，是时候前往以色列了。

在开罗，我请路人把以色列大使馆的地址用阿拉伯文写在纸上，带上它一路咨询，走一段，又搭一段顺风车，总算到了。还未走近，便遥遥望见使馆门前警察聚集，荷枪实弹，异常肃穆。

黑衣警察看见我，使劲摆手喊：“闭馆了闭馆了！”一问才知，以色列驻某国的大使馆受到袭击，开罗的以色列大使馆未雨绸缪，闭馆以加强安保。

我当即决定前往约旦拿以色列签证。约旦签证办理容易，递交翌日便可下签。

在旅舍认识的韩国女孩萨拉与我在开罗同游数日，结下颇深情谊。她陪我买到了当晚7点从开罗开往边境港口“牛尾巴”的车票。Nuweiba谐音“牛尾巴”，是埃及东面的一个小镇，从这里的港口可驶往对岸的约旦。抵达“牛尾巴”后，我还需要买船票，才能乘船前往约旦。

离开前的那晚，我在旅馆与萨拉唠家常。突然，她推推我：“不早了，我替你感到时间紧张。”

我抬手看表，6点45分，离发车时间只剩下15分钟，而我还要从旅舍搭出租车去车站，心中不免也咯噔一下。

萨拉为我拦了出租车，一把将我塞进车里，挥手冲我喊：“Carrie，我在开罗等你回来！”

顾不得伤感，我捏着车票问出租车司机：“你觉得能赶上吗？”

司机瞅了一眼车票，耸了耸肩，明确表示：小姐，你没戏了。

这位司机一路横冲直撞，将车子开上绿化带，让我过了一把电影大片的瘾。尽管如此，到达车站时已是7点半了。

我背着背囊，一路冲进出发大厅。距安检机器仍有几步之遥时，我把背囊一把抛过去，又在安检机器那头把背囊拽出来，疯子一般。

偌大的候车室，只剩一辆准备出发的长途车。我拉着一位工作人员，近乎绝望地问：“去约旦的车开走了吗？”

“早就开走了。”

那一刹，我的泪流不出来，又恨自己没有时间观念，挤不出一个恰当的表情。

他好心拉来一位司机，叫我跟司机交流。还怎么交流，车都开走了。

司机拍拍我："你现在马上坐出租车去'妈妈啦'车站追那辆大巴；如果你到了'妈妈啦'车站，发现车已开走，那就等我的车，我要前往的城市，离'牛尾巴'很近，你下车后再换车去'牛尾巴'。"

听了这话，我却迈不开脚步，也许是觉得坐出租车追一辆已发车的巴士这种做法太过滑稽。司机打量我一下，又回头凝视一眼正等着他发车的满车乘客，呼出一口气，似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说，走吧，我帮你找出租车。

我似乎一下子就有了底气，跟着大巴司机走了十几分钟。他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还帮我砍价，嘱咐司机一堆事项后，把我送上了出租车。

抵达"妈妈啦"车站，已是晚上8时。我不抱希望地问车站工作人员，前往约旦的大巴开走了吗?

人家笑："还没开来呢！"

5分钟后，我乐颠颠地登上了期待中的大巴车。

也许是巴士在路上还要停车载客，也许是交通阻塞导致巴士晚点，也许是老天爷施法将巴士冻住了一会儿……反正，我搭一辆出租车追上了一辆开出1小时的大巴这件事，是真切地发生了。此等事情，恐怕也只会发生在开罗。

反正开罗又名"奇迹之都"嘛。



韩国女孩萨拉带着折纸，为随时可见到的埃及小朋友折纸鹤

与码头同眠

作为开往“牛尾巴”的大巴车上唯一的外国人，我备受照料。行车途中，阿拉伯男人们聊至兴起，站起来大声说笑时，会偷偷地瞄我一眼，生怕他们的声音吵到我。只要我觉得冷，扯一扯披在身上的外套，必定会有人帮我调整头顶空调的温度。

夜间10点，车停了。我一激动，以为到了“牛尾巴”，收拾背囊准备下车。前座一个戴着帽子的男子告诉我，只是停车休息而已，乘客可以下车吃东西和上厕所。

车上的人几乎都下去了，我没动，披着外套看窗外的漆黑大漠。

戴帽男子上车来，递给我一瓶可乐，并告诉我，很快就能到终点站“牛尾巴”了。

巴士终在午夜时分抵达，我却被告知码头并不通宵开放，驶往约旦的客船要次日一早才开始售票。为省钱，我决定在候船大厅睡一夜。

一走进满是阿拉伯男人的候船大厅，挑逗的口哨声四起。放眼望去，人们横躺在深棕色的木质长椅上，整个大厅杂乱而闷热。我找了一处稍显干净的位置坐下，一个敲着铜锣大喊“咖啡——茶——咖啡——茶”的男人朝我走来。

“砰！”他敲了一下铜锣，问我：“茶？”我摇头。“砰！”铜锣又响了一声：“咖啡？”我再次厌恶地摇头。埃及精明狡猾的小商贩多如牛毛，我早已被锤炼得麻木。

他却不走，依然对着我说话，表情还挺着急。见我实在听不懂，他拉来一位警察。

两人交流几句后，警察对我命令道："跟我走。"

我只好无奈地起身跟他走，也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

走出候船大厅，警察领我走近邻栋建筑。只见他掏出身上的钥匙，打开了一扇飘着漆香的木门，一个崭新的候船大厅渐现眼前。这里还未对外开放，刚髹漆的外墙颜色灿白，地板净亮，座椅宽大，风扇叶片不见一丝积尘，与刚才的候船大厅可谓天壤之别。警察嘱咐我在这休息。我还来不及同他道谢，他就走开了。

我有点不安，抱着背囊不知该睡在哪。恰在这时，大巴上认识的戴帽男子走了进来。

他择位而坐，毫不见外地聊起自己的人生往昔。聊天时，我的余光瞥见一个矮个男子在窗外扒头探脑，窥视着我们。

戴帽男子说，他以前是名歌手，常四处商演，后来遇见了现在的妻子，婚后有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到来，让他的歌唱生涯戛然而止。

他诗意地说："有了孩子，取而代之的是换不尽的纸尿片和午夜爆发的啼哭，我的生活里就再也没有歌唱了。"他露出无奈的笑。

那时的我年纪小脑子笨，问他："那你后悔有孩子吗？"

"后悔？有孩子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后悔？"说完这句，我们陷入沉默，而后他自顾自地唱起歌来。

空旷的候船大厅里只有我和他。他唱的是阿拉伯语歌曲，我一个字都听不懂，音律成了共同的语言。他的歌声浑厚悠扬，像“牛尾巴”码头湿润的空气一般，包裹了一张又一张的长椅，拂过了一把又一把的转扇。

那是多年后，我依然能够回忆起的场景。陌生人、善意、奇遇等要素的齐聚，让它看起来充满了旅行的意味。

怕打扰我休息，他并没停留太久。极度疲劳的我，在他走出候船大厅后，立马便把背囊放倒作枕，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因为总能感觉到窗外有偷窥的男子走进候船大厅，我醒来好几回。他每次走近，看我几眼便离开。但每次他的脚步声趋近，我都伸手去握身下的小刀。

第二天一早，这男子把我推醒。

一看才5点，我气得吼他，问他有什么意图，将我的词汇表里有限的肮脏恶毒词汇，全朝他砸过去。

他本冲我叽里呱啦地、接近嚷叫地解释着，但见解释一会儿后我依旧这般愤怒，知道自己说不清楚，便低头沉默。思考了一会儿，他抬起手来，双臂闭合，忽而展开，模仿售票处的格局，嘴里重复着一个词：“船。”

他竟是提醒我，售票处开门了。而他夜里进来好几回，是特意来察看我的安危。

那一瞬间，连夜的误会都烟消云散，我被感动得无以复加。

我不知如何回报，在背囊里一番乱掏，掏出一盒清凉油，塞在他手里。他却使劲地摆手：“我们是朋友，朋友！”

这份朴实的情谊叫我羞愧。单纯的人，我哪曾把你视作朋友。我以为你心怀不轨，连对付你的小刀都备好了。

还没走到售票处，我就被排队的长龙吓坏了。穿着白色长袍的阿拉伯男人，从售票处一直排到了港口外，售票窗口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圈人。

这时，售票处的门被拉开，一名白衣男子探身出来，冲着队伍说了一番话。话音落下，我眼前排着队的人群居然悄无声息地分成了两排，中间腾出一条通道，身旁的人示意我从这里走到队伍最前方去。

刚走到队伍前头，办公室里的白衣男子又说了一番话，只见阿拉伯男人们一拥而上，把护照叠放在一起，此时我身边的人把我手中的护照取走，“啪”的一下，叠在一沓护照的最上方。如此一番，作为最迟排队的人，我居然成为买到船票的第一人。

后来才知道，埃及很多景区都实行外国人优先排队、购票的政策，以彰显对他国游客的友好。如今每每看到舆论热议外籍友人在中国享受优先待遇，我就想起多年前自己在埃及受到的这番礼遇，深明作为一个言语不通的旅者，在异国他乡受到优待时，心中是多么地感激。

我的约旦父亲，阿拉法特

在埃及，我曾有几次向穆斯林女人问路的经历。被问及的穆斯林女人们不是匆匆转头走开，就是对我怒目而视，更有一位穆斯林母亲见我向她走去，竟拉着儿子转身就跑。途中她的儿子转头看我，被她恶狠狠地一把拧回去，我真想上前看看那头被拧坏了没。

尽管我没拿地图，也没带相机，但我那没遵循当地习惯包裹起来的身体线条和来回观望的好奇眼神已暴露了我的游客身份。在埃及女人看来，独旅的女性似乎是不守妇道的洪水猛兽。若无必要，我自然不去与埃及女人打交道。

登船后，船舱里坐着一溜的阿拉伯大爷，船行数小时，若我一个女孩独自坐在他们身旁，肯定招人耳语。再试图另寻座位，只见五位结伴而坐的穆斯林女人旁边，仍留有一个空座。我干脆豁出去，坐在她们身旁。

埃及女人果然没让我闲着，但这次居然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开船不到10分钟，身旁的女人忽地递来一块牛肉馅饼，我刚接过，对方又递来锡纸包裹的烧茄子，不一会儿，拿着面包的手又伸向我。我摆着手说吃不下了，她们却依然给我递着一样又一样的食物。实在招架不住这番热情，我的胃被填得满满的。

欧美地区游客前往约旦旅行可拿落地签，因此在我们乘坐的船只上设置了出入境办事处。在船上的几个小时里，我逛来逛去，和几位签证人员混熟了。

客船在约旦会停几次，第一站是小城佩特拉的码头。签证人员都知道我要在佩特拉下船，于是在船停时，好几人满船找我，提醒我该下船了。

下船后发现，欧洲游客都留在船上办签证，只有我一人下来了。本计划好与欧洲游客一块打车前往佩特拉城区，此刻也只能想别的办法。此时，在船上见到过的一位导游说，他在佩特拉带西班牙旅行团，他们乘坐的旅游大巴可以把我带上，至于价格，导游让我和司机商量。只见司机两手十指交叉思考后说："10约旦币。"导游见我犹豫，帮着我说："学生出游，省钱至上，可否便宜一点？"司机见状毫不犹豫地把价格减至5约旦币。

一下就减了一半，似乎意味着开价过高。一路上，导游都在为满车乘客细心地解说，我却半句都没听进去，仍在想着我付出的5约旦币，不知自己是否被导游和司机联合坑了。

就在大巴车快抵达旅行团下榻的酒店时，我才想起自己连旅馆都没预订，无奈之下，翻出包来找资料。此次出行仅带了一本孤独星球出版的《埃及》，随书附赠两页约旦住宿信息。这两页信息可是帮了大忙，我指着最便宜的那家旅馆，告诉司机那是目的地。

司机把西班牙游客送抵酒店后，载着我，一路问人，总算找到了那家单人间只收10约旦币的小旅社。下车前，导游和司机告诉我，他们是在帮助我，而不是专坑游客的骗子。我半信半疑地道谢后，找到旅舍负责人，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无关房价，而是"从码头搭车到这里，一般收费多少？"

对方不带犹豫地告诉我，至少40约旦币。

我再次为自己的小人之心羞愧不已。

此时细看，才发现坐在迎客桌后、样貌和善的旅馆负责人是身障人士，坐在轮椅上。问最低房价，他答是20约旦币。我一惊，问他为何贵了一倍。他无奈地解释，近几年中东物价飞涨，20约旦币已属很低的价位。

他见我犹豫，便打了个电话，挂了后对我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独自来佩特拉的中国游客，想必一路也不易。而且，看你相貌亲和，我决定帮助你。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跟我走吧，我帮你找到了15约旦币的旅舍，是我表哥经营的。请你放心，我会帮你把价压至10约旦币。"

他推着轮椅出门取车，打开车门后，通过滑板装置，将轮椅推进司机位。驾驶位经过特殊改造，没有靠椅，整个空间恰好容下他的轮椅；离合器也经过改装，常规的刹车和油门都由手旁的操纵杆来控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心情复杂，敬佩他把自己活出了肢体健全的尊严和模样，也感恩这不知来自何处的运气，让我一路遇见好人。

帮我把房价谈至10约旦币后，他离开了。而我，在住了两晚后，决定前往约旦首都安曼。

我计划上午游览安曼，下午的时间用来办理签证。在胡乱要价的司机群里，我找了一位看起来胖而憨厚的司机，上了他的车。

司机叫阿拉法特，会一点英语。我让他载我去古城区中心的古罗马剧场。

到了剧场后，我下车游览，阿拉法特一路陪着。因为身躯肥胖，他走得很吃力，却还时不时好意地问是否要给我拍照。偶尔我来了兴致让他拍照，他便步子蹒跚地踏上一层又一层的楼梯，剧场里坡度大级数高的石筑阶梯可真难为了他。我并未按导游的标准来付他钱，而

只是根据车内计价器来付车资，他大可坐在车上等我，那么下车陪伴游览自然是出自他善良的个性了。

我又让他载我去古堡，回程路上遇到堵车，他熄了火，指了指计价器，傻笑比画着，大意是等待期间会跳表，他想为我省钱。等待时间太长，他下车去买咖啡，问我喝不喝，见我摇头，还说："我请你喝，不贵，才1约旦币。"而我眼前的计价器暂停在10约旦币，这杯咖啡的价格已及车费的十分之一。种种微小细节，把阿拉法特的友善展露无遗。

他问我，下午想游览哪里。我说下午要去办理以色列签证，然后直接奔赴以色列。他很诧异："你打算拿落地签？""对啊，我的韩国朋友就是在安曼拿到了以色列的落地签。"阿拉法特直言："可你拿的是中国护照啊！"

短暂沉默后，阿拉法特给他在大使馆工作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后，让朋友跟我通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几乎以吼的方式告诉我："中国人不能拿落地签，你必须去大使馆！"

突变的情况叫我措手不及，随之而来的住宿问题也成了烦恼。

阿拉法特关切地问我，晚上住哪。我往窗外随手一指，说，在这里找家旅馆吧。他说，首都住宿贵，不如你住我家吧。

他说得那么轻描淡写，依然是那副憨厚的表情，没有笑容，认真之中却透着遮掩不住的傻劲儿。

我没有应答。

阿拉法特从裤兜里摸出钱包，指着相格里的女人和孩子说："不用担心，我有老婆孩子，你看，这是我的小儿子，这是我的大女儿，这是我的小女儿。"

见他有家室，性别这层顾忌我终于放下了，于是点了点头。阿拉法特激动不已，说这就载我回家。

开了一会儿，车行至富人区，连排的别墅和缤纷的后花园叫我傻了眼——难道阿拉法特住在这里？想起国内的出租车行业利润并不丰厚，我一边感叹国情不同命运不公，一边拿出相机。刚要拍照，阿拉法特忽然一只大手挥过来，重重地把我的相机压下，眼睛都瞪圆了："这里不许拍照！"

我惊魂未定地看着他："这不是你住的小区吗？"

他拍拍额头，哭笑不得地说："这里是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住的地方！我带你来参观而已。这里到处都有军人监视，你可千万别拍照！"他激动地比画着，双手都离开了方向盘。

车子驶离国王住所，往下坡开。阿拉法特呼出一口气，扬起手来，轻松地说："好啦，可以拍照啦！"我却只知道笑。

这回总该去他家了吧。

车往前驶，只见驶经的土路坑坑洼洼，甚至越往前开越黑暗，沿途幽深僻静得瘆人。

渐渐地，路灯完全消失了，视野里出现了漆喷的骷髅头，在满月的照射和纯白墙面的衬映下，更显阴森。阿拉法特究竟想把我载往何处，是想把我卖掉，还是真的住在这般穷困的区域？那时的我年轻又无知，不懂天高地厚，只知道去摸包里的小刀，盘算着如果情况危急，就和阿拉法特拼个你死我活。

忽然一个急刹车，阿拉法特停住了车子。从副驾驶位置看向车外，满墙的骷髅头画像，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安。阿拉法特关上车门，

掏出钱包，一摇一摆地走进一间小屋，出来时手里捏了两张纸，笑着朝我挥手，示意我跟他一起走进大门。

“那是什么？”我喊着问他，不敢走近，暗暗地握实了小刀。

“门票啊！”他一脸的热情。

我简直哭笑不得——阿拉法特带我逛动物园来了！至于满墙的骷髅头喷画，只是因为这家动物园里还经营着娱乐性质的鬼屋。

跟着他走了一路，我又叹又笑，既为自己的猜疑，也为阿拉法特不同于常人的可爱想法。这家动物园，不仅有狮子老虎，还有猫狗鸡鸭。这头是大铁屋里关着的掉毛小狗，那头是阿拉法特望着小狗，露出叹为观止的表情，叫我笑岔气。

参观完动物园，阿拉法特总算要载我回家了。车的前方有一支骆驼队，阿拉法特问我：“Carrie，你在约旦骑过骆驼吗？”见我摇头，阿拉法特一个激动，居然一脚急刹车，拍着大腿兴奋地说：“Carrie，去骑骆驼嘛！凡事都有第一次啊！”

不忍扫他兴，我只好下车走向骆驼队。还未问价格，阿拉法特就连拽带拉把我弄上了骆驼，还使劲拍了一把骆驼屁股。牵驼人扯着绳，试图把我带入后山的老林里。我看他面相不善，又意图不明，便强烈要求下骆驼。

骑了不到2分钟骆驼，一问价，30美元。不仅我，阿拉法特也愣住了。只见他开始跟骆驼队砍价，看他比画的手势，大意是，我就住这附近，你们给点面子，不要这么贵。我哪有阿拉法特的好脾气，骂人的话全都飙出口了。骆驼队的人见我生气，也不在乎，嚣张地说：“一口价，5美元。”

他们人多势众，加上天黑地处偏僻，我只好妥协说：“5美元可以，但得再让我上骆驼。”其实，遇上这群土匪，哪还有心情骑骆驼，只是这5美元给得不甘心，总不能让恶人得逞太多。

上车后，阿拉法特把钱包打开给我看，里面只剩下1约旦币。他的意思是，他想帮我付账，但实在有心无力。他的傻劲儿再一次打动我，让我那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让我去他家休息，肯定不是骗人的把戏。

车子开了10多分钟，这回总算是到家了。眼前的阿拉法特家，是一栋两层的房子，外墙崭新，刷成淡淡的鹅黄色。

我兴奋地跟着阿拉法特走进家门，却迎面碰上他那凶神恶煞的妻子。小小一方门口，我满是期待的脸、阿拉法特尴尬的脸，还有他妻子那张愤怒如狂风肆虐的脸，三张脸齐刷刷地凑在了一起。

见丈夫把我带回家，她那由于超重而挤作一团的五官被愤怒冲开。她狠狠地一把将阿拉法特拉进厨房，一面炒菜，一面劈头盖脸大骂。我在客厅对着五个可爱的小孩子发愣，而厨房里的骂声随风乱窜。我心里盘算着，可不能害惨了阿拉法特。

哄女人并不难。我把包里的东西翻出来，找出一瓶新的润手霜，走进厨房，谄笑着递向阿拉法特的妻子。

她一转头，见我手上有礼物，上一刻还在噼里啪啦的嘴忽地就安静了下来。她把润手霜接过，左看右看，冲我抿了一下嘴，冒出一句阿拉伯语的“谢谢”。

总算熬到开饭的时刻，五个小孩不喜欢吃饭，阿拉法特和他妻子也任由他们看电视去了。我独自一人面对这夫妻俩，生怕自己又害阿拉法特挨骂。

我跟阿拉法特聊起天来。我说的内容，大部分他都是听不懂的，却能理解成另一番意思，还自顾自地哈哈大笑。阿拉法特的妻子不懂英语，却也受气氛感染，跟着笑了起来。

阿拉法特给我递了一块又一块炸茄子之后，才意识到妻子不悦了，立马拿起一块炸马铃薯递给她。

这时，一直表现得不会说英语的她，说了第一句英语："No. Thank you.（不用了，谢谢。）"

我忍着没笑，继续看戏。阿拉法特胆怯，看着妻子，冲口说出一句"I love you（我爱你）"。而他那位可爱的大胖妻子，轻蔑地瞪瞪他，说："But I don't love you.（然而我不爱你。）"我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三人都笑作一团。

吃完饭，胖胖妻子取了一把葫芦状的铁质咖啡壶，给我煮起了土耳其咖啡。煮好后，并不过滤，泡沫和咖啡渣一并倒入了杯子里。我喝了一口，几乎要吐出来，赶紧摆手说不喝了。胖胖妻子以为我是客气，当下把我面前的大壶添了个满。

茶和咖啡是中东人家的待客之道，代表了主人的诚挚敬意，客人最好趁热把它们喝完，不然就是不领情。可眼底下的咖啡实在比辣椒油还难下咽，我只好密谋着给自己解围。

为了把话题从"咖啡"移开，我从包里翻出一瓶只用了两次的驱蚊花露水，递给胖胖妻子，告诉她这个可以防蚊。她嗅一嗅，喷一喷，惊喜之情溢满了脸。趁她欣赏防蚊水之际，我把那壶土耳其咖啡偷偷地往洗手池里倒。

她让阿拉法特用英语问我，这是喷于沐浴后吗？我解释道，这不是香水，还模仿着蚊子"嗡嗡嗡"地飞。只是，连阿拉法特也听不明

白，我只好作罢，留下被“国际名香”彻底征服的他俩，洗澡去了。

阿拉法特的妻子赶忙冲进卫生间来，给我递上装热水的桶。接过来的桶洁净干燥，墙上的热水器几乎看不出使用过的痕迹，一旁的冷水管却积满水垢。安曼是沙漠气候，入夜后气温并不高，洗热水澡应是生活常态。怕是热水贵，这家子平日都洗冷水澡，却把所有慷慨都倾在我这位陌生人身上。

夜里，阿拉法特和妻子把主人房收拾干净，让我独自睡主人房的大床，他们一家都睡在客厅的地毯上。尽管我再三强调自己对住宿毫不挑剔，他们依然坚持把主人房让给我。我不好意思独霸主人床，便把他们的小女儿拉过来一起睡。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胖胖妻子叫醒了。一看表，才6点。阿拉法特的小女儿咳嗽得厉害，我夜里一直照顾她，一会儿拍背，一会儿喂水，没睡好，精神不振，暗自埋怨这么早被叫醒。后来才发觉，6点起床为我拿到以色列签证留足了时间。

阿拉法特家虽大，物品却很少，没有沙发，甚至连床都只有一张，可见经济并不宽裕。同他的妻儿道别时，妻子在屋里一顿翻找，送了我一只印着中国制造的瓷杯子，杯子正面印着她看得懂的“I love you”。我吻了杯子，又吻了她，便坐进阿拉法特的车子，由他载我前往以色列使馆。

阿拉法特在门外等候，而我通过一层又一层的安检，总算进了以色列大使馆。等待办理签证的人已排起长队。只见人人手上都有一张申请表，我便上前打听在哪取表。

人家惊奇：“你不知道？在约旦申请以色列签证，需要在网上申请，然后去银行交款，拿着交款的收据到大使馆办理签证，等待3个工作日才可取签证。”

总不能再在约旦多耗时日，更不能给阿拉法特一家再添麻烦，于是我硬着头皮进了签证处，准备打感情牌。

负责接待的一号窗先生问我："小姐，你的收据呢？"

"抱歉，我没有收据。"

"真抱歉，没有收据，我无法为你服务。"

于是，我尝试告诉他，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我一路去了哪些国家，经历了什么。他打量我一会儿，善意地告诉我："你去找四号窗先生吧，他负责发放签证。"

我再一次诉说了自己这一路的不易，四号窗先生听了之后，宽慰我说："没关系，今天是周四，明天休假，你下周一来吧，你只需等待几天，我一定会为你办理的。"这不是我要的结局，我继续说着："先生，我只是想去你的国土看一眼而已……"

四号窗先生听得很认真，嘱我稍等。只见他和主管商量了一会儿，主管盯着我看，眼神并不友善。眼下签证计划即将失败，我开始收拾材料，准备离开。

把材料装好，抬头看这俩人。这一看，居然看到主管先生点头了。四号窗先生旋即转身，高兴地告诉我，你现在马上去银行交款，拿到收据后回来领签证。

当我拿到收据，再次回到大使馆后，门口的保安问我怎么又来了。

"来拿签证。"

"不可能，我还没见过谁一天内可以拿到以色列签证。"

不多做解释，半个小时后，我拿着贴好的以色列签证在他面前一晃而过，留下傻眼的他。他朝着走远的我，比了个大拇指，喊："中国人好厉害！"

阿拉法特在炙烤的艳阳下等着我，看我从使馆门口奔出来，举着护照一路向他跑去。阳光下，他的表情却并不全然是由衷替我高兴的欣喜，似乎更多的是不舍。

我让阿拉法特载我到出境处，阿拉法特向我诉说："Carrie，我还有孩子要养，你也看到我的房子足有两层，光是交租金就能把我累垮，生活很不易。"

我当然明白生活的难处，况且阿拉法特为了我，已经两天没有开出租车谋生了。于是，除了付给他车费，我还把身上所有的约旦货币都给了他。车到目的地，我紧紧地抱了他一把，告别了约旦，告别了他。

有生活压力的阿拉法特希望在我这里拿到应得的报酬，这是最真实的人性，也是我期盼中最好的结局。如果他分文不收，我反而觉得那种善良来得不够真实。

离开之前，阿拉法特把自己仅有的英语词汇拼凑在一块儿，说："Today, Carrie, here, good! Tomorrow, Carrie, not here, no good!"他想表达：我在这里，与他一道，这是美好的一日；明天我已不在，他将回归司机生活，生活似乎不像这一刻这么美好了。

我曾告诉他，我在中国有亲生父亲，而如今，又多了一位约旦父亲。

也不知他听懂了没。

遭遇以色列式“审讯”

踏在以色列国土之上，一路的翘盼总算得以实现，感觉有点不真实。

本以为可轻松入境，却没料到还有一番“审讯”。

排队等候入境的队伍并不长，却移动缓慢。前面的美国男孩告诉我，入境时还要被工作人员盘问，如若有半点让人质疑，就要在一旁的小屋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直至等到第二轮“审查”，才会得到通过或被遣返的结果。

美国男孩的外婆在耶路撒冷居住，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外婆。他说：“我每年都没法通过这第一道关卡，总被带进小屋接受‘审讯’，有一次他们居然问我，我祖父的祖父从事什么职业，天啊，我哪知道。”这时，旁边负责带领芬兰旅行团的女导游把小脑袋凑过来抱怨：“我上一次带团来这里，被关进小屋盘问了9个小时。嗷，我几近崩溃！”

入境后，人与行李要分开接受安检，每个人通过入境盘问后方能取回行李，而人们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明以接受盘问。而我完全不知道这一条例，把所有身份证明都放在另行检查的背囊里，身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我是位纯良的游客。

美国男孩没有打破自己的纪录，又被带往“审讯室”了。芬兰的女导游，也被告知前往“审讯室”等待通知。以色列的政治环境众人皆知，风声鹤唳本是自然，可以理解。一路上扫清了这许多外来障碍，我并不觉难堪；只是如今这股阻力居然来自以色列本身，叫我困惑。

我同身边同在排队的西班牙女孩说，如果让我等待超过3个小时，我就折回约旦探望“父亲”。

西班牙女孩似懂非懂，只配合地点了下头。她神情凝重，担心手上那一大沓工作证明是否能让她顺利入境，前往耶路撒冷开工作会议。

总算轮到我了。坐着的女签证官面无表情，头也不抬地问我：“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国家作为旅行目的地？”

“想看一眼以色列，看一眼哭墙，感受犹太人的血泪受难史。”

“带旅行指南了吗？”

“没有。”

“有旅行计划吗？”

“没有。”

“明天会去哪里？”

“没想好。”

这时恰好有一位犹太裔的男签证官进来，女签证官立刻转过身去，叉着手向他抱怨：“她说自己来旅行，居然没有带旅行指南，也没有旅行计划，她甚至连明天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又转头问我：“为什么你连计划都不做？”

“如果你把所有事情都计划好了，就会少了一份未知的惊喜。”我答得毫无底气。

对方也泄气，似下了决心要把我送进“审讯室”，随口抛出一个问题：“好吧，告诉我，你对我们国家了解多少？比如说，我们有哪些公众假期。”

我觉得自己没戏了，不再努力想答案讨好她，只孤注一掷地答道：“正因为我对以色列一无所知，所以我今天才站在这里，要亲眼看一下这个国度。”

没想到，这个坦诚的回答博得了她的好感。她起身，笑着对我说：“不要过多地与陌生人交谈，要注意安全。祝你旅途愉快！”

我顾不上去猜究竟是哪个用词打动了她，只在一声道谢后赶紧入境，生怕她反悔。

入境后，在取行李处遇到同样成功入境的西班牙女孩。她得知我最后一个回答后，评价道：“这似乎什么都没答，又似乎解答了一切。”

就这样，我终于踏上以色列国土，前往耶路撒冷。

易卜拉欣的和平小屋

在抵达耶路撒冷前，听开罗青年旅舍里的萨拉提起过，在耶路撒冷有一位名叫易卜拉欣的老人，他将自己的家命名为“耶路撒冷的和平小屋”，给全球游客提供免费住宿。

我问，如何找到易卜拉欣呢？对方答，只听说他很出名，去橄榄山上打听，人人都知道他。

在入城的小巴车上，一位好心的犹太人听我讲述后，着急地问：“你可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街头若掉下一块招牌，砸到的十个人里可能有八九个都叫‘易卜拉欣’？易卜拉欣（Ibrahim）是《古兰经》中记载的古代阿拉伯地区的著名先知之一，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始祖，这在中东可是个极受欢迎的名字。”

见我失意，又觉得如果我执意独自前往橄榄山无异于冒险，这位乘客叫我跟着他下了小巴，为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还谈好价钱，让司机载我去橄榄山。命运就是这般奇妙，这位司机居然说自己听说过易卜拉欣，因为多年前曾载过一位日本背包客前往易卜拉欣的小屋。

车到山腰，再也不能前行，我不得已下车，准备在夜幕里独攀山路。司机担忧我的安全，问山路上一位头顶着大盘食物的男子是否认识易卜拉欣，对方说认识，可以带路，司机便安心驶离了。

我跟着男子，默默走了一路，山路漆黑，我质疑地问：“你确定我们去的是易卜拉欣的家？”

男子头都不回：“是！”

山路越走越黑，而我越想越怕，再问：“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他“扑哧”一下笑出声：“我是易卜拉欣的儿子！”

半信半疑地尾随他入屋，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两位丹麦志愿者正在屋里负责登记来客。原来易卜拉欣不仅提供免费住宿，连家里的水果、饮品、肉类等食物，还有电脑、洗衣房都供陌生人免费使用。家门口放了一个捐赠箱，用以让离开的留宿者随意捐款。

我做了登记，被告知是多年来第一位入住的中国人。我心里异常好奇，急切地想要见到易卜拉欣，却被告知他生病了，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第二日一早，我看到有一位阿拉伯老人在厨房里炒饭。

老人是新面孔，想必是新来入住的。我立马担起介绍的职责，把各楼层各房间的功能都给他介绍了一遍，还指了指桌上的水果：“喏，那些都任吃。”



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

末了，我扬起下巴，伸出手：“对了，我叫Carrie，你呢？”

老人笑得灿烂，一把握住我的手：“Carrie你好，我叫易卜拉欣，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我又惊又喜，并不担心他怪我喧宾夺主。

那日领我入屋的易卜拉欣的儿子是出租车司机，一日，我与同在和平小屋寄宿的几国游客一道付他车资，请他载我们前往临近的巴勒斯坦地区。其时是2011年，巴勒斯坦尚未像现在这样受到越来越多联合国会员国对其“国家”属性的认定。

在耶路撒冷的以巴边境，我见到以色列人只需扬一扬手里的护照，就能轻松跨进巴勒斯坦境内；而巴勒斯坦人却在进入以色列领土

前，受到呵斥和搜身，稍有不从，立马被以色列士兵一把推向军车旁，用枪抵着头，命令其举起双手。

与我同车进入巴勒斯坦的都是欧美人，而有着中国面孔的我，在巴勒斯坦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

同行的阿瑟看中了一块蛋白石吊坠，询价时被店主反问是哪里人。一听阿瑟是美国人，店主说："80美元。"我在一旁站着，瞄见吊坠盒子侧边贴着30美元的定价，捂着嘴偷笑。店主顺着笑声看过来，问我："你是中国人？"我答是。他把蛋白石捧到我面前："中巴友好，我们的道路和基础设施都亏得中国援建。你要的话，10美元就好。"



耶路撒冷清真寺

阿瑟气得跺脚。

游览完古城后，随车去了死海。我们几个吝啬的人，不舍得买高价的死海泥，便徒手挖着岸边的泥巴，敷满了全身。说起旅途上的节俭，其实阿瑟并没这个必要——他原本住在耶路撒冷的五星级酒店，在酒店走廊遇到易卜拉欣的表亲，对方说："你住高档酒店，该有多无聊呀，我的兄弟提供免费的住宿，你来吧。"于是，他便住了进来。



我和贝蒂娜不愿出钱买死海泥，干脆自己动手挖

在巴勒斯坦的游览并不是一路都这般愉悦，更多的是看到民不聊生而引发的同情与沉思。多年过去，以巴冲突仍是我关注的新闻焦点，那一张张友好又刻满苦难的巴勒斯坦民众的面孔，总是随着新闻画面一起显现眼前。

随车回到耶路撒冷后，我们又回到易卜拉欣的和平小屋。

住得久了，我会在入夜后与老房客一道聚在客厅，听易卜拉欣讲人生故事。“老房客”这一称呼毫不夸张：易卜拉欣从不筛选前来入住的人，不问背景和目的，只按性别来分房间，甚至不去过问对方要住多久，以至于有住客在小屋里住了两年。

一天晚上，客厅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子，我问他名字，一听又是“易卜拉欣”，我不禁笑出声来。小易卜拉欣是老易卜拉欣的孙子，有自己的理想，不愿继承爷爷的免费接待事业。



为了尊重犹太人的精神圣地，我在哭墙几乎没有拍照，尤其在周五晚上至第二天落日的安息日，哭墙更是不允许拍照，只在某个寻常的夜里，我留了这张随意的影像

老易卜拉欣喜欢与我们聊天，尽管每次他的大段英语描述，在客厅里的日韩背包客多半是听不懂的，但这段话大家都能听懂："我每天只有一个担忧，就是怕来我家的客人吃不饱；我老了，做不了多少年的免费招待，真怕这个事情没有人接手做下去……"往往说到这里，易卜拉欣就会扯过头巾的边角去擦落下的泪。他那条红白格的头巾已旧得破了洞，我们让他去买，他说没必要，能省则省。

离开时，我尽己所能地往门口的捐款箱里放入了心意。关于捐款箱，还有一处感人细节：为了不触犯隐私，住客之间并不过问离开时的捐款数目，也不去好奇箱子里究竟装了多少钱。但后来，我们察觉出，只要当天易卜拉欣去买肉，就说明捐款箱里入了钱。所有的捐款，都被易卜拉欣用来购买食材免费招待住客，因为他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家里的住客吃不饱"。

尽管在易卜拉欣家中只住了短短数日，那份对人性之善的惊叹和感恩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多年后的现在，我也把自己的家敞开给世界各地的旅人，做起了免费接待。虽然做不到像易卜拉欣那样心有大爱、来者不拒，但也算是把他的善意传递开去。我也相信，被易卜拉欣改变人生轨迹的，远远不止我一人。

CHAPTER 2 阿里旅舍

阿富汗


PRIMA



阿富汗街头卖瓜人

误住繁星酒店

我一开始就错了。

网络上的阿富汗住宿信息匮乏，想着傻人自有傻福，我计划着到达喀布尔后再寻旅舍。初抵喀布尔机场，在漫天要价的司机堆里选了一位看起来最敦实的司机，叫他载我去市中心，好找住处。

他一副听懂了的模样，却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把我载至装潢豪华的繁星酒店，同时，还不断向我推销另一家旅舍——阿里旅舍。

我当然懂得司机推荐阿里旅舍背后的抽佣，不愿做待宰肥羊。然而，把车停在繁星酒店后，司机怎么也不肯再发动车子，态度明确：要不去他推荐的阿里旅舍，要不就住这家繁星酒店，再要不，自己走路去找。说着，他把手机递了过来，电话那头是阿里旅舍的员工。

于是就有了这一幕——

我左手握着手机，冲着话筒里阿里旅舍的人嚷：“我说了，我不住，我不住！”右手则不断拍司机的座位靠枕，喊：“我要去市中心，不是繁星酒店！”

而电话那头里的人仍没放弃，急促的英语带着极重的阿拉伯口音：“50美元很便宜了！你找不到更便宜的了！你必须住这里！”语气太逼人，我厌恶地挂断电话，气鼓鼓地把手机还给司机，质问他：“我说要去市中心，你却开来繁星酒店！我说了不去阿里旅舍，你却要给他们打电话！”

就在僵持之际，繁星酒店的前台侍应走出来，好言劝我先进去看看房型，不满意的话换别家也不迟。我哪是挑剔住宿条件，只是在乎住宿价格罢了，自然拨浪鼓般摇头拒绝。侍应却很坚持，笑容傻得有点动人，我只好答应进去看看，心里盘算着看后佯装不满意离去。

自然，房间设施齐全。一问价，单人间最低90美元。他还说："我给你特殊优惠，只要50美元。"我仍是嫌贵，不住。

揽过背包坚持要走，其时已近黄昏，侍应扯我手臂不让走，说喀布尔入夜后非常危险，当地人都不敢独自步行，更别说外国女性。我不领情，仍是要走。

侍应突然说："等等！"他跑回前台，给老板拨电话，对话一番后把话筒递给我。电话那头老板问："你来阿富汗干什么？"我答道："旅行。"他又问我什么职业，我答说刚毕业，并不自主地嘟囔："就是穷学生才没钱住酒店嘛……"

不料，老板说："20美元，收你20美元一天，请你住下来，哪怕一天也好。"我恬不知耻地小声回应："20美元仍是贵……"



走在喀布尔街头，几乎没见过游客的当地人纷纷望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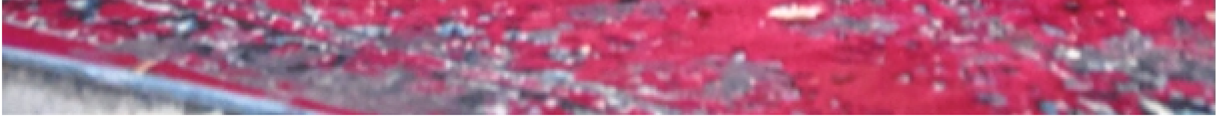


阿富汗街头卖苏联旧武器的店铺



阿富汗街头卖鱼人





阿富汗街头卖馕人

“如果你愿意，可以住一晚，明天再动身找别的住宿。”他建议道。

见门外天色已黑，考虑到自身安全，我答应住下来，末了还不忘掷下豪言：“我只住一晚，明天就搬。”

事实上当然不只住了一晚——厚脸皮如我，在第二日问了几家旅舍，发现条件最差的都要价50美元且安保系统不齐全后，决定赖在繁星酒店住下去。

阿富汗局势动荡，自杀式袭击频繁，草木皆兵。在阿富汗住宿要经人工和金属探测仪的层层严查。而繁星作为高级酒店，有防弹大门和看似更高规格的金属探测仪，还配荷枪保安。

不知是否是之前在印度感染上的腮腺炎，在抵达阿富汗的第一天开始发作，刷牙、喝水、进食时，腮帮子都疼得厉害，且开始肿胀。炎症让我每天夜里都因高烧而无法入眠。

在繁星酒店的第三天夜里，前台打电话来，说他的老板想和我“聊聊”。夜里10点约谈，动机难免让人起疑，但想着人家减免我房费，可见不是利益至上的商人，也许是自己小人之心了。我把防狼喷雾往牛仔裤后袋一塞，下楼去。

一番寒暄后，老板说：“繁星酒店里住了一些中国客人，他们来自中国的电子工程公司。你也明白，我们这里的房价最低是90美元，我们和他们公司有长期合同，优惠他们一些，每天收他们80美元。”我点

点头。他接着说：“有中国工程师听说了你的房价，来我这里拍桌子投诉。”我一愣，什么？！

“我是生意人，一旦此事外传，我的生意难做。”我这才回想起，曾有中国来的工程师在酒店附近与我聊天，问及房价，我便如实告知，不曾想他们也住繁星酒店，更不曾想自己的同胞会如此这般使我难堪。

见我窘迫，老板忙说没关系，又问我这几天在哪用餐。繁星酒店供应自助餐，但16美元一顿的高价，让我选择每天都在外面饭馆就餐。语言不通加上自己敏感的外国女性身份，在穆斯林餐厅点餐并不顺利。后来，经我观察，独自用餐的女性是应该在餐厅的地下室进餐的，而且进餐时不能摘下头巾面罩，而应该左手掀起头巾一角，右手用勺子把食物送进嘴里。而不懂规矩的我，自然就不受欢迎了。

这些都还没来得及告知，老板已拍板发话：“明天起，你一日三顿都可以在酒店吃自助餐，我已交代好员工，不收你钱。”

如果说一开始的房价优惠是看在我是穷学生分儿上，他做出的善良决定，那么免除饭钱，便显得不那么简单纯粹了。我开始猜疑这背后的用心，毕竟生意人不做赔本买卖。

老板接着说：“其实我和你搭乘同一趟航班，从迪拜飞喀布尔，你或许没注意到我，我坐在头等舱，而你在经济舱。我虽是阿富汗人，但有英国国籍，长居伦敦。前台侍应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顶层，从你入门开始的一举一动，我都通过监控镜头观察在眼里。”

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英国护照，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志得意满地重申道：“你看，我是英国公民，只是回阿富汗度假。”生怕我看不清护照上的大不列颠字样，又晃了一把封皮。

人若有能力，自是有资格选择居住国，移居英国是他的自由，本无可厚非，但他极力撇清与阿富汗的关系叫我反感。面对孕育自己的国度和文化根基，人们本该自豪。

老板解释得越多，越让我狐疑：明明开头在电话里就能说清的细节，却待到独处时才抛出，而他对自己权贵身份的强调也叫我不安。没再听下去，我说腮腺炎折磨人，夜里总发烧，便借故回房休息。当然，腮腺炎的确是很折磨人。

那夜睡前，我做了决定，要尽早离开繁星酒店，前往阿富汗另一城市赫拉特。于情，我并非身无分文之人，占着诸多恩惠总不应当；于理，老板的表现，让我难以分辨意图。

第二天出门时，前台侍应传话："老板说今晚想找你聊天。"我推搪称自己今夜会晚归，需要休息，聊天不便。实际上，哪有"晚归"一事，在喀布尔的每一天，天色渐暗时我就打道回府。侍应又说："老板说无论多晚都会等你。"至此，我下了决心搬出繁星酒店。

那天傍晚回到繁星酒店门口，我收到老板短信——他应该是在前台登记表中拿到了我的号码，说的是："甜心，我等你回来聊天，多晚都等。回来后给我打电话。"亲昵的语气一改之前聊天时的严肃面相，让我惑然。

我只好一路鬼鬼祟祟地小跑，尽力绕过了繁星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溜回房间，没再出来。我悲哀于独旅女性若是性格开朗，易叫人误以为是作风豪放，能占便宜，他人都希望一尝甜头，若尝不到，也不见得有损失。

第二天一早，我退掉房间，前往阿富汗东部城市赫拉特。退房后，仍尝试理清那团乱麻，若老板是真心助我，我便是世间小人；若老板确实意图不轨……

当然，最后我并未得到答案。

在赫拉特的乱世之交

在去往赫拉特之前，我曾向在喀布尔结识的一位阿富汗记者问询情况，他力劝我切勿前往："赫拉特不如喀布尔安全，只要走出市中心区域，极易被塔利班绑架。你在赫拉特搭乘出租车，司机也可能打电话给塔利班，叫他们来绑架你。"另一位阿富汗摄影师的建议更骇人："到了赫拉特，一定要打起精神，紧盯出租车司机载往的方向：往左，是死亡之路，通向塔利班基地，路上都是塔利班的检查点，一旦看见你，你必死无疑；往右，那才是去往赫拉特城区的路。"

此前从喀布尔前往临近城市贾拉拉巴德所经的道路也叫当地人闻之色变。他们说这条道路布满了塔利班内线，也有潜在的炸弹，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然而同样在这条路上，我却看到了村庄和湖泊组成的美丽风光。



宁静的赫拉特古堡，让人忘了自己身处战乱纷繁之地

其时在阿富汗已近一周，其间得知我初抵喀布尔机场时独自步行过的一条小径在一周前曾发生爆炸，乘车经过的9名外国人被炸死，事后媒体披露这9人生前都为阿富汗政府工作，这意味着这场爆炸不是意外事故，而是场针对该国政府的有预谋的恐怖袭击。得知消息时，我不禁想，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我却平安无事，看来生死由天，既然避不了、躲不过，与其惊恐担忧死亡突至，倒不若活得随性。我对宿命论的深信，大概就是那时植下的。

在赫拉特机场，我与一位阿富汗妇女攀谈，她建议我入住较为安全的马可波罗旅馆。出机场，坐上出租车后，我一直紧盯前方，生怕司机一个左转，把我送去塔利班巢穴。老天保佑，热闹的城区渐现眼前。

马可波罗旅馆提供多种房型，最便宜的单人间30美元一晚。订房后，我随服务生进房，一看摆有两张床，怕是弄错了，便问房价多少。

服务生答："矿泉水就快送来了，每间房供有两瓶免费矿泉水。"

我重复一遍："不是，我问这间房的房价多少。"

"贵？不贵！马可波罗的房价很便宜。"

我无奈，继续问："我问的是这间房多少钱。"

他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伸手去开冰箱，说："的确是不冷，冰箱可能坏了。"

我有些崩溃，提高了音量："我问的是房价多少？！"

他转身，探头进卫生间，转头说："有水的！"

我无奈地瘫坐在床上，拍着被套说："你连冰箱、矿泉水的单词都会说，就是听不懂一句'多少钱'吗？"

他摆摆手，叫我等等。等了5分钟，他用一个大托盘，给我端来了20瓶冰冻矿泉水……

于是我没有再问。

拿着马可波罗旅馆前台送的赫拉特城区地图，我一路走到赫拉特古堡。买门票时被告知，参观时间只剩半小时。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说，若是我不介意，他可以陪我逛古堡，且能延后关门。管理人员名叫"好马哟"，是古堡旅游区的主管，一路用流畅的英语介绍古堡历史。我正做小人，猜测着他是不是想收我导游费的时候，他让我在原地等等，只见他叫来了另一位伙伴"朱哟"。"好马哟"说，若他和我单

独相处，易招引流言，把另一位管理人员“朱哟”叫来，能镇住人们好事的嘴。这么一听，“好马哟”是正直之人，收费自然是我的多余猜测。

“好马哟”和“朱哟”极担心我独自在赫拉特晃荡不安全，坚持第二天开车载我去参观其他景点。

自从进入阿富汗，在街上步行往往受到各种干扰：有时是人们跟着我，言语轻佻；有时是孩子们追着要钱，不给就张嘴开骂；有时是车子靠路边停下，人们开窗朝我吹口哨；有时是警察把我拦下，不许我步行，叫来出租车把我载走。在阿富汗人的眼里，女性不该独自步行、购物和用餐。阿富汗女人常年受到轻视甚至侮辱，用布尔卡罩袍包裹全身，独余一双无辜的深棕眸子，在厚实面罩上的一小块网纱后，小心翼翼地窥探着这个并不包容自己的国土，每一个步子都走得战战兢兢，踏踩在自己的尊严之上。对于被辱骂和被禁足，阿富汗女人司空见惯，甚至认为自己的丈夫有殴打她们的权利，无论自己是否有过错。

相识的这个傍晚，“好马哟”和“朱哟”驱车送我至旅馆门口，才放心离开。想起他们曾提醒我应用大块布料包裹全身，我便改了主意，并未回酒店，而是步行去找布料店。

路上有看似正经的男子搭讪：“你去哪里？”我警惕，不理会，他又说：“你一个人走不安全。”我依旧不理会。他一路跟着我。这时，一辆摩托车驶过，无意钩到了我的背包，他冲上前，一把帮我拽回背包，我忙道谢。他又随我到布料店，见我和店铺老板无法沟通，便帮我翻译。

买好了裹身的布匹，我准备回酒店。那男子问我去哪里，我答说回酒店。他嬉笑道：“一起回呀。”我火冒三丈，呵斥他离开。他不仅不离去，还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嬉笑的意味更深：“我可以吻你吗？”

在印度时认识的一位广西女孩老妹送过我一只小型电击棒，让我在关键时刻可以防身。我从包里摸出电击棒，不敢电那男子，只推开电源，发出“吱吱”的电流声响吓唬他。他不仅不怕，还指着电击棒狂笑。万幸，一辆载客三轮车经过，我跳上车，嘱司机赶紧开向旅馆。

回到房间，我越想越气，难道电击棒没威力，吓不着他？想着，伸手去摸。怎料手指不小心触到开关，只有半秒，我整只手就被电得疼痛发麻，再看手掌，已是泛白毫无血色。这是迄今为止这只电击棒唯一一次电人。

第二日，“好马哟”和“朱哟”来接我，带我游清真寺，请我吃赫拉特有名的手工雪糕。雪糕由鲜奶制成，撒上了磨碎的阿富汗杏仁和提子干，另浇一层草莓汁，鲜香滑软。这真叫人讶异，苦难和炮火竟也轰不走人们对食物的探索和热爱。

正午时分，他俩要回古堡工作，便把我托付给另一位朋友哈利。

三个人性格相似，为人和顺，但谈及未来美军将要全面撤出阿富汗时，哈利同我所遇见的大部分阿富汗人一样，愤慨而悲观。在促使我来到阿富汗旅行的小说《追风筝的人》里，阿米尔的父亲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放心，这个国家会赶走侵略者”；而事实上，饱受战火摧残的普通阿富汗民众憎恨战争和入侵，却又在赞美着苏联入侵时期建下的大楼和公路质量极好，受塔利班攻击仍不毁。他们对贪婪霸道的美利坚不抱好感，却又担忧美军撤出后，政府无力与塔利班组织抗衡，届时塔利班将攻占阿富汗相对较安全的东部和西部，屠杀无辜百姓，并与其他武装派别进行内战。

哈利邀我至家中做客。他的妈妈皮肤白皙，一双眸子似渊深湖泊，叫我陷进去。她只会达利语，与我沟通不来，端来的水果和饼干却一盘接一盘。

我本是好吃之人，在朋友母亲面前更是不必掩饰，左手捏一块姜糖饼，右手握一个外表似梨，果肉却像苹果的不知名果子，左一口右一口，也没管哈利妈妈听懂没，连连惊呼好吃，还不忘喝一口刚调好的奶茶。哈利妈妈看得开心，似想起了什么，转身进房，捧出一把银饰要送我。



这是我在喀布尔的装束，听了“好马哟”和“朱哟”的建议后，我买了大匹的布，把全身都包裹起来

这下我不干了，摆手说不要，哈利妈妈以为我嫌少，又进屋拿出首饰盒子，取出一枚银戒指。我怎受得起这份礼，忙说不要。哈利妈妈急了，扯一把哈利，让他说话。哈利劝我：“银饰不贵，但年代久远，每一串每一枚都有故事，既然妈妈一番心意，你就收下吧。”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便挑了一条最显旧的手链和一枚最小的戒指收下。

初抵阿富汗，不懂官方语言达利语，简直寸步难行，于是学了些简单词汇，salaam是你好，tashnob是厕所，tashakor是谢谢。偷偷写在

掌心远不够，每夜睡前反复回忆几遍，怕的就是混淆“谢谢”与“厕所”。好几次我在餐馆，想问服务生卫生间在哪，都傻笑着看着人家，说出一句“谢谢”；而从卫生间出来，又对服务生说上一句“厕所”，让不少人看了笑话。

收下银饰的我又想卖弄一下自己的达利语，便握住哈利妈妈的手，笑脸情深地说……“Tashnob.”她本也料到我要道谢，却一时愣住，歪着头恍了会儿神，手指向一扇门。我问哈利，我向他妈妈道谢，她为何指门。哈利瞬间大笑起来，涨红着脸翻译给他妈妈听，他俩都笑得停不下来，我只好把头埋进奶茶杯里……

从那天起，我用红色油性笔在左手手背写下：“tashnob：厕所；tashakor：谢谢”，每天睡前描一次红，生怕褪色。

终遇阿里旅舍

从赫拉特回到喀布尔，又面临住宿难题。无意间在飞机杂志上看到一则旅馆广告，抵喀布尔后致电对方，一番讨价后，对方承诺每天房费25美元。

搭乘出租车前往那家旅馆，越往前开越僻远，连司机都说一个女孩子住那么偏远很危险，于是我让司机推荐住处，不料，他竟说："阿——里——旅——舍。"他的语速正常无比，但这旅舍名字在我耳里却被拉扯成一块厚重的馕饼，粘着那通与阿里旅舍不愉快的通话经历，一同甩打着我的脑海。

眼下似乎别无选择，再加上司机一个恰中时机的转头，带着亲切笑意说："我和阿里旅舍的人很熟，我会叫他们给你优惠。"自认精明的我，一时半会儿也分不清那是想抽佣还是真善心，便叫他驶往阿里旅舍。

阿里旅舍竟比想象中要好，门口有荷枪保安，房间整洁，服务生是清一色的大男孩，约莫20岁出头。一交谈，之前与我通电话的那位就是老板，他说每天房费30美元。我嫌贵，问可有学生优惠价。老板称这已是最低价，其他人都是50美元一天。

谈不妥，我转身就走，要司机载我另找住处。一路上，司机不断给阿里旅舍的老板打电话，又转头对我说："25美元，他们只收你25美元一天。"我这才同意回去住下。

入住后才知道，阿里旅舍的老板很年轻，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俄语专业，准备到俄罗斯念书。我在网上和朋友聊天，提及老板的年

轻和经营旅舍的用心，朋友称老板为“青年才俊”。后来，“青年才俊”不断向我解释，说自己以前英语还不错，学了俄语后把英语都忘光了，还介绍自己的名字是法哈德。我这才明白，他在电话里用词不妥、话语急促，是因拉客心切又自觉英语不好而紧张，才叫我误会为他不友好。

我每天经过旅舍大堂时，都看到法哈德正愁眉苦脸地监察一楼餐厅的施工情况。他告诉我，阿里旅舍共有30间客房，但住宿高峰期也仅能住满10间房，阿里旅舍占地面积大，水电开支不小，加上每月租金折合人民币近2万元，旅舍一直在亏本营业。

我自荐要帮他写房间描述文字，并放在各大旅舍预订网站做宣传。法哈德很是感激，但也坦言正在装修的餐厅已耗费他不少精力，他实在没空处理网络订单。

自从我提出要帮着开通网络订房后，法哈德和旅舍里的男生们就把我视作朋友来对待。渐渐地，每天出门前和他们问声好、回来后聊聊一天见闻，已成了习惯。尽管有时他们听不懂所有内容，但还是坚持要听。这是民族情结，他们希祈每一位来阿富汗旅行的人没有被骚扰、没有经历不快。而实际上，我当然都经历过。

即便我每天都披着头巾、衣着密实，还是在街头被不少阿富汗人当作妓女，挑衅的语言甚至是过分的动作都不时出现，甚至有小孩驾着驴车打我面前经过时，把手在脖子前一横，做出割喉的动作。一日，一位看上去年近90的老人在街上尾随着我，颤巍巍地递来一叠纸钞，嘴里喃喃着：“上床，上床……”

这些不快，我都没告诉阿里旅舍的人们，偏报喜不报忧。

一开始，阿里旅舍的服务生们给我的早餐是牛奶燕麦和煎鸡蛋；渐渐地，早餐分量愈加惊人，最终版本是燕麦、两块馕饼、两个煎鸡

蛋、一壶绿茶、一杯热奶茶，还有数盒黄油和果酱。这种敛着呈现的恩情让我很是感动，也让我因此省下每天的午饭。此外，阿里旅舍还有点餐服务，实际上只是把男生们派到邻街餐厅取餐食，却分文不收送餐费。

旅舍门前有一个大概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每天入夜后在旅舍门前卖围巾。阿富汗的街上游荡的孩子大多是因贫辍学，靠售卖一些小首饰来赚取生活费，若是不买，他们便骂骂咧咧；而更多的街童选择了乞讨。我不愿让他们从小形成财物伸手可得的想法，从不施舍，却也因此被一群小孩追着辱骂，甚至朝我背包踹一脚就赶紧跑。有时我也气，拔腿追过去，追足两条街，想还那一脚，可一把拽住孩子，看到那睫毛扑扇的大眼睛，心一酸，终是放了。小孩的道德标准模糊，前一刻还踢我骂我的孩子，被饶过后，直冲着我微笑。



四处可见的馕饼店

相较之下，阿里旅舍门前的围巾小孩显得非常讨喜。他总是一副温顺模样，些微低着头，对着傍晚归来的我轻声地问：“女士你好，请问你今天要买围巾吗？”

他每晚都这样问我，每问一次，我的心就软一回，可我既不需要围巾，也不愿出于同情去购买。一天，想起自己背包里还有一大包从国内带来准备送外国友人的饰品，便将整包东西给了阿里旅舍的前台，让他们转送围巾小孩，说是送他的中国礼物，愿他懂得把这包礼物拆开贩卖。

一夜，我回旅舍已是夜里8点。喀布尔入夜后的气温与白日迥异，寒意叫我环住了手臂，瑟瑟发抖地步行回旅舍。围巾小孩还在，正衣衫单薄地站在围巾架子后面，孤零零地望着漆黑街道，盼着来一位客人也好。我礼节性地问他吃饭了没，小孩仍是那副温顺惹人怜的表情，低着头小声回应：“女士，我还没吃。我很饿。可是得卖出围巾才能回家吃饭。”

心头又一软，走进阿里旅舍，问前台可否帮我叫一份比萨外卖。前台大男孩问：“Carrie，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我如实告知，是想给门外的围巾小孩叫一份餐食。

万万不承想，前台大男孩回头对里屋的法哈德交代了几句，便转过头对我说：“Carrie，这与你无关，不需你操心。”我以为他怪我多事，或是责备我同情心泛滥会惯坏孩子，便有些愠恼。他也不解释，只嘱我坐在招待室等待。

几位大男孩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他们端出一大盆食物，有鸡块、馕饼、水果、米饭和热茶，给我看一眼，然后端出门去。见我呆住，法哈德对我说：“放心吧，今天开始，我们负责门口小孩的午饭和晚饭。”我才醒悟，那一句“与你无关”只是因为同样学俄语的前台找不到合适的英语来表达。

我一时感动得找不到言语来表达，只唯唯诺诺地点头。入住以来，每次出门，他们都问我去哪，若是去的地方远，他们就不允许我步行，硬是要帮我叫出租车，嘱咐好司机并代付车钱后，才让我出门。于是，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阿里旅舍的男生们叫好车子、付了车费，我拗不过去，只好上了车子，但总会在车发动时打开窗，把车费往窗外一扔，拍着椅背让司机加速离开。

有时好奇心作祟，想要去旅舍旁的小卖部转转，看看阿富汗这硝烟四起的国度里，店铺里会售卖什么商品。尤其听不能喝酒的穆斯林们提起，说他们喜爱喝俄罗斯产的罐装无酒精类鸡尾酒后，我更是希望一试究竟。

这天我来到旅舍旁的商店，选了瓶无酒精饮品。结账时，老板问我：“你是那个住在阿里旅舍的中国姑娘？”

我点头，好奇地问老板如何得知。他却不答，而是把我伸出去付款的手推了回来，说：“阿里旅舍的人交代过我，你来买东西，一律不能收钱。”我执意要付，老板一再地把钱退回来。

于是，我在心里掂量出大概售价，抓起没有标价的饮品，把几张纸钞往柜台一扔，撒腿就跑，余老板在身后挥着钱大喊。

“关乎情谊，无关生意”

在阿富汗已近一个月，父母盼我归去的心切切。纵是我的旅途好奇心再重，也决定要回家。

离开前夜，我向阿里旅舍的每一位员工道别。大男孩们窃窃商量，总结道，我离开在即，应该给家里带一些纪念品，他们派法哈德陪我去超市采购。

阿富汗的工商业被纷繁战火摧毁，从零食到生活用品，绝大多数依靠进口，而本土可做纪念品的无非干果、银饰、手工毯子等寥寥数样。

大男孩们说：“阿富汗干果可是出了名地好吃，可以给你家人带一些。”物价高昂，我摇头说不需要，他们却一再坚持。想着入住数周以来，我欠旅舍的恩情太多，而领我去超市的好意不好推却，我还是跟着法哈德去了超市。

一看商品标价，一包干果近30美元。我看着法哈德，多期盼他说这种干果味道一般，好给我个台阶说不买，不料他说：“阿富汗的干果，可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事后证明，这个“全世界最好吃”的评价，毫不夸张。

我拿起一包干果放进购物车里。法哈德歪着脑袋问我：“难道你没有堂亲表亲吗？”

我只好又拿了一包。

他又歪了一回脑袋：“难道你没有叔舅姑姨之类的吗？”

我只好又抓起了一包。

法哈德顺手将一盒中东椰枣放进购物车："你要让家人尝尝这种椰枣。"想着本就不厚的钱包，我的心里几乎淌出血来。

念及阿里旅舍的善意，我挑了些新鲜食材，计划着第二日离开前要给他们做一顿中餐。

在我排队结账时，法哈德忽然拦在我身前，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付钱。我急得满头汗，但鉴于阿富汗对男女有别看得颇重，又不敢去扯他，只好低声恳请他不要抢这份账单。他不听，依然付了账，说："你是阿里旅舍每一个人的朋友。在阿富汗，我们不能让朋友出钱。"

《追风筝的人》让我对阿富汗升起好奇心，想一窥战争中的民众如何挣扎存活。没想到，我看到的，都是被战争摧毁日常生活却没被摧毁一颗善良之心的阿富汗人。这世间顶顶难得的，便是经历过渊深黑暗，还选择相信光明。

离开这天，我一早起床，砍鸡、切菜、调酱、烧水，给阿里旅舍每一位于我有恩的人做了顿勉强凑合的中餐。做完时，离航班起飞还有两个小时，想起通往机场路上的层层安检和机场的搜查将会非常耗时，装盘的菜都没来得及试味，便拍去手上的盐粒糖粉，要付住宿费。

阿里旅舍的前台男生连眉眼里都充满笑意，看了一眼法哈德，对我说："想要退宿，先问老板。"我看向法哈德，不料他淡淡地说："不用付钱。"

"什么？"

"你不用给钱。"他又重复一遍。

我的泪开始打转，心里着急，不希望善良的人做亏本生意。法哈德又说：“真的不用给钱，你做的这顿饭就当作是住宿费了。这些，关乎情谊，无关生意。”眼看赶航班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不再拗。

我伸出右手小指，让法哈德和我勾指承诺，他也伸出手来，问承诺什么。

“我下次来，你们一定要收钱。”

他一听，立马把手藏到背后，笑着说：“考虑一下。”

同阿里旅舍每一位大男孩告别，坐上他们帮我叫的出租车前往机场。临近机场的道路设有安检仪器，乘客必须接受搜身检查，行李过了金属探测仪后，还要拆分出来进行人工检查。

进到机场，又面临层层安检。先是进入暗房，被阿富汗女性安检员摸遍全身，然后是随身背包被打开，私密袋子也被拉开细细查看；再是大包小包过金属探测仪。相机包过金属探测仪时响了，安检人员凶得很：“里面有手电筒！”“哪有什么手电筒？”我问。他把相机包朝安检台上使劲一摔：“我说有就有，打开！”

登机时间迫近，路上安检繁杂恼人，他态度又粗鲁，让我一下子来了气。我一把拽起相机包，取出相机，把包里的物品一股脑倾倒在桌面，嫌不够解气，又扯过随身包，将物件哗啦啦地甩出来，吼道：“查！我像恐怖分子吗？有必要这样查一位游客吗？！”

他很沉重，瞟我一眼：“游客？不可能！你是外国政府人员吧！”这一句听得我无奈，没有心思再去大声回击，更不愿解释自己的确是个来观光旅游的傻子，干脆噤声，把在阿富汗遭到的不尊重全吞进肚里，待他查完，又一样样地拾回物品，胡乱塞回包里。其余安检人员见状，也围过来默默帮我收拾。

5分钟后，我坐在候机室，回想自己的行为，脸一下涨红了——我怎能如此粗野？既然心甘情愿来到阿富汗，就应对这里的安全状况有所了解，加上一路对袭击、绑架、爆炸事件的耳闻，更应去理解和尊重阿富汗小至餐馆超市大至机场安保措施如此严密的意义。我越想越羞赧，起身跑回安检台，向刚刚对其发火的安检人员道歉，他好似没听懂。

我走到候机室，拢起手掌当喇叭：“请问有谁会英语吗？”一位好心的阿富汗人凑上前来，我请他帮我翻译这段话：“我的确是来旅行的，也尊重你们的工作。我应该理解检查的初衷是为保障乘客安全，这其中包括我的安全。我为自己的粗鲁无礼向你道歉！”

乘客听了这段话，当即笑了，转过身去为我翻译。他的声音才落，安检人员都跟着笑了。乘客向我转达道：“他们也想对你说对不起，刚才他们太凶了。”



同阿里旅舍告别

不带遗憾地离开阿富汗前，我给爸爸发短信：“老爸，我住的旅舍每个人都对我很好，在我离开时还不肯收我的钱。我感动得有点想

哭。”

爸爸的短信回得很快：“女儿，一样米养百样人，这样的好人你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关键是，不轻易落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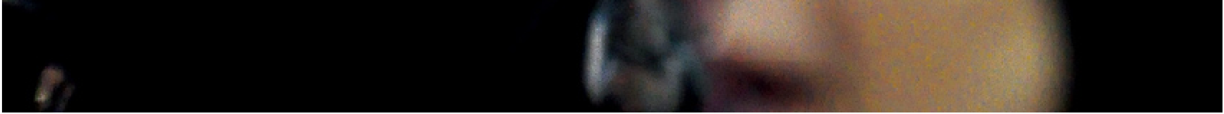
是吧，但愿。

（本章原文首发于网易人间）

CHAPTER 3 我不允许你独自旅行

伊拉克





祭奠仪式末尾，主持人洒水祝福诸位

道别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天色初泛白，晨间暮霭裹着沙尘缓缓弥开，售卖祭祀用品的小贩已沿街摆好摊位，宣礼词从屋檐喇叭扬至四处，声音悠沉沉敲击着尘土，撞进每一条街巷的尽头。不远处，阿里清真寺矗立在如烟薄雾中。清真寺门前，有裹着黑袍的老妇坐在简易木车下乞讨，一支送葬队伍护送着棺木，高喊“真主万岁”，疾步带起阵阵尘埃。

我不时伸手，去摸那藏在黑袍里的相机，渴望用镜头记录这一切，但又担心惹起民怒，始终犹豫着，不敢妄动。巴士拉家族走在前头，互相讨论着，不时回头看我。萨达抛来一个眼神，暗嘱我看好相机，我那好不容易才挪到肩头想取相机带的手，又不甘地从袍子里伸出来，扯紧衣领，免得黑袍滑落，露出发丝，犯了禁忌。

就是这样与她们告别的。

你为什么去伊拉克

初识萨达，是在夏尔迦酋长国。

在首府夏尔迦机场候机时，才开始隐隐担心：在印度苦等才拿到伊拉克旅游签证，却发现自己对伊拉克一无所知，路线、住宿、交通等信息都没有查询，现在却将登上飞往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的飞机。

坐在登机口旁，我四处张望，目光锁定一位坐在我旁侧，被黑袍捂得严严实实的穆斯林女人。诚惶诚恐，我道了句阿拉伯问候语“萨朗姆阿力空”，便问起当地情况。

她瞪眼看我：“你为什么去伊拉克？！”

我为自己的无知无畏感到羞愧，讪讪答道去旅行。

她更吃惊了，情绪激动地用阿拉伯语和一旁的穆斯林女人描述。我只好打断说：“你别担心我，我自己去过一些地方，不会轻信他人。”

然后，我拿出护照给她看，指着一个个签证印章，称自己走过非常规地带也仍安然无恙，她更惊了，站起身，叫来身后的阿拉伯男性，指着我的护照一个签证一个签证地查看，和男人大声地讨论。“噢，安拉！她还去了阿富汗！”“噢，安拉，还有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以色列！”

我觉得窘迫，伸手想讨回护照，“罢了，住宿我自己再查吧……”她看看我，停止了和男人们的讨论。她将护照放在我伸出的手

上，合上我的手掌，又用力一握，说："从这一刻起，我不允许你独自在伊拉克旅行。太危险了，你必须跟我回家！"

为赶早班机，我夜宿夏尔迦机场，然而颇多红眼航班在深夜抵达，抵境的阿拉伯人吵吵嚷嚷，我一晚没合眼，累得慌，根本没精力顾得上这位妇人是认真的还是说说而已。

登机后，她轻拍我肩膀，介绍自己名叫萨达，又命令似的让我坐其邻座。我担心会被她"查问"，又怕换座位影响他人，便说不用。

不是没遇过这般热情的人：在飞印度的航班上，一位印度老妇人让我帮她翻译入境表格，她则边织毛衣边嘱咐我下机后跟她回家；飞抵后，印度妇人没了影踪，我倒也轻松，没给任何人添麻烦。我以为，正如印度妇人那样，下机后乘客四散，萨达也不再关心我的安危和去向，这该就是故事的结局了。

下机后的审查，是伊拉克之行严格关卡的开端：在海关出口处，我被严辞拦下。入境官问我签证怎么获得的，我答是在印度申请获得的，又问谁做我的担保人，我说在伊拉克不认识任何人。他们愈加不耐烦，用紫光灯一再探照我的签证，看是否为伪造，最后要求我递交在伊拉克担保人的地址和名字，才能准我入境。

我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文件。几近绝望时，忽见萨达朝我大步走来。她那宽大的黑袍鼓涨，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气势却足够汹汹。她一把握住我的手腕，甩去一个凶巴巴的眼神，一字一顿地说："我是她的担保人，她在巴士拉和我住在一起，其他地方哪都不去。"入境官被震住，半晌都没反应过来，而萨达却已拉着我穿过保安群，走出机场。

我这才意识到，她的这份好意并不是说说而已。

出了机场，萨达与她的女性朋友让我一同等车。吉普车驶来后，萨达并没有问我意见，便吩咐司机把我的行李塞进后备箱，而我，也被塞进车子里，随她们去往陌生的未知地。

车途中并无交谈，一路见的都是盐碱地和油井燃烧冒出的浓烟，不见一丁点人影，心里也怖惧，不知命运要将我带向何处。

百人哭丧

车子在一处篱笆墙前停下，细看才发现篱笆叶子后有一扇铁门。一位面目祥和的中年男人打开门，里面的宅子才显了出来。对我的到来，男子并不惊讶，和善地迎我们进门。

客厅里，陆续走进十几位穆斯林女人，都裹着黑袍，却因为在家的缘故，扯下了面纱，活泼的神色不再小心翼翼地隐匿。萨达向她们介绍我，女人们发出啧啧的叹叫，纷纷来抱我。

家族里的大姐是位中学英语老师，我由她处得知了宅子概况。这是一个大家族，她们都是亲姐妹关系；萨达长住阿布扎比，她的丈夫在加拿大经商，女儿也在温哥华求学，萨达这次返伊，是因为家族里的长兄心脏病突发离世，她赶回来参加追思会。出门迎我的是她们的二哥，他现在是家中同辈里唯一的男性。

我仅有一个背囊，装了少许衣物，为表谢意，我把一条自己舍不得戴的丝巾送给萨达，又给她的姐妹们送了些礼物。物品送出，其实都是不舍的。背包不大，旅途漫长，筛来选去，能留下的，都是珍爱的，都是有故事的，但相较她们领我回家的恩情，就算倾囊相赠，都不足以报答。

新鲜劲儿过后，疲倦重重袭来。我靠着背包，在大厅一角坐下，拿出手机和爸妈聊天报平安。家族中的女人忙忙碌碌，在客厅和厨房频频进出，也不再管我。萨达走过来，温柔地说：“等一下会有很多客人来家里。因为今天我们要为长兄举行祭祀仪式。你现在是我们家族的一分子了，稍后你要同她们打招呼的。”我不知就里，点头答应。

和爸妈还没聊上几句，家族里就来了客人。萨达和姐妹们迎上去，拉着客人的手说话，话没说完，又看向我。我想起萨达的叮嘱，不敢怠慢，忙跳起身道好，一副又倦又愣的模样，朝着客人90度鞠躬，大声说：“萨朗姆阿力空！”客人笑，萨达也乐。

客人摸摸我的头，开始用阿拉伯语跟我聊天，我听不懂，只好又笑又点头，客人更喜了，一会儿拉着我的手，一会儿胡噜起我的头发来，手掌宽又暖。

那一幕里，我像是巴士拉家族里的女娃：终于要出嫁了，家族喜得不行，客人也欣慰。客人说的那些阿拉伯语，就好像是“我看着她长大，从留着老鼠尾的假小子，到现在要嫁人的大姑娘，真叫人感慨”，只可惜傻闺女怎么都听不懂，只晓得一个劲儿点头傻笑。

好不容易，客人总算被叫去厨房观摩，我赶紧退回自己的小角落休息。才坐热，又来了客人，我只好再次起身问好。萨达拉着来客的手，咕咕叨叨不知在聊什么，话语中不时蹦出我的名字来。

陆续和十几位客人问了好，从脸到胳膊都被捏了又捏，发根到发梢被摸了又摸，我开始不耐烦，问那位教英语的家族大姐：“还有多少客人？”大姐扬起下巴说，十分骄傲：“要来200多位客人呢。”

趁着新的宾客还没来，我赶紧回角落和爸妈视频聊天。背后有人经过，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猛地合上电脑，是我的第一反应。深知在当地习俗里，女人未加遮盖的脸是不容许被镜头摄下的，被陌生男性看到她们的脸庞，是为羞耻。我转过头去，对身后尖叫的家族女性连声道歉。她捂着嘴，尖叫着跑开，又一把将大姐扯了过来做翻译。

大姐面对羞窘的我，大笑着问：“刚才和你视频的是谁？”

我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是好。

大姐笑意更深了：“是谁？”

我不知如何应对。

大姐急了，催我：“快说呀！我姐妹说，他很帅！”

我狂跳的心脏这才平复下来：“那……那是我爸爸。”

大姐开始起哄，才一刹那，家族里其他女性都闻声而来，齐声催我打开电脑。于是，我那无辜的老爸，在再次接通我的视频邀请后，愣生生被眼前几十位裹着黑袍的激动的女人们吓着了。他笑了一会儿，默默地收下了女人们的尖叫和问好，但很快便撑不住场，把妈妈叫了过来。

估计我妈心有敌意，不然怎会捋好了刘海，还抹了淡色唇膏，一改以往聒噪的出场，优雅地坐在镜头前，媚媚地笑。

穆斯林女人看了妈妈的举动，大喝了一声倒彩，散了个干净。

幸得新客出现，萨达和姐妹们又转身去忙接待了。当然，我也不许缺席，又得去点头哈腰傻笑萨朗姆阿力空。

陆陆续续，200多人都来了，我也累得不行，躲回角落里装聋扮哑，对客厅里正热议我安危的女人们不闻不问。

家族大姐过来问我：“你怎么没让你爸爸成为穆斯林？”我很开心，觉得她尊重喜爱我爸爸，才会希望他加入她信仰的宗教，于是我天真地反问：“为什么你希望我爸爸成为穆斯林？”

她说：“因为我们这里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这样他就可以休了你妈妈，再娶我和我的三个妹妹啦！”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

她瞧见我的手机桌面图片是我爸妈的合影，于是叫来姐妹们疯传我的手机，要看我爸爸。收回手机时，我还擦了擦不知谁滴在屏幕上的口水，大舒一口气，简直又好气又好笑。

起先，女人们还在手舞足蹈地哈哈笑谈，才过了一会儿，祭师上席，祭悼仪式开始，女人们忽然拧紧了五官，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此起彼伏，哭得肝肠寸断，哭得山崩地裂，身子都止不住地颤，哭声像一把把短刀子，四窜着插满了房间。转变之快，叫我目瞪口呆。

仪式短暂，只持续了十来分钟，前半部分由瘦削的年轻祭师主持，回忆叙述逝者平生二三事；后半部分则由她领着在座的人们进行祷告，祈求安拉让长兄灵魂安宁；最后环节，是由她捧着受过祈福的瓶装圣水，用枝叶点蘸，施洒在每一位参与者的头上，祝福她们。

祭祀刚过，头顶的圣水还没淌下，女人们已擦干了眼角的泪，扯下头巾，神色又再飞扬起来，客厅和厨房恢复了热闹哄哄的场面。



巴士拉家族的女性们



方才还恸哭尖叫的她们，一下就恢复了元气

大家族给宾客们备了烤鱼、馕饼、鸡肉、西瓜，还有豆子熬制的黏稠甜点，这种甜点是在白事后给人们送祝福用的。用餐过后，我与家族成员把200多位宾客送到门口，一一拥抱告别，这漫长的一天，便这样过去了。

巴士拉家族把去世长兄的房间清理出来给我睡。我知道善良的魂灵不会害人，并不觉怕。

盘算着离去

醒来时，客厅地毯已铺满了馕饼乳酪，家族女性们满面笑意地招呼我用餐。我问，我今天可以出门走走吗?

果然如我料想那般，萨达摇头，唤来一位大男孩，“这是我们的侄子穆罕默德，这段时间他会带你到处逛逛。不许你独自出门。”

穆罕默德在马来西亚留过学，看起来是个能够接受不同文化的人。我赶紧把憋了几天的秘密告诉他：我曾在网上发过帖子，询问如何前往北部的库尔德地区，一位住在库区的男性阿玛给我留言，建议我拼乘多人出租车前往巴格达，再由巴格达拼车前往库区。阿玛还好心告诉我，他在巴格达有好友，可以托其找一位靠得住的出租车司机。

穆罕默德反问：“你凭什么相信阿玛？”

“我本抱怀疑态度，直到我收到一位库区女孩的私人留言，她说她与阿玛在库区的一些社交派对上碰过几次面，说他是值得信赖的人。”我如实说道。

穆罕默德竟冷笑起来：“你居然相信一个未曾谋面的男网友？还是一个会去派对上花天酒地的男人！你知不知道一个居心不良的司机，可以随时把你高价卖给恐怖组织？”同阿富汗一样，伊拉克民间也认为出租车司机会为了钱财，动邪念将外国乘客卖给恐怖分子。

我辩称自己并未随意信任阿玛，穆罕默德仍紧咬不放：“到了库区呢，你要见阿玛吗？你为什么执意去见一个陌生男人？”

我义正辞严地同他说：“我相信阿玛，是相信人性本善，我去库区，是因为好奇，想看看库区的真实情况，而并非为了见阿玛。”说着，我把当时求问的网络页面打开给他看，并点开了阿玛的个人资料。

穆罕默德查看一会儿，来了兴致：“哟，阿玛是个外科医生呢，那看来还是可信的。”

尽管对穆罕默德以职业判断人的出发点很不以为然，但出于对巴士拉家族的尊重，我不再与他争论。

穆罕默德有他的执见，但也有巴士拉家族血液里天生流淌的好客。他带我坐车游览巴士拉城区，给我买电话卡，我掏钱要给他，他直言拒绝：“姑妈姨妈们交代我做的。”

本是自己的旅途，却给陌生人添了麻烦，这连日欠下的恩情，已叫我忐忑不安，于是我盘算着尽快离开。

不花分文游览巴士拉

始建于公元636年的巴士拉，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连接波斯湾和内河水系的唯一枢纽。

从网络图片来看，昔日的巴士拉风景如画，市内水道和运河纵横交错，曾被誉作“东方威尼斯”；而今在我眼前的巴士拉，几乎被两伊战争损毁，港口设施被关闭，炼油厂及市内许多建筑均遭毁坏。

尤其在后来的海湾战争中，巴士拉城区再遭严重摧残。战争结束后，美英等国在伊拉克南部设立了禁飞区，而巴士拉被圈在内。十几年来，美英以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对伊军事和民用设施狂轰滥炸，巴士拉首当其冲，一直是美英实施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现今的巴士拉，虽说不上硝烟处处，但确是满目疮痍。



巴士拉街头等大巴的当地女性

那时是2013年4月，伊拉克正举行省级议会选举。这是2011年美国撤军后，伊拉克举行的首次全国性大规模选举。

尽管伊方采取封路等安保措施，但针对参选人和选民的炸弹袭击仍不时在城郊出现，动辄炸死平民的恐怖袭击叫人义愤填膺。不仅部分投票站遭到炸弹袭击，教派冲突也在同时加剧。为保选举顺利举行，部分地区采取封路甚至宵禁等方式，保证投票期间的民众安全。而选举期间的不容乐观的安全形势，正是萨达严禁我独自出行的理由之一。

我问穆罕默德，为什么炸弹频频出现在公交车和邮局这种民众生活场所？穆罕默德的解读是：“他们通过杀死平民，来炫耀他们的‘杀

伤力'，以威胁政府。”

我的一位战地记者朋友，曾这样评价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国恐怖袭击的差别：在阿富汗，几乎所有恐怖袭击都针对西方人，是有预谋的，如果你想躲过，尽量少走政府官员、西方人必经的路途；但伊拉克的炸弹袭击，是无法预见的，因为他们只杀平民，炸弹可能随时出现在脚边。

然而并不完全是令人心碎的消息。因萨达不允许我步行，我只好与穆罕默德坐车游览主城区。从车窗往外看，街头贴满了参选人的拉票海报，其中竟不乏女性。我欣喜地转向穆罕默德："伊拉克女性有参选自由？"

穆罕默德好似看怪物一般看我："当然！伊拉克人很尊重女性。"

事后我查阅伊拉克公布的选举数据，显示在这次省级议会选举的8138名候选人中，有2210名女性。而伊拉克法律规定，无论是国民议会还是省级议会，女性参选席位比例不得少于四分之一。该项法规的修订初衷是为了保证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参与政治活动，但在电视新闻里也有一位女性参选人抱怨，在实际参选过程中，得以参政的女性人数一直被限制在这个比例范围之内，这对女性而言是不公的——女性应得到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对待。在她看来，本是倡导男女平等的政策，却成了限制女性政治家施展才能的枷锁。

这个至善的家族

自从我说了要去巴格达，萨达与姐妹们便在每晚7点准时召开“会议”，讨论我的安危。

每次的会议内容我都听不懂，只有不时穿插其中的“Carrie”“巴格达”“阿玛”是我能听明白的。有时她们也蹦出一些我能辨别出的词汇：“社交网络”“网友”“男性”，我就气急败坏地同她们解释：“阿玛虽是网友也是异性，但他只是好心帮我找车而已。”

萨达和姐妹们看看我，点点头，再转过身去，继续她们的“社交网络”“网友”“男性”。这种以我为主角而我又听不懂的议论一般要持续40分钟，每次都以我盘腿坐在一旁瞌睡得头撞地面而告终。

直到又是一晚的“安全会议”，我再也扛不下去了，干脆盘了瑜伽动作里的莲花坐姿，拍拍一旁的大姐，指了指自己的坐相，挑衅道：“你能做吗？”体型丰满的大姐好奇学做，刚掰起左腿，右腿又松了开去。她大笑，兴奋地去拍身边的姐妹，让她也做。于是，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尝试盘成莲花坐姿。我又使出站立前屈式等绝活，终于把安全讨论大会变成了全民健身运动。

在那之前，阿玛已经联系过我，称他在巴格达的朋友已为我找到可靠的司机前往库区，但我不舍也不敢告别。那一刻，我突然下了狠心，对着刚掰完大腿、气喘吁吁的巴士拉家族姐妹们说：“我要离开你们，前往巴格达了。”

还笑嘻嘻掰着腿的她们一下子急了，问我：“怎么去？”

“坐车去。”

“为什么不坐直飞航班去库区？”她们问。

那时我在印度丢了钱，身上只剩300美元，而前往库区的单程机票就要500美元。

“机票太贵。”

我并未坦诚相告，去巴格达，为的不仅仅是省下机票钱，还因为巴格达是我一直想去看的城市。

巴格达西南90公里处的巴比伦古城遗址是与古代中国、古印度和古埃及齐名的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盛传的“空中花园”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可长大后，再未听谁把巴格达与古巴比伦文明相提并论，在国人眼里，提起巴格达，只联想到“爆炸袭击”。

我颇有心机地隐藏了想看巴格达的这个意图，怕她们责备和担心。她们互看了一眼，最后萨达说：“我们给你买机票。”

我满心感激，却拒绝了这份好意。一旁的穆罕默德不满我的不领情，吹须瞪眼地说：“哎，你们还不如给她买头毛驴，让她骑着去巴格达。”我撇了他一眼，让他别惹我：“我在中国可是开学校的。”

“哟，什么学校？”他问，漫不经心地。

“Shaolin Temple，你上网搜搜看。”我说得一脸诚恳，脸不红心也不跳。

他果真去搜，捂着嘴回来，一双瞪大的眼中满是敬佩和畏惧。多年后，穆罕默德在网上联系我时，还不忘问我“学校办得如何了”，当然，这是后来的玩笑了。

巴士拉姐妹们劝我不过，只好妥协说："明天带你去纳杰夫，再从纳杰夫给你找车子去巴格达。"

我立刻惊喜万分——纳杰夫可是我最好奇的伊拉克城市。一部介绍伊斯兰圣城的纪录片曾介绍过这座城市，它有直通麦加的大道，是伊斯兰学术研究和神学研究的重要中心；纳杰夫与费卢杰、库法、卡尔巴拉并称为什叶派的"四大圣城"，亦是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中心。"圣城"这一称呼，让纳杰夫听起来神秘兮兮。

意料之外的纳杰夫之行

第二天我登上了一辆20座的巴士，里面坐满了萨达的姐妹和朋友——她们都要前往纳杰夫朝圣。

她们把我乔装成穆斯林女性，一路上都小心翼翼地护着我。凡是停车歇息进餐时，她们都嘱我拉牢黑袍和面罩，让我戴上墨镜，不要与其他人有眼神交流。其实也觉扫兴，因为错过了许多与当地人交流的机会，但深明这出自于巴士拉家族的善意保护，便也一一照做了。

车子还在纳杰夫郊外行进，成片坟区已展现眼前，这片有着1400年历史的墓群名为“和平谷”，是全球最大的墓群，有500多万名什叶派教徒长眠于此。随着车子驶进城区，大大小小的土黄墓碑更是如同民居般鳞次栉比地映入眼中。

后来我给朋友看照片，她并未看出是墓群，问：“这些黄色的小盒子是什么？”有趣的论调——人活一世，在离开后，所有的前尘往事都归入一方“土黄色小盒子”，再多情仇爱恨都化作烟尘。

抵达纳杰夫老城区后，我们在旅馆安顿下来。我需要联系父母，于是想去前台问询无线网络的密码。萨达一把按住我，让我别动，她去。

不一会儿她回来，“密码是123。”

我捂嘴笑，密码总不可能这么短。

她又去问，“密码是1234。”

可爱的萨达恐怕不知道无线网络密码是何物，但也不允许我与前台说话，免得暴露身份。于是我把网络抛在脑后，盘起腿，悠闲地打量着各自忙碌的女人们。

家族大姐掂起我脱下的黑袍。黑袍太宽大，穿着的时候像要随时滑落。大姐心细，留意到我平日里不断扯黑袍的小动作。只见她把边线一一拆掉，裁掉多余的布料，再细细地缝合。又有其他家族女性拿走我的面罩，商量如何为我改良面罩尺寸。

这一颗颗心，我拿什么去还。

入夜，她们领我去清真寺。

家族大姐介绍，要去的是始建于977年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该清真寺曾被烧毁，并在1500年及1806年先后重建。1991年，伊拉克人民反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伊玛目阿里清真寺成为领导民众起义的指挥部。在萨达姆军队的攻打下，阿里清真寺被严重损毁，因而关闭近两年。



她们给我穿上黑袍，路上不允许我说英语，命令我下车休息一定要戴上墨镜，不能与路人有眼神接触，以免惹麻烦



城区里四处都是土黄色的墓碑

阿里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穆罕默德去世后，阿里成为哈里发的继任者，后来更被尊为什叶派的第一任伊玛目。他的陵墓就建在这座清真寺内。

清真寺安保严格，包袋电器都不许携带入内，需寄存在一旁的小隔间，男女分开接受安检。所谓安检，其实只是人工搜身。萨达嘱咐我，无论神职人员问什么，都不要作答，装哑。

于是，我一边接受女性神职人员搜身，一边静静地打量这座占地5000平方米、规模惊人宏大的清真寺：大门主色调为金黄色，中央有辉煌的金色大圆顶，两边竖立着高耸入云霄的宣礼塔；门框一侧挂有英阿文字对照的巨大幡帜，标明此乃伊玛目阿里的圣祠；周围有很多扇门，中间主道通向全城；而墙上，有用金铂装点的《古兰经》三章全苏勒——法谛海章、主麻章和奈白易章。

入寺后，信众要男女分开，由不同的入口进内朝拜。

才入清真寺，萨达就失了控。他们深信，真心的泪水可以哀悼先人和洗刷自身罪孽。只见前一刻还温柔嘱咐我注意安全的萨达，同在场所有的男女老幼一样，抓住栅栏失声痛哭，还不时跪下，去亲吻门槛。她歇斯底里地又哭又喊，时跪时趴，叫我看呆。

不时有大哭的信众激动地撞向我，我愈加感到呼吸困难。激动的人群缓缓向前挪动，一步，一步，阿里陵墓的隔间已近在咫尺。从隔间外能看到陵墓呈方形，砌满蓝色瓷砖和镜面，四周用金色的雕花围绕。

队伍行进缓慢，号啕声四起。越是靠近陵墓，信徒越失控。我已迈不开步子，惊恐全然写在脸上。

萨达与姐妹们在我前方几米处，只要她们再向前几步，就可跨进隔间，触摸到阿里的陵墓。然而，竟就在那一刻，她们还顾着回头看我一眼，发现我被人群围住，动弹不得。神圣的阿里陵墓近得伸手可及，她们却交换一个眼神，做出决定：转身回头，护送我出门。

萨达同所有姐妹一道，穿过人潮来到我身边。她们手拉手围成一圈，紧紧地把我护在中心。直到走出门口，来到人少的祈祷区，才见她们把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大姐留下陪我，其余姐妹再次入内朝圣。

比那种呼吸困难的窒息感更长久地留在我心间的，是她们在就要接近自己所信仰的圣迹时，仍回过头去关心我这位陌生游客。萨达与姐妹们，都经历过两伊战争和美伊战争，她们的双眼却没有因为看过硝烟和流血而变得浑浊，亲历他国侵占和炮火袭击的她们，还葆有如此本真的善意。

大姐见我才从受惊中缓过来，便与我聊天，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她起身去女性祷告室里取出一块土制的圆形泥板送给我。这是供什叶派信徒在清真寺里跪拜用的，称为“Turbah”，象征一片土地，信徒礼拜时要用额头去触碰这块小圆板。

朝圣完毕的她们，领我去市区吃饭。路经一家烧烤摊，家族姐妹们停下了步子，兴奋地对我说：“带你吃好吃的！”

她们把一大块烤好的深灰色食物递给我，还帮我裹上了圣女果。我怀着莫大期待，咬上一口，简直膻得身心震撼——是牛肝。膻腥的牛肝，再配上酸涩的圣女果，简直考验人的意志力。我怕吐，不敢嚼，只好整块吞下去。

萨达见我不嚼便吞，以为我饿疯了，开心地说：“好吃吧！”我噎得说不出话，不想叫她们失望，只好点头。她们见状，忙给我递来满满一大盒烤牛肝，我颤着手接过。

突然停电了，整片城区陷入漆黑。那些穿着白袍熙攘往来的男性市民，成了黑暗里泛着的点点白光。巴士拉姐妹们哇哇地叫了一会儿，又继续咬起了牛肝。

黑暗中，不知谁给我递来一罐可乐。一口下去，忽觉幸福：在这样一座陌生的城市，即便没有一丝光亮，我也不惧怕，因为有巴士拉家族的姐妹陪在身边，她们把我团团围住，就像是孙悟空给唐僧画下的防魔圈。在这样一个被视作极端危险的国度，她们与我喝着“敌国”生产的可乐，没人去责怪入侵者，没人提起战争，只不时关切我是否吃饱喝足。后来的几年，我再没有感受过那样的心安，也再没有遇到她们这样可以用生命保护我的陌生人。

晨雾中的挥手告别

第二天清晨，她们把我推醒，说给我找的车子到了，要送我去巴格达。待我穿上黑袍戴上面罩走出门来，所有姐妹已在门口等我，连同一位推着木头车的小伙子，推车上放着我的背囊。

大姐给我一条红色串珠，二姐给我一块白色的祷告头垫，上面刻有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字样……直到礼物塞满我的双手，她们才迈开步子送我走。

东方既白，薄雾中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若隐若现，已有不少信众陆续进入——伊玛目阿里清真寺是逊尼和什叶两大伊斯兰教派共同朝圣的殿堂，全天候敞开大门，进入寺内的穆斯林不分教派，肩并肩礼拜。



巴士拉家族的人同我话别

清真寺金色大门前已站满了售卖祭祀用品的摊贩。巷子拐角处，喇叭里传出唤礼声。不时有送葬队伍扛着棺木，与我们擦肩而过。纳杰夫是圣城，什叶派教徒都希望死后埋葬于此。由于多年战乱，墓碑数量越来越多。

姐妹之中有人开始哭泣，渐渐地，都不再送我，只捂着嘴、挥着手跟我道别。萨达和她的二哥，把我送上出租车。我不知道他们究竟给司机付了多少倍的车钱，这本该是多人共乘的出租车，竟只载了我一人。

忽然，萨达把一大沓钱塞进我的手心，我慌了，推还给她。萨达凶起来，使了一把狠劲，把钱塞压进我攥起的拳头里。这股霸气，我是见识过的，在伊拉克入境官面前一把将我拽走时，她也是如此。



在黑袍中偷偷摄下的阿里清真寺

她拍着心口，直视我的眼睛，动情说道："钱，你要拿着，这是我们给你的礼物，而你，"她指指我，"你是安拉给我们的礼物。"说着，大颗的泪从她睫毛扑扇的眼里滚落下来。

萨达是那么善良又好强的女人。她不愿我见到她哭，一把抹掉泪，把车门甩上，转身就走，不留给我道一句告别的余地。

车子启动了。我回头去看萨达。她其实并未走开，正站着抹泪。

车子朝巴格达方向前进，连片的坟区渐渐消失于视野。没有了巴士拉家族的热闹陪伴和保护，车窗外的风景变得荒凉，前方的未知路途也变得迷漫骇人起来。萨达送了我一条珠子手链，上面缀着一只蓝眼睛，这只蓝眼睛被称作"美杜莎之眼"。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妖，传说她能将任何直视她眼睛的人瞬间石化。在阿拉伯文化里，这只蓝眼睛又被称作"恶魔之眼"，人们相信它能够防御嫉妒的力量，抵御邪恶之神，帮助自己逃避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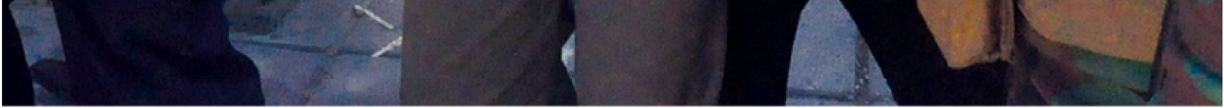
我把手链拿出来，套在腕上。就以这种物质的方式，让我把萨达与巴士拉家族对我所有的恩情，一直、一直戴在身上吧。

（本章原文首发于网易人间）

CHAPTER 4 库区擒狼记

伊拉克


نەخۆشخانەی
OUT



色狼被抓的一刹

驶离巴格达

在巴士拉与纳杰夫，我受尽了来自巴士拉家族的保护，衣着、言行都尽量低调。照巴士拉家族的说法，“在伊拉克，只要有人听见你说英语，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抵达巴格达，几乎每20米，就能见到一处汽车残骸。我问当地人，那是否是自杀式袭击的遗留物，他们答，“有些是。”从沙希德纪念碑、阿里巴巴广场、巴格达塔，一直到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市区满设军事哨卡，几乎每条街都可见装甲车。

后来与阿玛的朋友见上面，他带我去坐出租车。因为电话尚未能联系上此前约好的出租车司机，阿玛的朋友开着车子，在军事哨卡前绕了至少有30个来回。我问，既然要等，能不能开到附近景点看看。他大惊：“景点？！在巴格达，人们最好的娱乐活动就是吃和睡。”



草木皆兵的巴格达，四处可见巡逻的军警车辆



后来司机来了，我们离开巴格达，前往库区。在就要进入库区之时，路上有两辆车发生了轻微碰撞，我眼见两辆车司机因和谈无果，各自冲进车子抽出冲锋枪，指着对方。

我乘的出租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司机为了不惹怒对方，把车速减至最低。我的车窗并未关上，对方司机手上的枪离我的脸颊只有半指的距离。这是真实的伊拉克，是我走出巴士拉家族防护圈后看到的伊拉克。

世上另一处伊拉克

就这样，经历了伊拉克南部几座城市的草木皆兵之后，我的警惕性已被锤炼至最高级别。然而，库区的平静富饶程度却远超我的想象。

阿玛前来接我，参加他联合国朋友的离职派对。我问，需要戴头巾吗，换来的是阿玛的不住嗤笑："库区可是很自由的，戴不戴随你啦！"

离职的是位菲律宾女孩，在伊拉克库区的联合国任务区工作了两年，打算离职后当个背包客，环游世界。而进入联合国前，她在俄罗斯某石油公司驻库区的办事处工作。

伊拉克油气资源丰富，而库区原油质量据说世界第一。当然，那是2013年的排行，无法与新近发现的委内瑞拉原油质量作比较。

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别说喝酒，连买酒都是大忌；然而在库区，市里有特设的基督教区域，人们可以买酒喝酒，而在高级酒店里，就更无所拘束了。

眼前离职派对上的人们喝得烂醉，男男女女眼神迷离地相拥，这是我在伊拉克南部根本看不到的景象。同一国家南北部完全不同的生存状况，让我不禁为南部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感到悲哀。

先前还在负责音响调音，转眼就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籍安全培训官踉踉跄跄地来到我面前，同我说，他就要被派去巴格达任务区了，其他人都可以好好地留在库区，只有他在安全培训部工作才会这么倒

霉。他还礼节性地跟我告别：“这次与你相识，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去了巴格达，不知道还能否活着离开。”

我默默地听，摇动着手里的鸡尾酒杯，想着巴士拉家族的女性们，萨达告诉过我，几乎所有伊拉克南部民众都想移居到库区，然而虽是在同一个国家，南部民众就连来库区游览都需要办理签注，且这纸签注只允许他们在库区停留7天。而我在库区认识的朋友将外省人称为“伊拉克人”，把自己称作“库区人”，骨子里的不认同感显而易见。



那时的库区随处可见大片的油菜花田，平静安详

醉醺醺的意大利女孩，走向了点歌台。在联合国驻伊拉克任务区担任安全官员的她，有用意地点了小红莓乐队的反战歌曲《Zombie（行尸走肉）》，拿起麦克风，自顾自地唱起来：

Another head hangs lowly

又一颗头颅低垂

Child is slowly taken

幼童逐渐失去生息

And the violence caused such silence

暴动过后，是一片沉寂

Who are we mistaken

究竟谁是罪魁祸首

But you see it's not me

你清楚我是善良的

It's not my family

我的家人也跟我一样

In your head, in your head, they are fighting

在你的记忆中，人们手足相残

With their tanks and their bombs

用他们的坦克大炮

And their bombs and their guns

用他们的钢枪铜弹

In your head, in your head they are crying…

在你的记忆里，他们在哭喊……

本是欢乐的离职派对，舞池的流光里，走动和拥抱的人影显得模糊不清，人们或大声或低语地祝福着菲律宾女孩前程似锦；然而，却因着这意义深刻的应景歌词，闹哄哄的场子逐渐安静了下来，陷入意大利女孩厚实的嗓音里……

与色狼斗勇

在伊拉克南部一个月建立起来的小心谨慎，在库区被逐渐磨尽。干脆弃掉黑袍，头巾也自然是不去戴它了。

一日，我在清真寺门口拍照，空荡荡的街上有一个陌生男子朝我走来，想同我握手。见他怪异，我避开，没搭理。

他不甘，与我打招呼，却神情怪异。万不料，男子忽然冲上前来抱我，一只手搭在我胸上。

我大声呼救，可街上根本没人，于是我赶紧伸手去摸随身小袋里的胡椒喷雾。

男子好奇，放开了我，竟不跑，笑嘻嘻地看我在搜寻什么。

胡椒喷雾装在皮袋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男子没被震慑住，眼里再次闪出淫邪的光，朝我靠近。

我立马拔出皮袋子里的胡椒喷雾，不敢喷，只吓他。他一看，拔腿就跑。

就在那一秒，我在心里问自己该不该追，随之浮想起他第二次还意欲靠近的样子——如果我不追，他在未来仍会对别的女性下手。

追！

我跟着他跑，追了大半条街，他甩开我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无巧不成书，正好有一辆出租车经过，我拦了下来，司机也不知听懂了没，看我激愤的样子，加大油门向前开。不料色狼跑到街对面去，车道中间的绿化带叫出租车无法调转。

看着他跑远，我的情绪沮丧到极点……突然发现，在他不远处有一间警局，负枪荷弹的20多位警察正叉着腰聊天。

我朝车外大喊："抓他呀！"警察们闻声齐齐冲过去。

我下车走过去，警察一看我是外国人，开心不已，兴冲冲地问："他做了什么？"

"他摸我！"

警察一愣，"什么？"

"这个家伙在街上摸我！"

警察竟泄气，"只是摸了你啊？"

我一听，谎话脱口而出，"不，他偷我的钱。"

呀呀呀呀，是小偷呀，小警察们很兴奋，一把将他反扣起来，押进局子里。

警局里审讯的警官不懂英语，让我等候库区总警长。

等了一个小时，应了几乎所有警察的要求，跟他们拍了数不清的自拍合影，满足他们没见过中国游客的好奇，总算等来了警长。

我跟警长坦白，这坏蛋没抢钱，但意图劫色。才说着，色狼竟"咚"的一声跪下，求我原谅。

我连余光都懒得扫他，继续跟警长陈情：

“从伊拉克南部一路北上，我尽享陌生人的善意，他们穷尽己力，来保护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旅游者；在战乱纷繁的国度，血腥和硝烟，不仅没有让他们变冷漠，反而因此更珍惜人生，更葆有善意，他们让我铭记一生。”顿一顿，我继续说，“然而，这个色狼，搅坏了我对这个国度的印象。”警长一听，上升到国家层面可不行，忙解释：“我工作这么久，的确头一回看到这种事，别说对外国女性下手，就是发生在本国女性身上，这种事也非常罕见。这个人，我们一定好好处理。”

“算了，放了他吧。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知道他们不会放人，但中国人大度的形象还是得树立。警长让我先离开，说稍后会按我的意思把他放走。

关上门那一刻，传来“嗷”的一声惨叫。究竟他最后被释放没有，我也不关心了，我关心的，是他的色心被治住，未来不再有女性受到来自他的骚扰。

再后来，我认识了很多库区的朋友。

新朋友伊万是当地大学农业学院的教授，其时正逢毕业季，伊万邀我到校区参观毕业典礼。我思虑了一番，才决定不戴头巾去，进了校区，才知自己杞人忧天：眼前的毕业生，男生西服革履，女生都化上艳丽的妆，搭着金光闪闪的礼服裙。同他们聊天，得知有人已准备过几日前往欧美地区继续深造，有人要用家人给的资金去开一家甜品店。眼前的学生们神情天真，对未来摩拳擦掌，同我在伊拉克其他地区看到的忧愁面孔比起来，好似生活在不同的时空。



这里有着与伊拉克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男女相处氛围和衣着风格



我被女孩们美艳的妆容和着装惊住了，不敢相信这是在伊拉克

另一位新朋友霍格身兼数职，既是埃尔比勒的政府雇员，又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驻伊拉克制片人，还兼着伊朗电视台记者的职务。游刃于各大媒体的他，却没有那副八面玲珑的人精模样，反而老实执着，三句不离新闻理想。他抱怨说，撇开美伊战争历史不谈，美国政府在库区其实也有建树，但凡是如实报道的片子，一律被他的雇主之一伊朗电视台毙掉，或是被改头换面，换了稿子改了词，把美方的是说成非。

霍格邀我去家里做客，我则请缨要做顿中餐。霍格的父母不懂英语，但仍在厨房里跑进跑出，帮我备菜。霍格的大哥在当地政府任要职，弟弟仍在念大学。一家人教养极好，文质彬彬。

我离开的那天，霍格的大哥送我至机场。他执意要看我过了安检再走，但我见已是凌晨，不愿麻烦他，还是请他送到机场门口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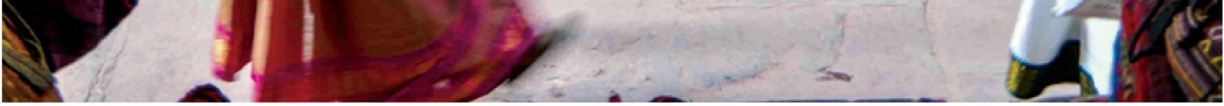
其时在伊拉克已逗留月余，超出了旅游签证的停留期限，我却浑然没有察觉。到了出境处，冲着两位熬夜加班的边境官笑着道一声“晚上好”，把护照递过去。对方挑起眉来，严肃地说：“你的签证已过期，这种情况轻则罚款，重则入狱。但看在你这声‘晚上好’的分上，还是让你走吧，下次再来伊拉克，一定要留意签证细节。”

道过一声谢，心里却是一阵悲凉：这个带给我无限感慨的国度，不知以后是否有缘再踏入了。

CHAPTER 5 印度行纪

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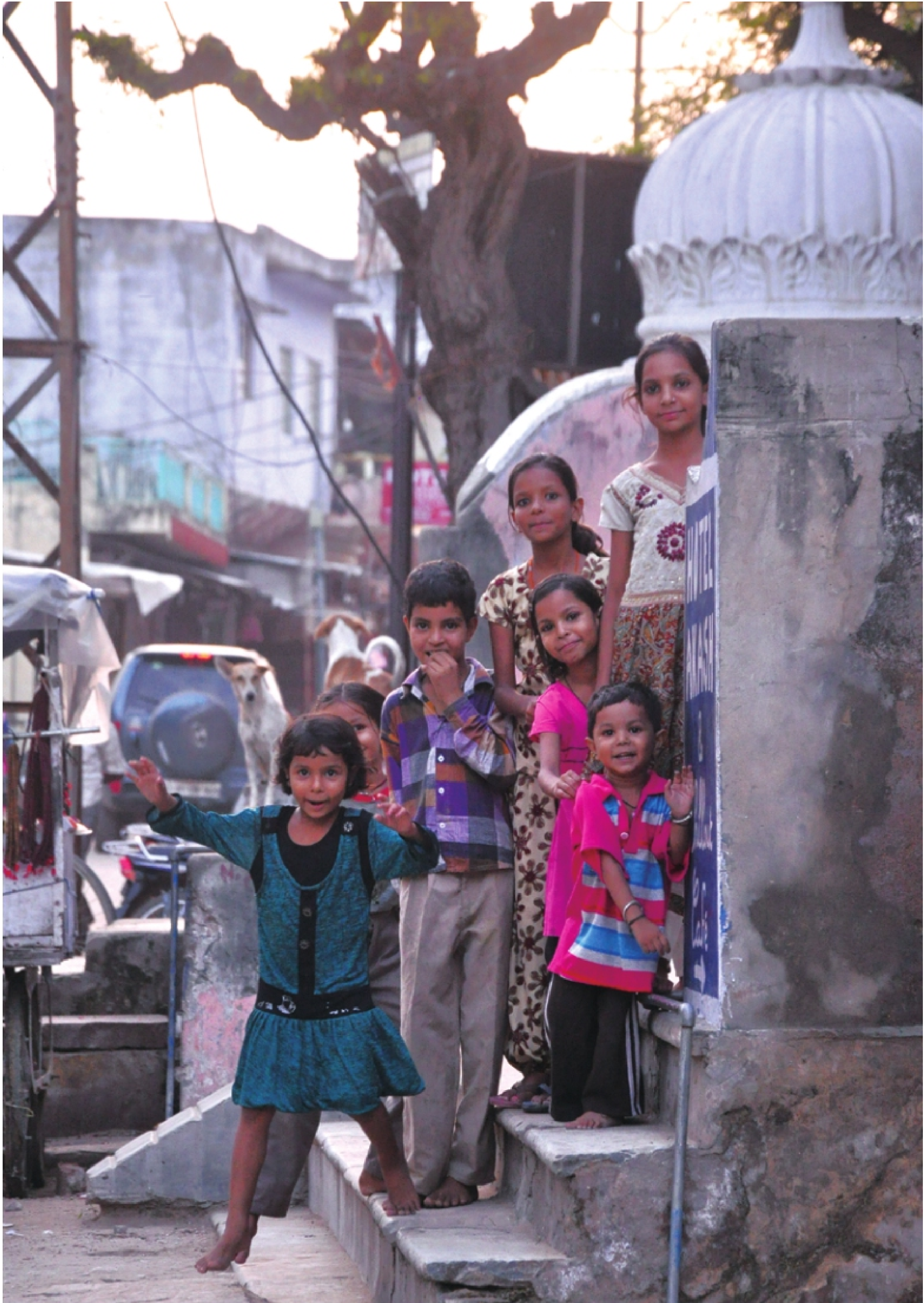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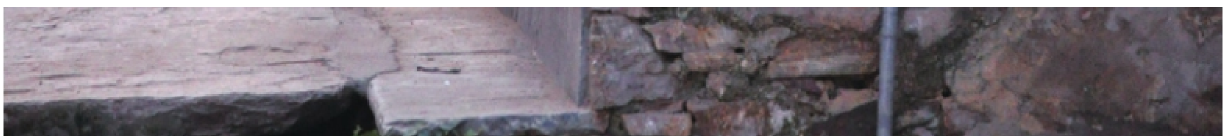


印度瓦拉纳希街头

每年都去印度一次，一待就是一个多月。

身边的人，都以为我是对印度爱得痴狂。实则不然，我对这个国度感情中立，不过分推崇，也不一味嘲贬，只是去的次数多，大小城市的街道路线都记在心中，且在印度见到的文化冲击也是别的国度寻不到的内容。不敢自以为对其文化有多深的了解，但与印度人之间的故事，倒是集了一心房。这些故事像是随身带着的话梅糖，甜又涩。





这家的小孩在街头遇到我，把我请到家中，用一种叫“罕娜”的植物染料，在我手背上绘画。我离开时，还轮流跟我道别

睡过道的人

印度火车卧铺以空调和风扇区分出等级，新空调卧铺大多提供洗净后独立包装的枕头、床单和毯子，长途车程更供应三顿餐食。而风扇卧铺则只有一张软垫和头顶那几个永不歇止的电扇，吹得人脊背发凉。设备齐全的空调车厢里不乏各国旅人，而风扇车厢里就大多是印度本地人了。

开始也有顾虑，怕风扇车厢的乘客会毛手毛脚，毕竟印度的治安情况一直是外媒关注的焦点。但那时还是学生，见票价实在低廉，干脆每次出行都选择风扇车厢，根本不怕当苦行僧。

第一次到印度旅行的一个多月里，睡过几回风扇车厢，同车厢乘客大多是印度人，倒处得相安无事，也未见有人夜行不轨。

在印度南部待了3周后，我决定坐火车去北部圣城瓦拉纳西过胡里节，车程足有12个小时。

还没上车，心情先糟起来：每趟列车长啸而来，都卷起沙尘股股，扑向在一旁候车的我。我起身跳跳，拍了两回，身上仍能抖下沙土。空调车厢乘客登车尚算有序，而风扇车厢的乘客则能挤就挤，窗户上一会儿塞进一包货物去，一会儿伸出一只脚、爬出一个人来，也见怪不怪。

等乘客上得差不多了，我开始上车。

突然，停电了。风扇卧铺里一片漆黑嘈杂，嗡嗡嚷嚷的声音此起彼伏，却看不清那一张张脸的表情神色。

我身后有人打开手机手电筒为我照亮过道，我正要回头去看清好心人的脸，忽地一下，来电了。车厢里那些杂乱的嚷嚷声都配上了鲜活的面孔：有的人一手捏着票一手指着床位，示意床位上坐着的人让座，言语不足用，伸出手扭扯着对方衣领；有的人正速速往铺位赶，好为行李占个足够的空间，脚步匆匆，不顾踩了过道上多少双无辜的脚，也吝于拧头道声抱歉。

过道本就狭窄，乘客的大包小包躺在地上，更是堵住前路。眼看着属于我的25号铺位就在几步开外，却怎也找不到迈出下一步的空间，只好愣站着，等身边乘客塞完货物和行李。

这时，一米开外有两个坐在上铺的小男孩，努力地把头从人堆里探出来，看向我，满脸笑意地问："你几号床位呀？"

"25。"我答道。

只见两个小男孩缩肩弓腰、左躲右闪穿过行李和货物，来到我面前，领着我，一路叫其他乘客让开，总算让我坐在了25号床位上。

一位穿着纱丽、披着纱巾的印度老太太，瘦骨嶙峋，倚着我的床位看向窗外，不一会儿就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半天才转头看我，不知是发现我是陌生人还是发现我是外国人，忙把手收回去。她儿子搬好行李后，坐在我身旁，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

实是沉闷，夜里10点多，我佯装要睡觉，把老太太和她儿子赶回自己铺位。我把围巾裹在身上当被子，背对着大伙儿，没留给任何人和我交谈的余地。

直至火车开动，卧铺里的灯光熄灭，习习凉风从窗缝涌入，我才转过身偷偷观察身边的人们。两个小男孩睡一张床铺，位置狭小，他们一人躺着，另一人倚在床边坐着入睡。

老太太睡我对铺，骨架瘦小，毯子里像是没人。定睛一看，老太的儿子竟然睡在我们床铺间的地上。视线移向我自己的床铺，我的脚边竟然还坐着一个人，侧身倚着爬梯，头也半靠在爬梯扶手上，半睡未睡的疲惫模样。我猜他该是坐一会儿就走，便没理会。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我再看他，竟还在。我拍他肩膀，问他："你的床呢？"他听不懂，我指指他，又指指床："你的床呢？"他胡乱指一通，最后停在对床上铺的方向，"呜呜"的嘟囔着。我想，尚算是有床铺的人，猜他一会儿就回去睡了。便没再担心，又躺下去。说不担心，还是伸手摸出防狼喷雾，一直握在手里。

睡了一会儿，心里不踏实，又去偷瞄那人，居然还在！这时窗外已下起大雨，虽关了窗，仍有风源源不断灌入，吹得我头疼，我便想着头脚对换方向，也算是个撵人的借口。我又拍他，他估计是睡着了，被这一拍惊动，转头看我。

我没好气，指着他身后的方向，又指我的头，说："我要头朝这边睡。"他神情慌张又抱歉，"噢噢"的应答，还连说了几声对不起。

我脚对着窗户躺了下来，头枕在他臀后的空位，想着这回他总得走了吧。十几分钟后醒来，抬头看他，还在！怕他是要趁人们都睡着后占我便宜，我气得一屁股坐起来，再不客气，用力拍他，指着那所谓的"他的床铺"，对他说："你回去睡！"他看我怒气冲冲，赶紧起身，唯唯诺诺地点头。我这才放心躺下。

夜里，我起身去上厕所，漆黑一片中伸手去摸自己的鞋子。恍然触到地板上一抹衣角，发现那人居然睡在过道上，只在身下铺了一张极薄的被单，冷得缩成一团。猜想他之前一直坐我床边，也许是想等大家都睡去，过道空下来，他才能在地板上睡。我心有歉意，蹑手蹑脚地，生怕穿鞋子的动作会吵醒他。

过道实在挤，中间睡着老太儿子，另一边又睡着那个人，我不知何处可落脚，暗夜里观察了好一会儿，可还是踩在那人的被单上，把他吵醒了。

他一看是我，慌得立马坐起，给我腾出空间。我上完厕所回床铺，看他仍缩着身子呆坐等我回来，直到看我跨过他的“床铺”，回到自己的床上，他才安心躺下。

躺下后，我用手去摸手机，摸不着。

心里明明记得手机是放在铺位上的，起身翻随身小包，还是没找到。我看那人，他也看我。

找出手电筒照亮床边和床底，也还是没有。不过是上一趟洗手间的工夫，手机就不见了。我止不住地看那人，直觉觉得他就是嫌疑人。我向他借手机，想给自己打电话，还幻想着电话一接通，他的裤兜就会发出亮光，看他届时如何收场。不料那人称自己没手机，没法借。

他也急，站起身去拍醒上铺的两个小男孩。小男孩开了头顶的阅读灯问何事。我向他们借手机，他们丝毫没犹豫，给我递来手机，可惜当时列车正在乡间飞驰，手机没信号。

动静太大，把地上的老太儿子也吵醒了，问我怎么了。我说起手机不见的过程，阐述间隙还用余光去瞄那睡过道的人，想观察他表情。老太儿子听了，低头去翻自己的外套，只见他的外套足足缝了好几层的秘袋，他从中翻出一个厚纸包，先把纸巾层层剥开，取出外层的一些硬币，又继续一层层地剥，最后居然从这俄罗斯套娃般的纸包里取出一部手机，递给我，说，你打给自己吧。

看他藏财物的方式奇妙得很，焦心如我，也忍不住笑了。接过他的手机，却发现压根不记得自己的印度号码，只拼凑出一个大概的号码，也不知该不该拨，拨错了浪费老太儿子电话费不说，三更半夜，还扰了无辜人的清梦。

左思右想，忽然记起火车票订购单上，填了自己的联络信息，应该包括手机号，便伸手去摸随身包里的秘袋。

这一摸，竟然在秘袋一角摸到了自己的手机。我愣住，足足用了5秒来酝酿演技，装作惊讶地取出手机，歉意万分地看向大家。

过道那人最开心，哇哇地叫，还转身去拍小男孩，笑得满脸傻气。老太儿子和两个小男孩顿觉轻松，也跟着笑。不知道过道那人如此开心，是否因为察觉到了我对他的猜疑。

乘客们又再睡去。

没多久，车厢外蓝紫的晨光一片。远处过道传来茶水的售卖声，印式拉茶的浓香在车厢里弥漫开来，中途要下车的乘客也缓缓起身交谈，睡眼惺忪。眼看着身边过道就要热闹起来，我不禁担心那人还怎么入睡，于是起身去看他。

他走了。过道空了。

脑子里浮现出他慌张又抱歉的神色，和那蜷缩起来的瘦弱身板，还有他身下那张不御寒的薄被单，不禁恨起了自己的愚蠢和大意——不知他去了哪里，不知昨晚那份不信任有没有刺伤他的自尊。

他曾睡过的过道已遍布匆忙的脚印，但我的心却空落落的。

并未死去的人性

第一次去印度旅行时，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逛得无聊了，一个人跑去看印度电影。印度文化产业不容小觑，从宝莱坞影片到平面广告都有极多出色作品，只是能够像阿米尔汗那样聚焦贫穷等社会问题的影人并不多。

3个小时的印地语片子，我只能通过画面和偶尔蹦出的英文单词去猜剧情，却也看得入迷。有人觉得宝莱坞影片里，骤响骤停的歌舞场景显得庸俗虚假，但这的确是印度人的真实生活场景：我认识的印度友人，总能在对谈气氛愉悦时忽然就跳起舞来。

看完电影，去吃快餐，看见一位约莫80岁的老人在独自进餐，他正双手颤巍巍地用杯盖从可乐里舀出冰块来。我在他对面坐下，抽过他的杯盖，帮他把冰盛出来。我甚至没去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对我的突兀，他也不恼。



繁忙的金奈街头

繁忙的金奈街头

老人记忆已模糊，吐字也不清晰，说的英语却难得没有印度口音。聊天中，我得知老人在印度最大的报业集团当了半辈子记者，退休后创办了一所幼儿英语学校。吃完东西后，我扶老人出餐厅，陪他等待那辆接他的车。

走出餐厅，怕他不喜欢，我并不刻意去扶他，只在一旁准备着，在他需要时上前帮一把。并不是每位老人都服老，也不是每位老人都希望被帮助，有的老年人认为“老”意味着社会价值的丧失，他们因此更希望以不服老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老人行得极慢，在烈日下我们走走停停。走着走着，老人缓缓地停住脚步，转头对我说：“遇见你，让我发现，正在消逝的人性其实并未真正地死去。（Encountering you reminds me that the dying humanity hasn't died yet.）”

他同我聊幼儿园里的教学轶事，聊设计教材碰到的困惑，时不时提醒我有急事可先走，不必陪他。

等了约20分钟，一辆加长版豪车停在我们面前，戴着丝绸手套的司机匆匆下车，擦着汗紧张地为自己的迟到频频致歉，并将老人搀扶入座。我想，老人退休前的职位绝不仅仅是报社记者这么简单。

告别后，老人给我的名片早已不知被我塞到何处。我随性，更不大有惦记他人的良心。只要异域的天气和温度都凑得完美，我便有结识新友的心境，然而一旦旅行至新处，我的心又沉醉到山川湖海里去，上趟行程里交的朋友早已不去挂心，何况与老人只是萍水相逢。

一年多后的一天，我收到一份国际快递，来自印度。与快递员再三核实不是错件后，我拆开包裹，里面是一台小型的天文望远镜，附上了一封花体英文信，落款是老人的儿子。



印度街头

信一开头便是平静的噩耗，对方告知，与我在快餐店偶遇的老人前段时间故去了。老人弥留之际，叮嘱儿子许多未尽之事，包括把他的藏书全数捐给当地图书馆。病榻上的他记得我聊天时说过自己喜欢天文学，因此嘱咐儿子给我寄出这份礼物。

信里，老人儿子向我致歉，说打理老人的后事用了许多的时间，因此望远镜才迟迟寄出。这样一份受之有愧的礼物，送出者竟还要为寄出时间而道歉，这是一份学不来的修养。

信末还提及，老人是一位作家，年轻时跑过战地做过新闻，晚年还创办了教育机构。那台天文望远镜放在我的书柜里，每每看见它，

那个烈日里的记忆就回到我的脑海中：老人笑着说自己设计的教材过于高深，孩子们看不懂；说自己两鬓斑白了，在教育领域却是个新人，每个夜晚都要研读教育类书籍；司机迟到，老人被晒得眯着眼睛看我，汗沿眼角流到面颊，却没听他抱怨半句，只向我解释“新德里交通糟糕，司机也不容易”。

这是真正不死的人性。

蓝城里的“未婚”老头儿

赶在日落前，要爬上古堡旁的城墙。

焦代普尔古堡曾全天候开放，近期却在黄昏时分闭门谢客。只因在不久前，一位印度青年登上古堡最高处自拍，照片不知拍成没，人却重重摔落下去，尸体挂在檐尖上。自此古堡在黄昏后不再开放——这就是印度人的逻辑，明明可以设置围栏或加强园内管理，却选择了懒政。

眼看就要到城墙，我累得喘不过气，无暇留意身旁坐着一位歇脚的老头儿。老头儿正清理着鞋里的沙砾，冲我笑：“给我拍张照吧。”说着指了指我手里的相机。

在印度，这样的人太多了，不是想揩油，就是想讨钱。我扫他一眼，没搭理。

坐了一会儿，看老头儿一直眼巴巴地望着我。面对这份对于一张留影的渴望，我不禁心软，招招手，让他过来，“咔嚓”，随便给他拍了一张，敷衍得连背景是一片灰黄的土墙都不在乎。

老头儿从裤袋里掏出纸笔：“我给你地址，你可以把照片给我吗？”

起初，我以为他是想搭讪，没料他是真的想要照片。想着他对一张照片的期待，我感动了，点头说当然可以，猜想他留的是电子邮箱。

不料他却写下家里的邮寄地址，我无奈：“实在很难给您寄过去。”

老头儿执意：“可以的，请你尝试一下吧。”

“您没有电子邮箱吗？”我问。他摇头。

“您孩子也没有电子邮箱吗？”他低头，沉默一会儿，说道：“我没有孩子……”

“您太太不懂上网吗？”我继续问。他不作答。

我又问：“您的朋友总有电邮吧？”他还是低头沉默，半晌后说：“小姐，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我甚至连朋友都没有，一个都没有。”

“不可能呀！”

“小姐，我真的没有朋友。”他头垂得更低了，微风在他发白的胡须间柔柔穿过。

我听得心酸，开始打量他：眉梢和鬓角的发须都细致修剪过，卡其色的长裤连褶子都难见，衬衣有致地束进裤腰里，干净齐整。印度街头的男性多趿着一双简陋的皮凉拖，后跟处也不穿牢，只踩在脚板下，边缘磨得稀烂；老头儿却讲究，穿的是软质登山鞋。连家人朋友都没有的他，还拾掇得洁净体面，想必是在乎自尊的人。

我答应他：“我试试吧。”



鸟瞰蓝城

老头儿笑了：“小姐，不勉强，但也请你尽量尝试一下。寄不到的话，没关系，放轻松。你开心就好。”

见我不语，老头儿又安慰我一句：“真的，你开心就好。”

老头儿身后是北印蓝城焦代普尔，他身上的卡其色长裤和白色T恤衫，在这一水的蓝色汪洋里，更显孤单。

跟老头儿告别后的夜里，我拿出字条来细看。他没留电话号码，我没法寄快递。

再细看，“焦代普尔”，这压根是本城的地址嘛！我以为他同我一样，是来旅游的，没想到他就住在城内。

我盘算着给他送照片，翌日起了个大早。

打印店不好找，近40摄氏度的天气里，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一家。又细细分好尺寸，全景的那幅打印一张大的，好让他摆家里，纯人像的那张，既洗了标准的相框尺寸，又印了钱包相格的小尺寸。再细想，干脆印了一张人头照，想着万一老头儿要征婚寻偶，也用得上。

一路走一路问，在喇叭轰鸣人声扬尘里寻了近一个小时，总算找到老头儿的家。还没敲门，一旁厕所里走出一个男人。我指着字条上老头儿的姓名问他，他颇热情："进来吧，进来吧，他就住这。"

不敢掉以轻心随他进屋，我问他："你确定是这个人？"

他说："确定得很呢！"

"凭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我父亲呀！"

我惊得合不上嘴。

随他走进大屋子，见老头儿正坐在地板上，和家人们喝着茶，一派其乐融融。见了我，老头儿又惊又乐，拖鞋都顾不得穿，起身迎上前来。

我又好气又好笑地怪他："原来你骗我呀！"

他也不解释，只尴尬地摸摸头，笑着邀我去和家人坐坐。

想起自己的担忧和同情，我笑得俯下身。

老头儿的孙子英语很好，在当地念的是学费高昂的英式私立学校。我问他，老头儿是干吗的。他说，爷爷以前在焦代普尔大学做行政工作，现在退休了，"私人工作"是闲时去古堡让人家给他拍照。

我又忍不住笑。孙子继续说：“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收集各种他自己的照片，但外国游客都不搭理他。别说送照片，就是拍照和冲洗，你都是第一人。”

我损老头儿：“你爷爷演技好着呢。你是没看到，他当时那副低着头沉默一会儿，说自己没结婚没孩子的模样。”

小孩子笑着翻译给奶奶和姑姑们听，女人们凶巴巴地指责起老头儿来。并不是真的凶，只是凶给我看。老头儿挠着头，还是乐呵呵的，一脸调皮。我这才发现他满嘴的牙都掉光了，只剩一颗虎牙，孤零零的；他一大笑，那颗牙更是摇摇欲坠。在山上时，他可不是这副模样：毫无笑意、满面忧愁，我哪有机会看到他的牙。

孙子责怪他骗我，我说，我可没生气，我开心得很呢。本来还忧愁他一把年纪却没有依靠，现在看他家族大维系紧，我也就心安了。

老头儿的房子很大，足有4层，至少10间客房，4个子女里有医生有律师，皆事业有成，6个孙子则在印度各地求学。一旁站着的儿媳，肚里还怀着女娃娃。聊起这个将要诞生的孙女，老头儿脸上喜滋滋的，可见不是重男轻女的人。老头儿和俩姐姐同住，家中装潢大气、颜色搭配讲究，不是焦代普尔普通民众的住宅能比的。



老头儿的家人

老头儿和他家人留我吃饭，我怕打扰，找了借口开溜。

他执意送我到街口，劝我："把旅舍退了吧，过来住，我太太每天给你做饭吃。"

得知我第二天就要离开蓝城，他又真诚地说："下回再来访，别住旅舍，直接住我们家里。"

"好，一定。"

也不知是真答应他，还是我也撒了个谎。

圣城瓦拉纳西

瓦拉纳西是我最熟悉的城市之一，每年的印度之行都要去看它一眼。

国内媒体对印度现状的报道，没有误导，但却片面，而常拿来吓唬读者的“牛粪满街、臭气熏天、脏水横流、恒河浮尸”说的正是瓦拉纳西。这座卫生条件叫人堪忧的小城，却同耶路撒冷、麦加和梵蒂冈一道，被视为全球的精神圣地，六千年来受着无数印度教信徒的朝拜。

白日里的瓦拉纳西，街巷里人声鼎沸，喇叭声此起彼落，而清晨拂晓和黄昏入夜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日出时分，大批本地和外地赶来的印度教信徒来到恒河边上晨浴净身，他们称此为“晨间圣浴”，并认为这一生中至少要在恒河中沐浴一次，让圣河洗净生生世世的罪业；入夜，恒河边有四处祭坛，由种姓制度里最高阶的婆罗门男祭司，持办这场已有数千年历史的恒河夜祭。圣坛边烟雾缭绕，梵音钟声环绕着会场。

除当地人对印度教的虔诚外，瓦拉纳西所特有的生死观，无疑是它最大的魅力之一。印度教徒认为，凡人一生中产生的业，决定了他的灵魂在转世重生时，是成为更高等或更低等的人，还是变成一头兽，甚至是昆虫。他们深信，瓦拉纳西作为印度最古老的城市，是天堂的入口，若能在此死去，贪、嗔、痴亦已灭尽，便可得到湿婆神的庇佑，免受转世轮回之苦，达到超脱、寂静、安稳和常在，涅槃升入天国。

瓦拉纳西在恒河边上有两处24小时工作的人工烧尸庙，不仅当地人死后在此焚化，更有大批外地信徒嘱托家人在自己死后将尸体运到此处焚化。

印度传统里，有几类尸体是不接受焚化的，包括苦行僧巴巴、怀孕女子、幼童以及被蛇咬死的人，还有动物。而印度一些地方习俗认为，对未婚女子进行水葬，可以让她重新投胎回同一家庭。因此这几类尸体都会被直接放入恒河中，任其泡胀腐烂，漂到下流后被秃鹰啄食。工业排放、生活垃圾和肿胀的浮尸，在恒河的支流和下游肆意地污染着水源，传播着疾病。印度总理莫迪在竞选时，也曾宣誓过要对恒河进行大清理。



在恒河沐浴的人们

多年前第一次到印度时，我写下这般旅途感悟：

印度教传统里，认为火化尸体能让灵魂意识超脱至圆满，从而脱离现实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

印度人视焚尸仪式为一场宗教盛宴：逝者遗体放入恒河水中净身三次后，被裹上喜庆的灿金色麻纸，按重量配以适量木头焚烧，烧为

灰后象征性取出几把放入瓦瓷骨灰盒中，再用小船载到恒河中央敲碎倒入河中。

逝者家属在仪式后要下恒河圣浴，象征与逝者脱离关系，家中不摆遗照不设灵堂，因逝者已往生，不再眷恋前世。这似乎是印度宗教观念里，最打动我的部分：一切情感一切外物都无法逃脱生老病死，人们该看淡生死，学会豁达。

过几年再去瓦拉纳西，与恒河边上的船夫闲聊。他好奇于我对瓦拉纳西的感情，想知道是什么让我每年来一次这座小城。我答，烧尸庙。他诧异地问原因，我说，烧尸庙旁的逝者亲属，大多冷静，连看见包裹逝者遗体的金色麻纸被牛舔舐，都毫不动容，由此可窥见印度教徒对生死的从容。我述说得头头是道，自以为几次长途旅行已让我对这个国度有了深层次的认知。



观看恒河夜祭的人们



河畔的小孩和船上的游客都看得入迷



恒河旁卖菊花的妇女


RUPA
RUPA



恒河夜祭



恒河夜祭



恒河夜祭



不想船夫却表示反对：“不，我们对待死亡一点都不从容。”

他问我，“你知道为什么烧尸庙不让本地女性靠近吗？因为女性感情太丰富，很难压得住情绪。她们总是止不住哭泣，而在我们印度教观念里，认为这会让逝者不快乐，难以轮回。”

他继续说：“两年前，瓦拉纳西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驾车旅行度蜜月，没想到出了车祸，丈夫当场死亡，而妻子仅受皮外伤。丈夫的尸体被送到恒河边的烧尸庙，以人工用木头火化，可就在火化进行到一半、正是火势最大时，妻子忽然扑向火堆。由于火太大，没人敢救她，她被活活烧死。

“在那之后，为防止再出现‘殉夫’行为，也为了不让女性的恸哭失控延缓逝者升天的脚步，瓦拉纳西烧尸庙谢绝逝者的女性家属近距离参加火化仪式。而男人们，尽管表面不大声哭泣，但他们的心在悲伤。”



为尊重逝者，游客一般不靠近焚尸场拍照，都在远处拍



争着从火中取枝条，去点亮祭师手中蜡烛的信众



恒河浴场



瓦拉纳西街头





恒河里嬉闹的孩童

船夫说着，掏出自己的钱包，给我看相格里的黑白照片："我的父亲去世几年了，我一直揣着他的照片，每天都为他祷告。对于任何国家的人来说，死亡都不是轻松的事。"

这番话，使得我对印度教生死观的见解全数坍塌，原来他们也一样，即便相信轮回，也并不觉得生死是可从容面对之事。

常去烧尸庙看告别仪式，看得多，也自然熟悉那一带的讨钱手段。只要外国游客走近烧尸庙，就有当地人迎上来，说是做义务讲解，可几分钟的简单介绍后，就会让游客付钱，理由是"用作焚烧尸体的木头运费昂贵，你们给的钱会捐以买木"。

印度教徒深信，以人工用木材焚尸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得灵魂缓缓进入天堂，因此家中只要付得起木材费的，都会选择手工焚烧。贫苦的人，只能在感知到生命将终结时，步行到火化场处，在焚化炉旁择地而睡，死后被电炉焚烧，这笔费用由印度政府拨款支付。

在烧尸庙工作的印度人认为，烧不尽的，就是最强大的。他告诉我，一般而言，在火化后，男性会被烧剩胸骨，他的解读是，"男人用胸腔扛起人生的一切责任"，而女性会余下盆腔骨，这是因为"女人最伟大之处在于孕育新生命"。烧尸庙的前方，就是恒河浴场，人们毫无忌讳，在此圣浴、刷牙、嬉闹。

在瓦拉纳西，生与死之间没有界限。这里，没有拿不起，没有放不下，有的只是超脱世俗的从容，都清楚，都是人生，都要走到终点。

合不上的嘴

尽管有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但印度的基础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文盲率居全球高位，加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和贫富差距悬殊，国民素质参差不齐。

这样的国度里，总有意料之外的境况，也让我的每一趟印度之行，都见识了不同的面孔，那些虚伪、和善、好奇、单纯的脸，都是构成旅途奇遇的要素。当然，也总有那些吃不饱的嘴，在每一次的旅行回望里，贪婪地大张着，永不知足。

______日落大道的花童



孟买日落大道的花童剪影

印度北部宝莱坞之城孟买，有一条日落大道，一到黄昏时分，满是依偎的恋人。印度街头四处是伸手乞讨的儿童，日落大道却不同，大多街童在这里售卖玫瑰，一支10卢比，廉价得近乎免费。街童不讨钱，自力更生，似乎叫人欣慰；但一想，本该念书的年纪，却在烈日下干着苦活，又叫人痛心了。

一日，在日落大道歇憩，一个小女孩带着弟弟凑上前来，双唇干裂着，双眸却水汪汪。顾不上道德标尺，我给了她200卢比。她的眼睛忽地燃起亮光，给我递上一大束玫瑰。我不喜欢花，要了也是浪费，但不要的话，容易误导他们不劳而获，于是取了一支，笑笑说："够了。"

本自觉是爱意满满的故事，花童小妞却给它换了结局。她拽着弟弟，往身后的花童堆里一扎，细细嗡嗡地说了几句，只见十几个花童瞬间兴奋地朝我涌来，还没碰到我，就已经因为插队而互相争了起来。

同情心向来不是良好的药剂。眼前的孩子，有的干脆连花都不递了，脏乎乎的小手掌摊了开来，直截了当地，要钱。钱钱钱。

______被毁容的妇人

在瓦拉纳西时，我总去看夜祭。

一次，河祭行进到一半时，一位妇人靠上前来，挥挥手中一小沓朱砂贴纸，用中文对我说："100卢比，很便宜。"我不望她，她也不放弃："只要100卢比，全部卖给你。"英语都说不好的小贩，为了讨好中国游客，还要去记那难于登天的中文发音，生活真不易。贴纸于我，实在是可有可无的饰物，但同情心还是把我的头扭向了她。



街边店铺与卖花为生的印度妇女

这才发现她没有鼻子，显然是让硫酸毁了容。在印度，女性被丈夫以硫酸毁容的例子并不少，女性没有寻求正义的场所，更没有可请求援助的社会氛围支撑。

我更不忍拒绝了，掏出20卢比给她，从20多张贴纸里取了一张。她不满意，问我怎么不全部买下。我说，我不用朱砂点眉心，全部买了只会白白浪费。

她不甘，撇着嘴，仍想多挣那80卢比。

我问她，你不开心吗?

“开心，开心。”说着，她的嘴却更扁了。



抱着婴儿乞讨的妇女

______不要钱的乞讨者

仍是在瓦拉纳西，乞讨的妇人们多抱着孩子，让游人拒绝得毫无底气。说不吧，好像自己连对孩子的半点怜悯心都没有。妇人们也聪明，说的是“不要钱，只要牛奶”，再指指怀里的嗷嗷待哺的无辜婴孩。动作连贯，日复一日。

对这种讨要，我通常是不去理会的。四肢健全的人，干一份苦力，挣几个卢比，也好歹是自力更生，丢不了尊严。

可一个妇人偏偏跟了我几条街。我脸皮薄，摆不出狠表情，甩不掉她。她也坚持那句“不要钱，不要钱，只要牛奶”。

我递去一些零碎的钱，只想打发她。她把钱装好，又伸出手来，“小姐，不够呢，牛奶很贵，孩子喝得也多。”

可不是说不要钱吗?

_____卖两块鸡肉的旅舍老板

在印度蓝城焦代普尔，又干又热的沙漠气候叫我几乎中暑。找到一家旅馆，老板带我看房，我还没开口，他却主动把价格降了一半。见他好心，我不想再费心去找，便直接住下来。

洗手池的水龙头是坏的，滴水不出；洗澡间里，说好的热水也是没有的；房间在阳光直射的顶层，40摄氏度的天里好比桑拿房。想着欠老板一半价格的恩情，我忍忍，住了下去。

见我外出，老板跟到楼道冲我喊："今天旅馆餐厅有中国风味的炒鸡，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最爱吃炒鸡了。"我笑笑，没放心里。

回旅馆时，老板迎上来，"炒鸡没了。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唉！"我仍笑，不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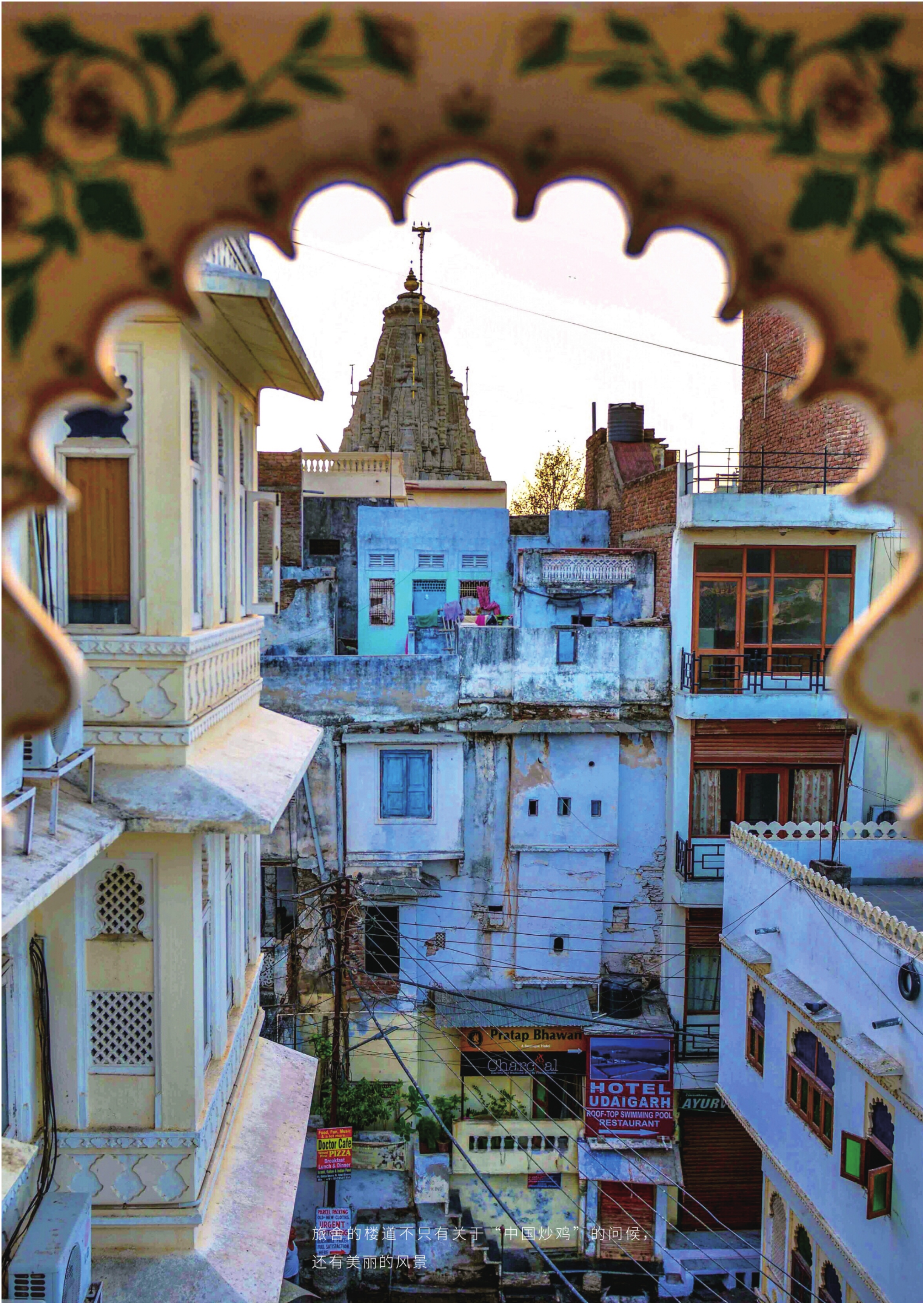
傍晚去看日落，老板又殷勤地说："看完日落早点回来，今晚有中国炒鸡。"

有那么一刹，我似乎感觉如果不在这里用一顿餐，迟早会被老板报复。于是看完日落后，欺善怕恶的我匆匆往旅舍赶，只为点一份"中国风味"的炒鸡。

然而这回老板摊手："没有炒鸡了。咖喱鸡可以吗？"

那些日子里，我闭上眼睛都是国内的街头美食，睁开眼睛，却尽是印度咖喱鸡。

咖喱鸡肉端上桌时，我简直傻了眼：整个盘子，就两块拇指大小的肉块。来印度旅行也有好几回了，下了肚的咖喱鸡，手牵手打起鸣来，能绕地球一周；但这分量惊人的咖喱鸡，对我来说，仍是新奇得不能再新奇了。



旅舍的楼道不只有关于“中国炒鸡”的问候，
还有美丽的风景

旅舍的楼道不只有关于“中国炒鸡”的问候，还有美丽的风景

怒气上头，我端着盘子跟老板理论。老板脸都不变色，摊着手说：“就是这样呢，就是这么多，”还嬉皮笑脸地说，“我这里是酒店，水费电费都高，还有这么多员工等着我发薪水，自然就减了鸡肉的分量嘛。”

我饿，不跟他拗，大不了吃饱了，有力气再吵。

付钱时，他一副十分认真的模样，拿着我们中国产的计算器，戳戳戳，“归零，归零。”一份菜，一瓶水，数学不及格的孩子都算得清，他这装模作样的认真神态，想必是在预谋什么鬼点子。

跟我报了价格，他伸出一只手等我给钱。我一把扯过单据，一项项算给他看，问他：“这多出的200卢比，是什么？”

“咦，你不是点了番茄汤吗？”他反应倒快，说演就演。

“我不但没点汤，那咖喱鸡的钱，我也只能给你一半。”说着，把钱塞进他手里，仍不解气，继续训他，“先生，你开旅馆，基本的诚信是要有的；我们中国人，不反抗只是出于友善的个性，一旦豺狼太凶，我们也是会反咬的。”

他见旅馆员工都在，脸面搁不下，于是继续装傻，自言自语：“嗯？不是点了汤吗……”

也好，起码再也没有关于炒鸡的楼道问候了。

_____讨生活的司机先生

最怕起早，无奈火车发车时间在清晨。背着背包，睡眼惺忪地找三轮车去火车站。一位司机迎上来，报价100卢比，比正常价格多一丁点。

“这是睡觉时间，小姐，就多给一些吧。”司机央求。不，一分都不多给。

司机无奈，发动了车子：“上来吧，原价载你。”

天还黑着，车子在扬沙和晨雾里穿行。时间充裕，司机却开得飞快，想是怕我赶不上火车。又想起他说的睡觉时间——也是，太阳都还没升起，就要挥别温暖的被窝出来讨生活。



三轮嘟嘟车是印度最常见的代步工具

我在心里盘算多给他一些钱。

下车时我递给他100卢比，看他会否找零。他果然没犹豫，把零钱递给我。

我推回去，“收下吧。”

他见状双手夹着钱，在额头处点了点，一脸感激。

好心人，收下吧。善心的人，多给都觉不够；贪婪的人，少给也嫌太多。

_____善与不善

偶尔聊起那些贪婪的人，朋友劝我宽心：“穷嘛，怎能要求他们素质跟得上。”

困苦不是理由，不是人性堕落的借口。不是没去过穷国家，不是没拜访过穷人家。有的人家，总共就两套可更换的衣物，还洗得干干净净，每天在耳际插一朵路边摘的野花，那是尊严；有的人家，肉菜都吃不起，还满腔热忱地邀陌生人去做客，简单的菜却饱含真心，那是热心；有的人家，不顾自己的生意去帮助陌生游客，递过的钱却又推了回来，那是善良。

总在心里期待，下一趟再去印度，遇到的人都像这位司机先生一样老实本分；但转念一想，若旅途都是一帆风顺，那就没有你眼前的故事了。

（本章以上小节原文首发于网易人间）

在阿姆利策的患难之交

老妹来自广西，同我在新德里认识，仅仅几句交谈，我们就决定一同旅行，从南到北，我们历经了有可能发生的车祸、有可能发生的盗窃、有可能发生的劫色，一路互相照顾，颇有生死之交的意味。

老妹是实打实的女汉子，不矫柔做作，睡得了地板，吃得了各色食物。当然，后半句，只是礼貌的奉承。实际上，在我偶遇她并结伴同游印度时，我们在北部圣城阿姆利策，遇到了第一个来自饮食的分歧。

阿姆利策有座锡克教的金庙坐落在水池中央。它由750公斤黄金打造而成，几乎通体镏金，白天看着明晃晃，夜里却是宁静肃穆。金庙提供免费食宿，印度当地人可在洁净的大理石地板铺席子过夜，外国人则可以在一旁的男女混合宿舍间入住。庙里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免费素食，其中的甜椰子粥美味得让我一天数次入庙。

锡克教徒多奉行纯素食主义，而作为锡克教圣城的阿姆利策几乎全城餐厅都只供应素食。老妹被这座几乎看不见肉食的城市折磨疯了。一天，她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了一家中餐馆。"说着，兴奋地拉我坐人力三轮车前往。

一看菜单，原来这家餐馆只是打着我们美食大国的旗号，却愣是把印度奶酪炒面、酸辣芝士汤都归入了中餐行列。老妹可不管，有肉则欢。两盘菜上来，老妹急冲冲地送进嘴，才发现那看似软滑的肉丝，不过是勾了芡的豆腐丝。

我俩都喜欢阿姆利策，为了讨肉吃就匆匆离开，似乎太没出息。既然继续留在城中，老妹也就没放弃过寻觅美食。

在尝过了街边苍蝇围绕的煎饼、餐厅里又甜又辣又酸又苦的甜点之后，老妹彻底开窍了："国际快餐连锁，总不会出岔子吧。"此后，每天黄昏时分，我俩都会出现在阿姆利策的麦当劳或必胜客，吃上一个没有鸡肉的鸡柳堡，或是没有海鲜的海鲜至尊比萨。吃的是素餐，付的价钱却毫无差别。

后来我和老妹要去印度北边的克什米尔，路程艰辛，先是坐多人拼车的吉普，抵达中转城市后还要坐夜间大巴才能抵达。

我那娇弱的身子从多人吉普就开始崩塌。也许是上车前吃了黏腻的黑森林蛋糕，我的胃在闻到旁人汗臭的那一刻起，就变得无比敏感，毫不消停地折磨着我。10小时的车程，我吐了一路，老妹则一直给我拍背、递袋子。直到下车的前一刻，我还在哗啦啦地往外吐苦胆水。

那是交通中转城市，我俩本计划换乘夜间大巴一路向北。但见我虚弱得站都站不稳，老妹提议去找间好酒店住一晚。

我们在视野范围内找到的最好酒店，不过200元人民币一晚。但对于当地人来说，已是极高的价格，因此酒店没见其他住客，看起来冷冷清清。

见有客人上门，前台给我们登记入住时，忙嘱门童进房检查设施。只见门童抓起一罐东西，急匆匆往楼上客房跑。

我和老妹进了房间才觉不妙：原来刚才门童喷的那罐是杀虫水，满屋的刺鼻味道。也许人家误以为我俩会挑剔蚊虫。那时是深夜，我

和老妹怕给前台添麻烦，便没要求换房，想着把空调和窗户都打开，气味一会儿就自然消散。

结果过了不久，停电了。我俩倒也不慌不忙，各自点开手机手电筒，翻出背包里的薯片和西瓜，边吃边用亮光照着自己装神弄鬼。

那夜没有冷气，我俩却也睡得很沉。第二天醒来，俩人都开始哇啦啦地吐，这才知道，夜里毫无知觉，可能是被杀虫水熏得晕了过去。各自抱着水池和马桶吐完了之后，才开始相视大笑。

患难之交的等级，就是在那一刻提升的。

都说印度是背包客的终极考验地。在那脏乱差的环境和模糊不清的人心里，测试你的耐力，考验你的意志，打击你的柔弱，把你的品格褪掉一层层的包裹和伪饰，渐渐显出真面目。因此每次去印度旅行，我是不敢呼朋唤友的，只怕一趟旅行下来，对方恨我的不告知。只有老妹，是我毫不犹豫便会拉着同游印度的人选。

那时我因为心血来潮的想法，随身带了一块可折叠的白板，想在旅途中做一件有趣的事：记录梦想。当时定了两个标准：写下梦想的人是自己所熟悉的或者有一丝了解的，绝不能是随便找来的路人，以及，对方是一个有趣的人。



老妹写下的梦想是：拥抱五月天乐团的阿信。

有次在克什米尔的邮局门口，我俩写着明信片，我遇到不懂的字，向她讨教。她手边没有白纸，便一手扯过旅行的背包，在背包外层写出那个字来。写了竟也不擦，任由那个黑色汉字躺在背包上。后来，邮局保安告诉我们，克什米尔是政治敏感地区，这所邮局此前曾被炸过，出于安保考量，只许我们俩中的一个人进去。老妹二话不说，一把揽过桌面的明信片，把鸭舌帽反着戴起来，就跨进了邮局的大门。

若是那天阿信在，看到这个不会撒娇、没有假面、率真勇敢的女生，也会很想抱一下吧。

梦想世界和平的由美子

我就差和由美子打一架了。

那时我和老妹在印度北部的村落达兰萨拉旅行，住在老妹推荐的旅舍里。

我与老妹住的宿舍间只有我们两个中国女孩，其他都是日本背包客。住的是混合间，有男有女，大家每天分享旅途见闻，共处和睦。一天，我们正没边没际地聊着，由美子背着布包走了进来，我冲她笑："嗨。"她没理我。我以为她没听到，又傻气地"嗨"了一声。

她装作没听到，头都没回。不好惹的人物。

看她穿着彩色宽大的印度服饰，想必也是想融入当地生活的旅行者，怎会这般无礼，我也不得而知。碰壁之后，我不再自讨无趣。

宿舍间的木门旁贴着字条："晚上最后进来的人请关灯"。夜里，大家都准备睡了，洗漱完毕的老妹怕吵着大家，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环视一眼宿舍间，看见由美子还在看手机。我盯着老妹，而她则看着由美子，准备去关灯的手停在半空，又缩了回去。我太了解老妹了，她一定是体贴由美子，怕关了灯，手机的光会伤她视力。

老妹留了灯，走回床位。几分钟后，由美子怒气冲冲地起身，瞪了一眼老妹，猛地一下把灯拍灭。

见她一晚没再开口，想是大事化小了，不料她把怒气掖了一夜，翌日一早，她叉着腰，对着正在叠被子的老妹质问道："你昨晚为什么不关灯？"

老妹英语不流利，“我，我，我”了一会儿。

不等老妹解释，由美子指着门上的字，斥问：“难道你看不到那字条吗？”

老妹很无辜，解释说见她在玩手机，才给她留了灯。

“不管我有没有在玩手机，你是不是最后一个进门的人？”

善良的老妹这样被冤枉，无辜得瞪大了眼睛。

我看不过眼，走过去，也叉着腰，“她好心给你留灯，你不知感谢，还隔了一晚来发火。日本游客我们见多了，全都非常有礼，只有你目中无人飞扬跋扈……”噼里啪啦一顿骂过去，听得她目瞪口呆。我以为她会回骂，没想到她抱着脏衣服，讪讪地走出门去。

后来，同旅馆的日本男生悄悄对我说：“你最好别搭理由美子，她是个‘极端分子’。”我倒是来了兴趣，“咦，极端分子？”

“是的呢，她很讨厌韩国人和中国人。她曾经给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主导的‘购买钓鱼岛’计划捐钱。她刚来旅馆时就跟我们说了这件事，还为此骄傲得很。”男生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由美子年纪太小，小到不足以参悟政治，所以我并没放在心上。但当然，我是不再同她打招呼了。

一天夜里，有日本住客要离开，我们一群人找了当地最出名的日本餐厅，要给他饯行。杯觥交错之际，我瞥到坐在餐厅角落的由美子。菜还没上，她的身前摊开了一本书，心思却不在书本上，时不时地侧眼看我们。我冲她招招手：“过来吧。”

她环顾一圈，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你在跟我说话？”

“是呀，过来吧。”我笑着说。

她拿着书本，坐了过来。那一下，她看人的眼神终于不再放出扎人的刺。

后来，我和老妹也要告别了。我收拾背包的时候，由美子坐在我身边，问我：“可以和你聊聊天吗？”

当然好呀。

“我以前不太喜欢中国人，但是现在想知道，是不是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友善？”她问得很稚气。

“是的，甚至比我更友善。在你眼里，可能中国游客很‘粗鲁’，因为他们说话大声，总是扎成一团。实际上，这与我们的语言有关，我们的汉语普通话有着比英语、日语、法语等语言更多的元音，这使得我们在讲中文时，无法压低音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人一直被外界误读，实际上，他们的心很热，只是表达的方式与日本人不一样。”说着，我把白色板子递给由美子，“写下梦想吧。”

由美子写的是：“邦交友好，多点微笑，没有战争，没有压力，没有流血冲突。”

我不太相信，因为太多人把“世界和平”挂在嘴边了。我问她，“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她点头，说自己是一个对政治很敏感的人。“我在念大三，主修的是南亚地缘政治，这是我来印度旅游的原因，下一次，我想去巴基斯坦看看。毕竟课本学到的，与亲身体会到的不一样。”

我赶时间，没再深聊。我背着背包出门时，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给了我一袋糖，还有一张叠成爱心的纸。

很多天后，我才记起，打开纸来，上面写着：

“请一定要来日本看看，我会好好照顾你的！——由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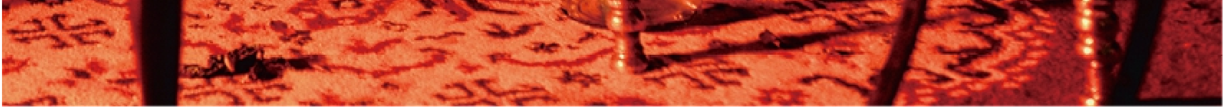

Good relationship
No war
Smile
No shedding blood
No pressure

由美子，2012年9月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CHAPTER 6 沙漠里的玫瑰国

摩洛哥





传统的摩洛哥茶

卡萨布兰卡

抵达的第一夜就在警局周旋，是意料之外的事。

航班落地卡萨布兰卡时晚点了两个小时。一出机场，便看到西贤，他和社交网站上的照片一模一样，冲着我灿烂地笑。我没料到他会来接机。

我是半年前认识西贤的，通过一个英语自学网站。见西贤言谈有礼，又来自神秘的国度摩洛哥，便互留了联系方式。随后他得知我要前往摩洛哥旅行，颇显热情，提议让我借宿在他的女性友人法蒂玛家里，又告知我法蒂玛的联系方式。

出于常年独旅经验，我的小人之心存着万般疑虑，对西贤的为人持观望态度，加之不乐意麻烦他人，因此当时对借宿一事不置可否。

在机场，西贤向我走来，随手接过我的背包，抱歉地说，法蒂玛临时有事要驱车去外地，她卡萨的家里没人，不便让我借宿。不用欠人情，我当然乐意，便答没关系，可以住旅馆。西贤却突然提议，说我可以借住他家。这突然的变化，加深了我对他的怀疑，我当即拒绝。西贤并不强求，陪我乘火车至市区，再搭乘出租车去市中心找旅馆。

飞机晚点，已叫西贤等候多时，我便不再耗时在机场兑换当地货币，因此一路车费水钱都是西贤掏腰包，让我觉得非常不安，坚持第二日换了钱要还他，他笑说这是待客之道，让我不要介怀。

西贤并未把我带到高价酒店，而是带我找到一家青年旅舍，让我颇感激他对我旅行方式的理解。可在登记时，旅舍前台说入境处并未

给我入境编码，因此我属于非法入境，必须前往警局领取编码才能办理入住。原来，在我入境时，入境官只顾嬉皮笑脸地跟我聊天，没料到他连本职工作都忘了。

其时已是夜里11时，长途飞行的困倦和入境官的不尽责叫我积了满肚怒气，心不甘情不愿地让西贤陪我去警局。去了最近的警局，却又被告知必须前往总警署，在总警署门口的寒风中站立了十几分钟，待门口警卫用对讲机沟通后，我总算获准进入。伊斯兰教国度，异性往来大有禁忌，为避嫌，西贤在警署外等候。

穿过漫长的走廊，经过两旁蹲坐待审的散漫青年，绕过紧盯的好奇目光，我进了警长办公室。

警长颇热情，很快便给了我入境编码，却仍未同意我离去，说必须告知旅舍的名字地址电话。眼下，我既不记得旅舍名字，又没有西贤的号码，无法联系就在楼下的他。就在我不断回忆旅舍名字的时候，警长的身子缓缓地倾向我。

我虽敏感，但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没有多虑。

我试探性地询问，可否在回到旅舍后，让旅舍联系警长。警长这回答应了，给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

总算是放我走了。我道谢后起身去开门，就在那一刹那，警长竟猛地凑到跟前，嘟起嘴想亲我。我反应快，一把将他推开。心里是震惊的，可即刻的反应是切勿动怒，因仍在他办公室内，怕他将门反锁。我不敢反抗，只给出厌恶的神情。那是我最懦弱的一次，而我痛恨我的懦弱。

他没有进一步的举动，开门将我送走。走出门只那么一瞬，他的神情却全然变了。上一刻还满脸淫邪的他，在走廊青年们的注视下，

又恢复那副警长的威严正气的神态。

此前，不是没有在旅途中遇到过或听说过警察行为出格，但这位警长的举动仍叫我震惊得久久不能平复。

钻进出租车后座，我愤怒地把事件过程对西贤说了一通。他也震惊，竟委屈得快掉泪，一个劲儿地说他的国家冒犯了我，他觉得很抱歉。可转念一想，西贤也是我质疑的对象，我便没再吱声。

17个小时的飞行，加上连日发烧，让我在抵达青年旅舍后疲惫不堪。与西贤告别后，我很快睡去。夜里烧得厉害，却并不难过，想着终于来到了期待已久的卡萨布兰卡，心里很激动。一部《卡萨布兰卡》，把多少人引来了这个沙漠与海洋交织的国度，我不清楚，只清楚，另一部电影《北非情人》让我对摩洛哥心心念念、痴痴盼盼。

翌日醒来，拿了旅舍赠的卡萨地图，我一路步行，要去游览世界第三大的清真寺。

最早的骚扰来自于搭讪。穿行于街巷之间，男人们口哨四起，还用手指夹在嘴边，发出“啵啵”声响。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类搭讪——除了礼节性的“尼浩（你好）”外，其余都是骚扰的语句。

我不理会人们以故意变调、轻浮调情的语气跟我打招呼，但当他们说出下流不堪的字眼时，我火冒三丈，立马用言语回击。

数年前我也在北非地区旅行过不短时日，深知他们讨嫌的搭讪方式，但再遭到这样的言语冒犯时，我还是失去了耐性。我没有多美，也知道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美不美，只要我是个外国姑娘。

还有人开车跟了一路，我走他行，他还摇下车窗，对我吹口哨；见我不应，前驶一段，我停他停。我忍不住，狠狠瞪一眼过去，对方却兴奋不已。

若说开车跟随算是好摆平的，那么步行跟随实在叫我头皮发麻。

在灯塔附近，我察觉到有人走走停停地尾随。我看向他，他立即扭头看往别处。我停住看风景，他也不走，东看看西看看。我忍无可忍，瞪向他。

他找开场白，问我："几点了？"

我拧头："哼。"

他靠前一步，指着手腕处，又问："小姐，几点了？"

我一把捂住手腕的电子表，说："很明显，我不想跟你说话。"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跟你说话。"

他笑："这不公平，算种族歧视吗？"他指着不远处的摩托车，说要载我。

我头也没回，把他甩在后面。他骑上车，跟了我整整一段海岸线，见我一路不搭理，终是放弃。

从清真寺出来，我去看大西洋的浪涛。小麦肤色的孩子在海浪里蹿跃，那瘦弱的小身板蹦进海浪里，却变得那般壮实灵活，身后的小狗也尾随着跳入海中，童年与自然这般亲近，叫我看得我松了警戒。待到发梢都是海风里的潮腥，我才转身离去。

忘了来时的路，抄了一条捷径。才走了几分钟，五六个小青年蹿过来，把前路堵住，挑衅地看着我。我虽害怕，但料想几个人年龄不大，应该不敢有大举动，便转身往回走。背后，嘘声四起。

可谓心惊了一天。

夜里与西贤进餐，他问我白天逛得如何，戳中我痛处，我把苦水一股脑儿往外倒。西贤听了，又是那副丧气的模样，止不住地道歉，还告诉我，他一晚没睡好，反复去想警长所为。

是啊，若有人在我的祖国有类似的遭遇，我又怎会过意得去。有了这份同理心，我便对西贤说，自己会多些耐心，重新去了解摩洛哥。

对于此前都是西贤付账，我非常介怀，这晚特意找了海边餐厅，把他拽了进去，坚持要请他吃饭。他不乐意，不肯点单，我放话说不吃就不走，他这才拿起菜单。才扫了一眼，就放下菜单笑着说："我不饿，只要果汁。"我疑惑地接过菜单，立马明白了他的善意：这家餐厅的定价几乎是卡萨布兰卡普通餐厅的4倍。

我坚持要在此用餐，西贤显得颇尴尬，只好再拿起菜单翻看，最后点了比萨，还指明只要一片。我再看菜单，发现比萨是价格最低的，那一刹那，我对他的质疑消散殆尽。

聊起彼此家中情况，西贤才提起自己有位未婚妻。他说自己很爱她，并计划过些日子就求婚。我着实为这样善良的人找到归宿而高兴。

有一次，我与西贤乘出租车，西贤同司机说起我的遭遇，说至警长的失格和海边青年的紧跟时，司机气得狠拍方向盘，转头对我说："小姐，你记住，这种冒犯女性的问题出在某些人身上，跟伊斯兰教无关。这些不尊重女性的行为，是我们穆斯林所共同鄙视的。"

这个解读颇有意义，意味着伊斯兰教或说任何的宗教，其教义本身都是纯粹无邪的，然而接受者是人之个体，他们都带着自己的经验

去解读和遵循，心有不善者就会曲解教义。西贤说，人之为人，定有贪欲和恶念，是这些念头诱引出不良的行为，而并非宗教使人如此。

后来在菲斯，我也有类似遭遇。巷子里有个小店主人冲着我说“性感的私处”，我当即指着他吼，命令他道歉，否则就报警。我警告他，如果不懂一个英文单词的含义，就不要乱用，不然就是严重的骚扰。那条巷子短而狭小，几乎所有店主都走了出来，围着我，纷纷代他道歉。

我对其中一位店主说：“我不责怪你们所有人，但同时，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代他道歉。我不允许他这样冒犯女性，也绝不会原谅他。”

说完我扭头就走，身后有一个大男孩一直跟着，拍着心脏向我道歉，我并不理会他。

他一直跟着到巷口来，喊我“小姐，小姐”，我停下来，瞪着他。

“刚才用词不敬的那个是我哥哥，他的确是不清楚那个词语的真正含义，请你原谅他。”他说。

他说这番话时，依然紧捂胸口，满脸的真诚，与他那个不肯道歉的哥哥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刻，司机和西贤对宗教和人性的那番解读似乎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

比利时姑娘诺拉

如果不是命运，在比利时出生、长大的摩洛哥姑娘诺拉不会因为贪吃而错过火车，无法及时回家乡肯妮琪，无奈留在卡萨布兰卡；如果不是命运，她不会在众多的住宿选择里挑了这间临海的旅舍，还被分进了我的宿舍间；如果不是命运，她不会对我微笑，我不会被她的笑容打动，更不会在聊了3分钟后就决定结伴旅行，共同前往她的家乡肯妮琪。

诺拉笑起来真好看，像极了青春时期的凯特·温斯莱特。姣好的容颜谁不喜欢，她只是冲我笑了一下，就让我把信任全盘托上，深深觉得这是位毫无心机的姑娘。

她在我一旁的铺位坐下，问我第二天的行程安排，我耸耸肩，说毫无计划。“那你想随我回家乡吗？”她问。



马拉喀什的广场夜市

我闪过一丝诧异，但还是笑了：“好啊，为什么不呢。”

诺拉的父亲是比利时布鲁塞尔人，母亲则来自摩洛哥小城肯妮琪。一家人定居比利时，但仍保留着肯妮琪的物业，偶尔去度假和探望亲友。

我随诺拉坐火车到了肯妮琪，来到她的家中。那是个独栋别墅，因为久不住人而积满了尘。见诺拉搬箱抬柜并不灵巧，想来是干不惯家务活的，我便帮着扫地拖地，再一顺手，把房间门窗都擦拭得锃亮。

诺拉才搬完房间的古董柜子，到客厅一看，本是灰色的地板已透亮可照人，积满淤垢的马桶已刷得光亮。她张大嘴看我，想的是我的

清洁效率；我也张大嘴看她，想的是她的不设防，把我这个陌生人带进这套大房子里。

住在肯妮琪的诺拉舅舅邀诺拉和我用晚餐。我们进屋时，已是晚上9点，诺拉舅舅一家备了满桌糕点，配了奶酪果酱还有传统摩洛哥茶，我们吃着笑着。我向他们学着阿拉伯语，好几块蛋糕馕饼就下了肚。

结束晚饭时已近11点半，我帮着刷洗碗碟。刷洗完毕，见她们燃起炉灶，我好奇地问煮什么。她们惊讶："晚饭呀！"一看表，12点了，我再三问："晚饭？！"她们点头："摩洛哥人吃饭就是那么晚呢。"

待菜肴上桌时，我已困乏得眼神迷离，连荤素都分不清；待大伙把饭菜吃得差不多时，我已困得几乎倒在饭桌上。

肯妮琪是小城，没太多风光，诺拉和我决定前往大城市马拉喀什。

在马拉喀什，我与朋友丽虹联系上。丽虹在阿尤恩工作，邀我前往游览。

"阿尤恩？"诺拉一脸嫌弃，"我15年前去过，那里可谓一片荒芜。"

我上网搜索，却惊诧地发现，阿尤恩竟就是三毛笔下的"阿蓊"，这回下定了决心，无论荒芜与否，只要三毛住过，定有特别之处。

我同诺拉约好，在我结束阿尤恩之行后会再碰面。送我去坐大巴的路上，俩人都沉默不语。我担心现金的问题，因为我的银行卡在摩洛哥一直无法取现，诺拉则在担心住宿的问题。她原本与我住在酒店双人间，但因我离去，她不想再花费这么多钱在住宿上，便打算去马

拉喀什的亲戚家里住。诺拉在马拉喀什有个舅舅，几年前也曾探望过对方，可眼下，她既没有舅舅家的电话号码，也忘了舅舅家的具体地址。于是，步行前往车站的这一路，诺拉都在回想，舅舅家究竟在哪。

“应该就在附近呢。”诺拉自言自语。

我戳戳诺拉，说背后有陌生男子似乎在尾随我们。诺拉心不在焉地回头瞥了一眼，对我说：“不必理他。”拉着我加快了步子。我又回头去看那男子，他口中叨念着什么，见我们加速，也急急地紧跟。

我再去戳诺拉，诺拉依然叫我别搭理：“搭讪而已，摩洛哥多得很。”这时男子终于追上了我们，急吼吼地叫了一声“诺拉！”我这才觉得不对劲，问诺拉，真的不认识他吗？诺拉止步，回头盯着对方看，突然“啊”的一下叫出来：“舅舅！”

三个人共同走了一路，诺拉舅舅扁着的嘴就没放松过，埋怨诺拉几年没见居然忘了自己舅舅的长相。我哈哈大笑，告别两人，搭上了前往阿尤恩的大巴。

车子驶进撒哈拉，沙漠地区极大的昼夜温差使得车内寒气逼人。日间还穿着夏装，夜里我却披上了最厚的外套。我的位子在大巴末尾，椅背无法调节，难以入睡，便看向窗外。

窗外大漠荒荒，头顶星芒闪亮，如同茫茫瀚海。七颗大星连起的巨爪，调皮地撕扯着夜幕。星斗漫天，每一颗都是天使的化身，漫天的祝福与神佑。身旁有孩子醒来，呆望着窗外，敲打车窗，咚咚的敲击声传遍了静谧的巴士空间，阻隔了星海的喧嚣。母亲担忧孩子睡不好，把叠起的外套枕在他头下，外套滑下，母亲再塞。我把随身带着的环形枕递给那位母亲，换来感激的笑。看孩子睡去，母亲总算能踏实入眠了。

寂静像夜色无边无际。窗外是黑色的荒漠，偶见休息站的零星灯火。听任自己的思绪一波一波地荡动。时光中每一个能够沉思默想、浮想联翩的瞬间，都让人感觉欣慰。深夜中，我远离了一切尘世喧嚣，而脚下的路，却依然在继续。

星夜里有数不清的小天使冲我眨眼：“夜深了，睡吧。”



摩洛哥的蓝色之城舍夫沙万

摩洛哥香料



毛驴在摩洛哥被称作城镇出租车，它们负荷过重，每一头都神情哀伤



摩洛哥香料

同乡人丽虹

此前我从未见过丽虹，是我俩的一位共同好友彩玲常对我提起她。这趟到摩洛哥，彩玲促我约丽虹见个面：“都是东奔西跑的人，定有数不清的共同话题。”丽虹与我都来自粤西小城湛江，后来才知道，彼此的家居然只隔着一条马路，开个窗就几乎能瞧见彼此。

但此前我却对丽虹有误读，也曾打消过探望她的念头，就在她于社交应用上对我说“周末过来吧，正好我办公司派对，你可以来做中餐”的时候。

当时我和诺拉在街边餐厅吃蛋糕，我转头抱怨：“见都还没见，她居然叫我去做饭。”

诺拉说：“不想去就别去嘛，听从你的心。”

“不去了，不去阿尤恩了。”我把手机摔在一旁，喝了口咖啡，拉一把诺拉的手臂，“我们去哪里玩？”

诺拉把接下来几天的行程打算细细写下，要去这，要去那，见我沉默不应，问我是不是还在想阿尤恩之行。

是的。与丽虹的接触仅限于手机社交软件，匆忙间敲击键盘的心情，不足以代表她的真实个性，我怎能因为一个可能被误读的细节，而丢失认识和了解一个人的机会，阿尤恩，还是要去。

果不其然，在搭了15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后，我见到的丽虹温柔爱笑，连伸出来要握的手，都带着小女生般怯怯的笑意。

丽虹在联合国驻摩洛哥的非洲总部担任安全部部长，此前曾驻任于利比里亚、苏丹和黎巴嫩。进联合国前，丽虹在国内边检服务过，也曾供职于维和部队。

有着这些硬邦邦经历的女人，应当是霸气、粗糙、好胜的。然而，恰恰相悖于我的猜想，女性的似水柔情，以及对精致生活的热爱，丽虹一点都不缺。

进她办公室，看她把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或奇形怪状或精致小巧的物件整齐地摆放满柜，另一边，则是满满的书籍与照片，照片里的她，晒得黝黑，穿着维和部队服装，与男性队员站成排，笑得灿烂，巾帼丝毫不让须眉。

她坚持让我住她家里，还说儿子冬冬得知我要去，提前整理床铺给我腾出房间，自己则要睡客厅，做起了“厅长”。丽虹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还与冬冬自个儿倒腾，下载了唱卡拉OK的电脑软件，连上了同事从中国带回的小型音响设备，愣是在沙漠里创造出了中国歌房。

夜里，丽虹的同事陆陆续续地来她家，我和丽虹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准备着各式中餐，从广东老火汤、川味辣菜、北方面食，到中西掺杂的酱爆龙虾都早已备好。我和丽虹生怕这一小桌菜，不够让同事们惊叹中华美食的精细与博大。

丽虹的上司金波里走进厨房，她笑意深，问可否一旁观摩，“学学中餐”。别人看着，我保准紧张，于是委婉笑答：“中餐油烟大，还是别在厨房里待着了，再说大家正在客厅聊天呢，你不加入吗？”金波里仍笑，一字一顿地说：“不，我就要看你做菜。”架势尽显。

金波里瘦小，却因亚裔面孔彰显着年轻感，十指上套了好几个金光闪闪的宝石戒指。她自律，几十年坚持不吃晚饭，因此这次中餐派

对才设在中午。

丽虹同事都很给面子，对食物连连赞叹，叉了海鲜又叉炒面，叉子不便，炒面叉了又漏。丽虹递过一双筷子，建议同事一试。金波里撑起筷子，握在筷子最尾端，尾指高高翘起，连指宝石戒指熠熠生光。她慢悠悠地说：“我在越南出生，在我们的文化里，筷子握得越靠后，尾指翘得越高，越能显示女性的高贵，也能让男人看清楚指上的戒指。”

颇奇特的论调，我扑哧笑出声来。金波里看着我，又说：“笑？笑应该是这样的。”她那握着筷子的手回旋至嘴角，五指伸张呈扇形，与筷子一道，恰好挡着微张的唇。“在亚洲价值观里，女人的笑应是含蓄的，因此在餐桌上笑，最好用餐具和手遮挡，才显得矜持有家教。”金波里，这位联合国秘书长驻西撒哈拉事务的特别代表，以她直接的言语风格，给我留下了独特的强势印象。

第二日恰逢周末，休假的丽虹一早便驱车，与儿子冬冬一道，带我去探寻三毛荷西故居。与诺拉嘴里的“一无所有”不同，如今的阿尤恩已是交通便利，马路宽敞且每日有政府派人定时洗刷。尽管处在撒哈拉，但若不起风，马路几乎不见积沙。而三毛书中曾提及的乱坟场也早已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市井气息的果蔬市场，还有货品齐全的杂货店。阿尤恩，早已告别了三毛居住的时代，也不再是诺拉嘴里的“荒芜之地”了。

我们都记得，三毛的房子在卡拉马大街3号，丽虹在几年前也去过，但她当时没进屋。如今我们再驾车前往，只怕屋子易主，万一外墙刷漆换了颜色，就更难辨认了。

在一栋土黄色房子前头，丽虹停稳了车，说这似乎是印象中的那幢房子。我们不想打扰，没去敲门，有善意的邻里上前来，却答不出

门牌号。我和丽虹反复对比网上的资料照片，越看越生疑，于是上车继续找寻。

开过几个街区，卡拉马大街的路牌赫然出现，原来我们之前去错了街区，因为房子外观相似，丽虹的记忆出了差错。

三毛的旧居就在眼前。照政府定下的主题色调，阿尤恩全城的建筑都刷成三文鱼色，只有三毛与荷西住过的这栋房子很特别，仍保留着最初的土黄色。

丽虹之前来过，曾敲门但未见有人来应，猜想房子已不住人。房子只锁了铁门，里层的木门并未关上。透过长长的过道，能看到里间挂着衣物。我对屋内摆设有强烈的好奇，但实在不愿意去打扰新房主，于是同丽虹一起离去。走之前，我仍不忘观察里间挂着的衣物，不断同丽虹说，房子应该还有人住着。

后来几日里，我反复想起这幢土黄色的房子，还是希望进去一看。丽虹见我心痒，一日下班后提议再去一趟。

再去，见先前挂着的衣服竟被收了去，认定房子里住了人。我轻轻地敲门，敲了半分钟，跑出一个小女娃，倚着门，水灵灵的大眼盯着我。她盯了一会儿，跑去把妈妈拉来。

我和丽虹向对方说明来意，女娃母亲边笑边打开铁门，“我知道三毛，因为你们不是第一批来的中国人，好几次都有中国人来看这幢房子。”

主人和善，邀我们进屋。屋里有两间起居室，三毛书中配图可见的原有摆设都已不在，客厅变得空荡荡，仅余造成“飞羊落井”奇观的天洞还在。我说不上失望，但感觉不到三毛、荷西居住过的痕迹。

怕屋主觉得无礼，我和丽虹并不主动去开房间的门，只随屋主介绍的顺序看去。参观完客厅，屋主推开主人房的门，土黄枣红双色交织的地毯呈现眼前，我这才油生亲切之感，探射灯仿如聚焦到40年前三毛荷西在此生活过的场景。那时三毛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双手轻轻搭在荷西身上，两人脸上流淌着不怕外人窃笑的恩爱。

对于家具摆设陈旧简陋，屋主显得窘迫，为不使她尴尬，我和丽虹都极少拍摄屋内。屋主的尊严写在脸上，想必她并不希望一时贫苦的生活被他人用镜头永远地记录和保留。

丽虹以保护好三毛旧居为由，给了屋主一些钱，屋主颇感激。谢过主人，我们走出屋子。

我不舍，回头看了一眼。才一晌的错觉，好似荷西出门早，去磷矿公司上班了；而三毛，坐在长长的过道里笑，痴痴地盼。

走出三毛荷西故居，阿尤恩的风迎面扑来，这里沙漠与海洋交织，撒哈拉威人善良至极，阳光炙热，风却温暖和煦。

我懂三毛为何留下了。

因诺拉还在马拉喀什等着我一起旅行，我心上有负担，不便在阿尤恩停留太久，最后向丽虹提出要离开。

此前我曾无意提起，想看《素人渔夫》里那一家让三毛觉得犹如置身伊斯兰教宫殿的国营饭店。要离开阿尤恩这天，凑巧休假的丽虹在一早起床后便提出开车载我前往国营饭店。丽虹心细，只要我些微提及的地方，她必定领我去。

夜里，丽虹同事都来她家里为我送行，一行人开着车子把我载到车站。我一一拥抱了大家，最后背起背包，道一声再见后，头都没再回。

他们不知道，那个洒脱的身影，承载了多少恩情与感激，满得要从胸腔溢出。

丽虹是圆规中心，她为我画出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待我如亲人。在车上，我千愁万绪，舍不得。

后来丽虹随职调往南苏丹，继又调任突尼斯。都不是平和的工作岗位，内里蝼蚁竞血，丽虹却不争不抢，施施然在朋友圈里发起捐助，给南苏丹的村落捐建水井，给贫困区孤儿院孩童送去物品。她带着一张中国面孔，积善却不言，不知在多少国度为华人画下美好形象，炫耀和喧哗与她相比，永远显得粗俗。

她是在无可依凭的荒野里也能把日子过成诗的人。频繁调岗，却听不见她的怨言，只能闻见她每到一处新城市的惊喜发现。波斯人有一句话“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它们只瞧得见美丽的事物”，这是丽虹，在联合国任职的十数年岁月呼啸而过，她只传唱美好那部分。

重遇诺拉

路上好多人惊讶于我和诺拉的搭伴，这个纯粹得有点笨的姑娘，防备心全无，把我领回肯妮琪的家，带我见遍她的亲友。后来，我执意要去阿尤恩，她便在马拉喀什痴痴地等了我好几天。她把唯一的电话卡给了我，又不用智能手机，好似活在混沌世界里。

后来想想，之所以和诺拉一拍即合，大概因为我俩都——自然醒、啥都吃、性格自来熟、喜欢乱搭讪、不买回程票、永远不知明天要去哪里。

诺拉之所以入住卡萨布兰卡青年旅舍的宿舍间，其实是个意外。那晚，她从比利时飞抵卡萨布兰卡，原计划乘当天的火车回家乡肯妮琪，但她在卡萨布兰卡一家餐馆吃了晚饭，用她的话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好吃。”被食物惊着了的她，从7点吃到10点，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只好住进了卡萨布兰卡的青旅。

我和诺拉又是鲜明的对比。我察言观色，偶尔圆滑，又极易不耐烦，晓得用“我转一转，回头再来”的说法来甩掉街头商贩，碰到乞讨者，我要再三确认断腿、愁容和眼泪都是真的，才会施予那么一丁点；而诺拉，则保留着人被创造出来时的本真模样，她笨拙、简单、善良，从不拒绝每一双乞讨的手，心地像马拉喀什地上放置的蜜糖块那般软得随时要融化。有时我的法语不灵光，磕磕巴巴讲不清楚，她都能懂；有时她的英文词汇惨兮兮，挠头要翻字典，我一摆手说不必，因为我也都懂。旅伴间心灵的契合，越过了所有语言障碍。

丽虹儿子冬冬一句“阿加迪尔是摩洛哥最美的城市”，让我一拍大腿，约了诺拉在阿加迪尔会合。我从西撒哈拉的阿尤恩前去，诺拉则

由马拉喀什出发。

此前素未谋面的湛江夫妇周叔和英姐是丽虹的朋友，住在阿加迪尔城区。丽虹热情，致电周叔，告知我将前去，周叔也热心，执意要来车站接我和诺拉，载我们去山顶和海边。

带我们看足了一日海景，夜里，周叔把我们领回家里，说英姐做好了菜。进门一瞧，英姐已在清洁厨房，炉灶上放了一碟炒芹菜。我看菜不多，没太麻烦英姐，心里安乐。结果到餐桌一看，满桌的肉菜，我吃了一惊，连连责备英姐太操劳。

在客厅等开饭的诺拉，已经把周叔家里的一罐油炸饼干塞进了肚子。英姐看诺拉爱吃，给她塞了一罐相同的饼干，又送她红枣和茶叶。吃饭时，诺拉夹起餐桌上的海参，动情地说周叔英姐就是她的中国爸妈。



我和诺拉的友谊几乎全建立在吃上，但这个基础牢不可摧

第二日夜里又去周叔家做客，这天诺拉提前出了门，回旅馆时，拎了一大盒糕点。我知道诺拉是舍不得买糕点的，摩洛哥物价并不

高，而糕点却不便宜，尤其是纯蜂蜜制成的糕点，半打的价格足以入住一夜四星酒店。诺拉独旅，吃住皆俭，见她这个小贪吃鬼进过几次西点店，只舍得买一小块蛋糕，我问诺拉，这次怎么买了这么一大盒西点。诺拉笑：“给中国爸妈的。”

善以待人，人以善待。人同此心，放之四海而皆准。

英姐记得我说过怀念家乡的牛腩汤粉，在我和诺拉要离开的那天，英姐一早起来给我们炖牛腩，又和周叔送我们去车站，还给我们背包里塞满了零食水果。无意中，周叔说起，为了给我们做春卷，英姐在厨房里站了两个小时，腰疼的毛病又犯了。

我们的巴士在夜里11点发车。见发车时间快到，我和诺拉上了车，周叔英姐却不离去。料峭的夜风里，这对上了年纪的夫妻相互依偎着，一直挥着手，同我俩道别。

偷偷去看诺拉，发现她和我一样，已是泪眼婆娑。

在另一座城市乌尔扎扎特，我和诺拉总算做了回标准的游客。第一天，去参观《角斗士》电影取景地，第二天，拼车去邻近小镇看沙漠玫瑰。

这一路，我的坏脾气时时暴露，疲惫或饥饿都能让我耍起性子。而诺拉，总是笑嘻嘻地安慰我。

看沙漠玫瑰，是诺拉坚定的意愿，我虽兴趣不大，但想起一路上诺拉多次的谦让，我便妥协，随她寻找沙漠玫瑰。

摩洛哥人善良有礼，越是小地方，民风越显淳朴。在诺拉坚持要参观的电影工厂里，因为登顶的铁门锁死，我和诺拉只能透过铁窗看风景。买来的票毫无价值，我的不耐烦病又发作，生了闷气，坐着不肯走。

有工作人员看不过，好心开了锁，偷偷让我和诺拉登顶，才得以看全景。

钻了空子，让我开心不已，小市民作派尽显。

在沙漠玫瑰之城问路时，陌生的餐馆店主怕我俩迷路，把店铺交给朋友代看，陪着我俩去看古堡。我给家人买了很多玫瑰精油，纪念品商店店主主动降价，还免费送了好几瓶。

回来路上又拼车，诺拉喊渴。乘客居然让司机减速，跳下车去，给诺拉买水，而后在近40度的大漠里，追着我们的车又跳上来。

满目枯黄，车内又闷热，从倒车镜内看司机昏昏欲睡，吓得我赶紧递给他一瓶清凉油，让他擦太阳穴。满车乘客一见我的清凉油，都被震惊了，以为是神油，纷纷抢着擦在脸上手上，还有一位最天真，抹在了眼睑上，辣得哇哇叫……

这就是旅途了，不需要名山大川，不需要波澜壮阔，人心人性琐碎却珍贵。

菲斯奇遇记

与诺拉告别后，我独自前往菲斯。刚抵达，就发现城里的大小旅馆几乎都订满了，只好拦了辆出租车，一路行驶一路找住处。不一会儿，司机开始不耐烦。从他毫不避让来车和行人的野蛮驾车习惯看来，此人绝非善茬，我也做好了被宰的准备。

后来，司机停车问路，被问道的秃顶大叔一边告知方向，一边拉开我的车门，说可以给我带路。

大叔英语不行，自称叫塔吉，我阿拉伯语不行，鸡同鸭讲了一会，才知道塔吉大叔说我可以住他家，每天付他150迪拉姆。又一个旅游小贩。

随塔吉大叔去看房间。他的家是4层的独栋房子，居然装修得富丽堂皇，顶层还有眺望菲斯老城区的阳台。

去给司机付款，不出意料，他变得面目狰狞，要价1000迪拉姆。我只把合情合理的50迪拉姆甩给他，转身就走，任他在身后骂骂咧咧。

塔吉大叔的妻子特别和善，勤快地给我铺好房间。我累，瘫在客厅，暗自怀疑是不是进了狼穴。这时，大叔妻子给我端来满满一盘饼干，还有苹果汁，让我完全没了戒心。要讹我，给我一杯白水足矣，何必提供苹果汁和饼干浪费成本。

再后来，随塔吉大叔出门，他一路叮嘱我记住路牌，正啰唆着，却忽然弯下腰去，捡起地上的空饼干袋。认真关爱自己居住环境的人，定是心存善意的人，这下我彻底放下心来。

住下来那晚，塔吉一直跟我强调第二天要带我去参加会议，我不知就里，第二天一早真跟他去了。塔吉人缘奇好，穿街过巷，招呼声四起。

赶赴的是一场伊斯兰教苏菲教派的研讨会，和邻座嘉宾聊起才知，他们都是从世界各地飞来参加这个会议和苏菲艺术节的。什么，苏菲艺术节？再一转身看大叔，他居然戴起了工作证，严严谨谨地盯着会场。问了才知道，塔吉大叔竟是艺术节主办者之一。而这几日菲斯游客奇多，原来都是冲着艺术节来的。

会议结束后，大叔叮嘱我晚上提前回来，跟他去音乐会。我又不明就里地去问身旁的嘉宾，被告知连续一周夜里都有艺术节演出，既有土耳其苏菲教派音乐会，也有埃及苏菲舞。在得知我误打误撞认识塔吉大叔，可以跟着他免费入场而无须支付几百欧元的套票价格之后，英国嘉宾们嫉妒得不行。



跟着塔吉大叔，蹭了苏菲艺术节的不少演出

大叔的妻子女儿英语都不灵光，我阿拉伯语又水得不行，一直沟通不畅，只能呵呵傻笑。第二天夜里，我终于见到结束酒店夜班回来的大叔儿子。通过跟他的英语对话，我的一切迷惑才解开。

原来这里根本不是民宿，大叔让我住下，只是那天看载我的司机语气不善，担心我会被欺负，特意帮我而已。

这几天来，每次我出门，大叔都特别啰唆，嘱咐我看好钱包，放好相机，又怕我迷路，还把家里地址分别用阿拉伯文和法文写了一遍。当然，迷路还是我每天的主要任务。脑袋本就少一根筋，更何况菲斯还被“孤独星球”称作世界上最容易迷路的城市。

有天出门前，塔吉大叔将我拽进厨房，告诉我他妻子上班前给我煎好了蛋饼，用纱巾捂着怕凉。我顺便把房费给大叔，他看看我，说没问题吗？我反问，什么问题？大叔说，没关系的，如果钱不够，不用给的。大叔的英语和我的阿拉伯语沟通也就能到这个程度了，我感动了一会儿，又得手舞足蹈地跟大叔用肢体语言沟通了。

离开那天，大叔和妻子一早起来给我做了满桌的早餐，又和女儿捧出一大把礼物送我。我忍不住，哭了；见我哭，塔吉的妻子也哭。两个从未能听懂对方语言的人，哭得稀里哗啦。

塔吉大叔靠在墙角，喃喃地嘱我别忘了他们在菲斯等我，菲斯有我的家。

摩式噩梦

除了在卡萨布兰卡和菲斯穿街过巷遭遇的言语冒犯，摩洛哥的另一噩梦是皮革染坊。

那些色墨深浓的染坊图片，曾击中我的心，让我异常期待。在热闹的马拉喀什，我独自寻找染坊时迷了路，遇到路人A，他一副非常热心的样子给我指路，随后A巧遇朋友B，说B在染坊工作，嘱我随他前往，我暗叹运气好。B领我寻找染坊，一路夸赞中摩关系，听他夸我的祖国，我更是欣喜，丢了戒心。终是到了染坊门口，B把我交托给C，说C是看门人，熟悉染坊，让我随他游览。C递给我一把薄荷叶，称坊内臭熏，把叶子放鼻子下可驱味。

看C随身备着薄荷叶，我立马起了疑心，直觉告诉我C是染坊导游，最后会对我要钱。当下无他法，只好随C入染坊。



满是游览陷阱的菲斯皮革染坊

动物尸体的腐味像海水一样喷涌而来，我必须用薄荷叶紧紧捂住口鼻，才能止住呕吐的冲动。才看了两三分钟，见我嫌臭，C说，出来吧，带你去不臭的地方。

那一刹那，我顿悟，呵，要带我去皮革商店了。

果不其然，进了店里。C变了脸，把手摊开，语气强硬地问："你难道不想给我什么礼物吗？"我给了他15迪拉姆，他塞还给我，说15迪拉姆什么都不是。我把他的手打开，又把15迪拉姆塞回去，告诉他"要不拿15迪拉姆，要不两手空空滚蛋。"他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甩了一把手，走了。

我坐在店里，既不买也不看。店主盯着我，一会儿拿出一个背包，一会儿又拿出一个手提包。旁边坐着英国来的一家三口，丈夫颇

有兴致地在挑选皮包，太太脸色微愠。我问她："你们也是问路问来这里的吗？"本倚坐着的太太见碰到同样受骗的人，激动得挺直了腰板。我便明白了，领路就是他们谋生的方式，只是这种方式击毁了人们单纯的信任。

太太见我被店主缠住离去不得，便向丈夫提出要离开，想保护我一同走回市区。丈夫还沉溺在皮包海洋里，花了500英镑，买了三个完全可以在英国买到的小皮包。我和他太太对视一眼，对他的天真愚钝感到非常绝望，齐声叹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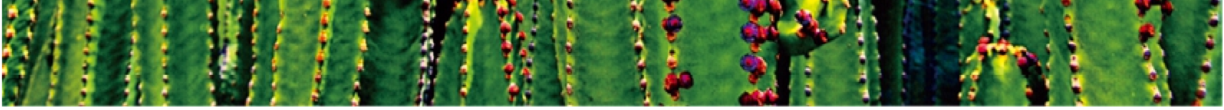
那次之后，我又去了3次皮革染坊，有在马拉喀什的，有在菲斯的，都是陪着路上认识的背包客前往，担心他们被骗。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因为一直历经这样的循环：被带路、被导游、被收费。

当然，这些只是偶然来袭的梦魔，日常的摩洛哥仍是那般多彩而神秘，美好得让人几乎忘了回家的路。

CHAPTER 7 探荷西

西撒哈拉/加那利群岛





不喜与人谈书谈电影，不喜与人分享精神世界，觉得那很私人；当然也出于不自信的心理，自己的品味不愿受人指点。钟情三毛多年，但并不向人推介她的精神或作品，觉得深藏心中足矣。

喜欢三毛，喜欢的只是她的情怀，而并不在乎她去过哪里，更不盲目追随她的行迹。当然，我那糟到尽头的记性也不允许我记得住。因此，这趟来摩洛哥旅行前，对于三毛、荷西曾居于此，我的脑子里毫无印象。

始终认为荷西未必是三毛的最爱，但一定是三毛最契合的灵魂伴侣。他有恒毅，守得起这样一位随时消失的女子，也甘愿为她放弃一切，四海为家。

在阿尤恩时，与一位撒哈拉威女孩在大西洋边的灿然星空下聊起三毛，提及她的自尽，又直言三毛是我到阿尤恩的原因。女孩见我对三毛有同理心，似乎会错了意，以为我的内心也有寻短见的念头，于是显得颇为激动，连连说自己尊重我对三毛的喜爱，但绝不赞同三毛离开世界的方式。我安慰她，说自己乐观积极，人生步入任何逆境，都不会自行结束生命。

我惋惜荷西的突然离世，同时也理解三毛为何告别世界：她的人生太精彩，有着堪比百岁老人的经历，延不延续，对她而言意义都不大。但有时我也遗憾，若三毛仍在，或许能感动更多人。

初访拉帕尔马岛

加那利群岛是西班牙的海外自治区，也是欧盟的特别领域之一。三毛与荷西曾住在首府大加那利岛上的泰德小镇，而荷西逝世于另一个叫作拉帕尔马的岛屿，他的墓碑也在该岛上。我本打算航班落地后直接前往泰德镇，不料问路时认识了选修中文的当地女孩艾礼莎。一聊，艾礼莎的小组研究课题，选的正是三毛。

艾礼莎建议我住在拉斯巴马，更热闹也更便利，我听从，因此结识了同车前往拉斯巴马的两个甘肃女孩。两个小姑娘就读于兰州大学经济系，在马德里做交换生，就地理之便，来加那利游玩几天。她俩虽小，经验却不浅，一路交通地图认得牢，十足独立。她们热心，为我搜旅馆，找了一家便宜的，又给我指明路线。

结果我不出意外地迷路了。忽遇一家中餐馆，进去问路。中国老板一见是同胞，尤其热情，老板夫妇来自福建，已在加那利扎根20余年。我点了炒面，老板娘进厨房，炒锅砰砰几下，捧出一大份炒面给我，足三人分量。



荷西逝世的拉帕尔马岛

老板一直劝我在他家住下，我答应了。老板娘在忙，我把50欧元放桌上，想付餐钱和住宿费。老板娘喊我：“小妹，钱别乱放。”我说是付她的，她却固执：“都是中国人，不用给钱。”我坚持付饭钱，老板娘象征性收了5欧元，尽管餐牌标着10欧元。

老板娘把我领回家，给我钥匙，指着房门对我说：“你晚上如果怕，就反锁房门，我和孩子们住这里，不会对你有什么企图。”分明是她领我这个陌生人回家，不仅不怕我使坏，还交代我别害怕。

老板娘说，西班牙现在经济低迷，以前在加那利，沿街乞讨的都是隔海而来的摩洛哥人或吉卜赛人，现在竟也有了西班牙本地人；他们夫妇的店铺主要经营酒吧，也做中餐，经济形势倒退，他们的生意大不如前。“我挺累的，也好想像你一样旅游，可是旅游也很累，再说我们的西班牙语仅限于点菜，也不会英语。我们每天5点多就要起床备菜，凌晨1点多才收店，暂时关了店去旅游吧，心又放不下。”老板娘一边说，一边困乏地打哈欠。

遗憾的是，从这次交谈结束到我搬出，都没再见到老板夫妇。当天西班牙皇马主场，酒吧生意颇好。我想亲口对他们道谢，无奈等到凌晨4点仍不见其归。我觉得酸楚，深明同胞的勤劳来自血脉，也是祖国愈加强大的原因，可看着街上店铺都因周末而歇息，唯独汉字招牌的店铺还亮着灯，里面是为了孩子为了生计而奔忙的同胞，我心有矛盾情感。

赶早班机到了机场，机场安检让我放下手中的百香果汁，因为不许携带液体登机。于是抢着在果汁被扣下前，我又灌了几口，才舍得放手。他们取笑我：“不多喝几口？”喝，为什么不喝！于是我又抱起我的百香果汁，咕咕咕咕，喝成了《人在囧途》里在机场抱着牛奶喝的王宝强。

抵达拉帕尔马岛，到旅馆放好物品后，第一件事是去买花给荷西。不料因是周日，市场店铺一律关门。忽见街头一个漂亮的西班牙女孩手中有两支玫瑰，便上前去问是在哪买的。女孩娇羞地拉着身边男孩：“男友送的。”

买不到花，我难过。女孩问我怎么不第二天再买，我说因赶着去祭拜一位亡友。女孩一听，毫不迟疑地把玫瑰塞到我手中。我也没再客气，谢过灵魂与外貌一样动人的她。

玫瑰还带着朝露，想必荷西会欢喜。别过女孩，我总算走到墓园，可因是周末，墓园闭门谢访。

既然闲着，便在城里乱逛，这一逛，实在不得了：拉帕尔马岛太美了！来之前，西班牙朋友都嫌弃，说我怎么挑了个又小又偏的岛旅游。可这一看，山河湖海，银河星宿，火山植被，拉帕尔马岛应有尽有。后来问路遇见的中餐馆老板也来自福建，见我是同胞，老板尤其热心，提供旅游信息之余，又连问要不要吃喝。老板遗憾地说他翌日要外出，不然一定开车载我环岛。后来在拉斯巴马和拉帕尔马都遇到不少华人店主，见我是同胞，他们都十分热心。他们身在海外，不仅没有忘记自己的根，还竭力去照料素不相识的同胞，这份血脉之情叫我感动。

夜半到山顶观星。来了拉帕尔马岛才知道，由于地处大西洋信风带，这里常年干旱少雨，晴朗的天空有利于清晰地观测夜空，而岛内海拔2400米的查乔斯岩火山上还建有一座世界闻名的大型天文台。载我上山的司机告诉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天文摄影师每年夏季都会来岛上，租他的车子上山拍摄银河，就连见多识广的他们，也常常被这里的银河所震撼。

车子一路朝山顶开，愈加远离市区的光害。窗外，整条银河挂在苍穹，漫天星斗散落如棋子，忽明忽暗。我努力抑制住尖叫，身旁的

司机却说：“因为有雾霾，今晚的星空很一般。”他口中的“雾霾”，指的是撒哈拉空气中的沙尘。他笑言：“每次有沙尘，就说明海对面摩洛哥的骆驼又开运动会了。”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梳妆打扮，想着这辈子可能只见荷西一次，不该随意。进墓园后，把荷西的西班牙语全名给工作人员看，他只看了一眼，便读懂我心似的，一路领我往里走。



拉帕尔马岛的星空



供悼念者留言的小石子

我曾劝诫自己，无论荷西的墓多荒芜，甚至碑牌可能年久失修，都不要哭，不要文艺腔泛滥。可当工作人员往墓碑一指，我傻眼了：墓碑修葺一新，开了一个透明小柜，里边堆满小石子，供悼念者在上留言，小柜里放着三毛与荷西的合照，墓前放了好几束鲜花。墓的两旁，一边是关于荷西的悼词，一边是花坛，放了三毛荷西照片。原来，有这么多人千里迢迢地为三毛荷西而来，我的泪唰唰不止。

无论之前我多么理解三毛的离去，那一刻我开始责怪她：这么多人爱你，你怎舍得走。

荷西的简介里写着，他生于1951年，卒于1979年，可见是比1943年出生的三毛要小8岁。而三毛在书里说荷西比她小4岁。可爱的三

毛，浪迹天涯个性洒脱，却还顾忌着亚洲社会的世俗陈见。

动手去清理荷西墓前满放着的花束，取走枯萎的那部分。水池就在不远处，一旁备了十几把薄荷绿的铁壶。取一把壶，灌满水，为花束润了喉。难以想象当年痛失丈夫的三毛，是如何做这一切的，想必抬手迈步都揪心撕痛。

墓园职员很贴心，见我还在，给我递来钥匙和记号笔，让我开柜取石子留言。于是写下了：

旅途遥远艰辛，于我并不打紧，只要见到你们，就是旅程意义所在。在我彷徨的岁月里，《温柔的夜》点亮了我的人生。你们点醒我：世间除却金钱、权力、竞争、攀登，还有善良、自由与真爱。

相信你们早已重逢，在那无尽的透明过道里。

有空梦里相聚，说说新的旅途故事。

只是，

笨蛋荷西，拜托这辈子别再潜水啦；

傻瓜三毛，拜托这辈子活久一点呀。

很想你们，

怀念你们，

感激你们。

离开时已是正午，墓园里温暖明亮，没一丝阴森感觉。荷西歇息处，山清水秀，让人欣慰。墓园东边，对着的正是荷西热爱的那片大

海，海面波光粼粼。整个世界静悄悄，一如一切生离死别都没上演过。

与南施姐结缘

朋友玺哥在拉斯巴马经营着规模颇大的中餐馆，来自浙江温州的他很是热心，知道我喜爱三毛，竟约好了三毛生前好友张南施与我见面。三毛在《随风而去》里写过，“南施是我亲爱的中国妹妹”。

见面前，我心里有很多顾虑，怕打扰了南施姐的私人空间，更怕的是，南施姐借三毛名气营利。

见了面，才知道自己怀的是小人之心。我和玺哥不必敲门，南施姐闻电梯声，早早打开门来。她探出半个身子，笑意满盈，不问来处，不问意图，只如故知一般招呼：“来啦！”

南施姐13岁时初见三毛，她说，三毛不嫌弃她人生经验少，纳她为友。才见南施姐，已深明三毛为何偏爱她：她亲和，在加那利的经商经历和丰富的人生履历，并没有叫她挑起眉梢瞧我；她的相貌叫人看一眼就喜欢，衣着简单却大气，留着短发，跟她干脆的个性很相衬。

三毛，好眼光。

与南施姐、玺哥聊了大半日，自有落泪处，但因部分故事涉及三毛等人的隐私，这里不提，只记录几个触动心灵的部分：

我猜想荷西是脑子简单的大男孩，夫妻俩在撒哈拉的生活，经济来源大多靠三毛的稿酬。南施姐却告知，荷西是个目标清晰的人，他少时立志要挣钱，梦想是“做个百万富翁”。他去打工，在餐馆、面包店都工作过，这对于大多数爱玩的西班牙孩子而言，并不寻常。荷西

十六七岁时，就爱上了三毛，他对家人说自己要努力挣钱，“要娶老婆”。

初见三毛，荷西还在念高中，后来荷西升入大学，修读机械专业。荷西对航海有狂热的喜爱，后来又爱上了潜水。毕业后，荷西参加部队里的潜水工程师执照考试。在当时报考的50人里，荷西得了最高分。待再见三毛之时，荷西已有了高级潜水工程师执照，觉得自己有养老婆的能力了，可以找工作了。后来，听三毛说起喜欢撒哈拉，荷西就不声不响地去了撒哈拉，把工作找好，等着三毛过去。

我在阿尤恩看到的三毛荷西的故居，房子破旧，通风透光情况都不好，当时猜想，三毛荷西在阿尤恩的日子并不好过。后来到了加那利群岛，对各岛的地理位置有了了解，再想起三毛住在大加那利岛，而荷西却在偏远的拉帕尔马岛工作。夫妻分居两地，想必也是因为生活所迫。

但南施姐都否认了，她解释，当时在西撒哈拉，驻外人员一般会挑选环境好的社区来居住，既为安全，也为生活质量；三毛荷西却选择了更便宜的住处，甚至临近坟场，是因为小夫妻精打细算过日子，省下钱来，为未来规划。

当时，西撒哈拉是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1973年，被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认定为接班人的西班牙政府首相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被埃塔组织安放的汽车炸弹炸死。而在1974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重病在床，已无暇顾及西撒哈拉殖民地。西撒哈拉，是继续由独裁掌控并由军人接政还是独立，无人能准确预测。

终于在1975年11月，摩洛哥政府发起大型群众游行活动，即“绿色进军”（Green March）。其时，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号召起35万非武装的摩洛哥平民，由政府组织和军队保护，从摩洛哥南部城市塔尔法亚出发，举着代表伊斯兰教的绿色旗帜，越过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之间

的分界线，以迫使西班牙放弃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因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重病，西班牙无意在此时卷入战争。一周之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匆忙签订《马德里协议》（Madrid Accords，也称Madrid Agreement），承诺在次年初从西撒哈拉全数撤军，放弃西撒哈拉殖民地。

殖民地前途未卜，安全成问号，作为外来者的荷西与三毛同其他外籍人员，也决定从阿尤恩撤离。他们选择了离撒哈拉最近的西班牙领土，即加那利群岛。大加那利岛是加那利群岛的首府，因此所有驻外机构都选址在此，加之交通较其他岛屿更便利，三毛夫妇便选择了定居大加那利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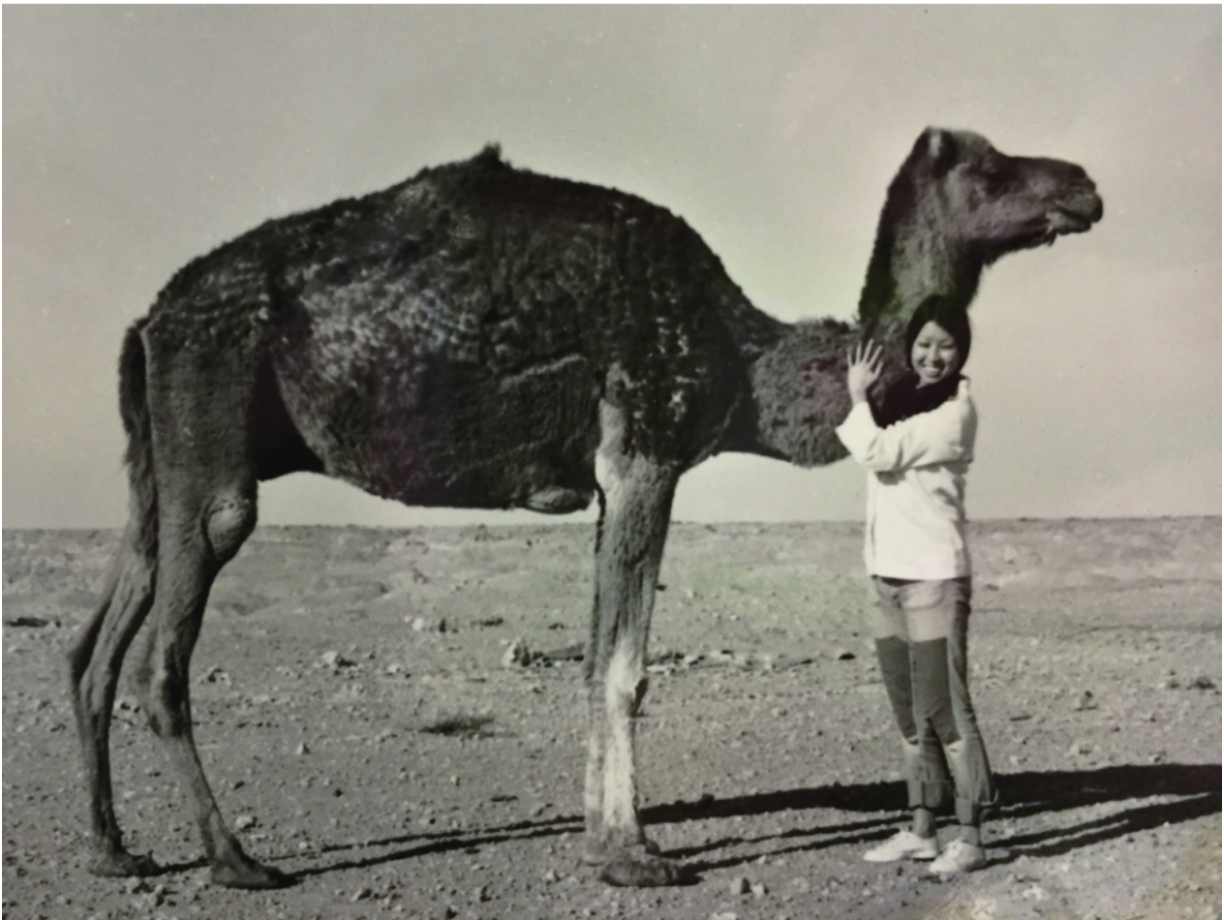
三毛先独自乘班机前往大加那利岛，荷西由于有工作任务在身，是西班牙人里最后一批乘船离开撒哈拉的。不同于我的猜想，荷西前往拉帕尔马岛工作，是因为水底工程工作移动性很大，地点不固定，哪里有工程，荷西就需要往哪里跑。除了拉帕尔马岛，荷西还曾前往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参建工程。由此看来，荷西对家庭也有经济贡献。当然，三毛当时已是台湾版税最高的女作家。但南施姐也说，在西班牙朋友圈子里，三毛从未炫耀自己的作家身份，她的西班牙朋友甚至不知她是作家，更别说知道海的那头已掀起了“三毛热”。

南施姐回忆说，三毛对荷西的感情很深，每次荷西前往外地工作，不出一个月，三毛必定前去探望。那时荷西在拉帕尔马岛，一旦稳定下来，三毛就锁上房子，驾着小车，开上渡轮去看望荷西。后来荷西去世，三毛回台湾，任教于文化大学，却仍如候鸟一般，每年回加那利度假及探望好友。直到1986年，三毛对南施说，父母年纪已大，她想回台湾长久待着，陪在父母身边。

南施姐继续打消我的忧虑，她说三毛爸爸曾是律师，家境很好，而三毛是个毫不在乎金钱的人。在1967年，出国仍是奢侈的事，三毛却能到西班牙去。她又举例，荷西逝世后，三毛得到一笔“寡妇抚恤

金”，金额颇高。当时，因为荷西家人与三毛有遗产纠纷，三毛将房子急急转手，卖给了西班牙人璜。璜并未更换家里的号码，仍用着三毛（Echo Chan）的号码，而每月30欧元左右的电话费，从三毛的寡妇抚恤金里扣除。三毛对此从不在意，可见手头并不拮据，也可见其从容的金钱观。可直到三毛逝世，璜仍在用着以三毛名字注册的电话号码。璜自辩这是三毛与他的约定：不必更换号码、名字。

三毛逝世后，其家人抵加那利群岛处理遗物。璜淡淡地提及抚恤金一事，让三毛家人考虑如何处理。三毛家人忆起，三毛曾替邻居甘蒂在大加那利一家学校代课，家人去校区看过，认为教学条件并不乐观，于是建议将抚恤金捐给学校，希望改善教学环境。三毛对金钱物质的洒脱，可见传承于此。



南施姐提供的三毛旧照



南施姐提供的三毛旧照

不仅是璞，在三毛离开后，打着她名号来哗众取宠、赚钱获利的人不少，诽谤她名誉的人也不少。正如同南施姐所说：“爱护三毛的人很多，伤害三毛的人很多，利用三毛的人也很多。”

我忍了很久，曾打算不提痛处，最后还是问及了三毛的离世。南施姐说了很多，内容如同读者们了解的那样，在三毛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她过得很累、压力很大：教书、演讲，加上被出版社催稿的压力，让她很难过。

1990年6月25日，在给南施的最后一封信里，三毛语气悲凉：

前年、去年我常在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一带，去年我开始回中国。上个月方自新疆回来（去走丝路）。下个月我再去北京以后，

转去青海，预计去三四个月，一个人走。

去年将肋骨摔断，插到肺里去，也开了肺，苦了半年左右不能好，一好，就去了丝路。在这儿，我也很少跟西班牙朋友来往，我去年住院时，一个西班牙朋友去看我，我们讲讲西班牙文，我就哭了，他说：‘不要哭了，好了还是回西班牙去吧，我们合租一个公寓生活也便宜些。’事实上，这些都已是梦话，南施，人，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我也很难再回西班牙去了。明年我想回西班牙一次，当然去拉斯巴马，也许冬天再来了。

这么写信，对于西班牙的想念就更强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相处，充满了感情和真诚，这种情感，在中国不是没有，也有的，可是整个社会风气，口气，却不是如此，而且人不真诚。

南施，我有好多的话想讲给你听，可是现在不惯写长信，又想，你有餐馆，有咪咪，有小强，有父母，忙也忙够了，看我的心事实在不必。

半年后的1991年1月4日，三毛自缢身亡。

三毛的兄弟姐妹都后悔，当初不该让她卖掉加那利的房子，这无疑断了她的后路。她在台湾压力大，但避无可避。

但三毛妈妈不认为这些压力足以让三毛离世。南施姐说，陈妈妈坚信，三毛不是自杀，而是心脏衰竭死亡——三毛体质弱，心脏一向不好。陈妈妈回忆，三毛压力大，常失眠，夜里睡不着，就起来做家务。三毛爱干净好整洁，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收拾，也成了三毛暂忘失眠的良方。但后来三毛因子宫内膜增生症，入住台湾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陈妈妈分析，医院里没什么物品可供三毛清洁，夜里睡不着的三毛起身不知该做些什么，于是去洗丝袜。病房里有钉在墙上

的点滴架，三毛洗好了丝袜，挂在点滴架上想晾干，可就在那一瞬，她心脏病突发，瘫坐在马桶上，脖子正好挂在丝袜上。

这样的分析，细想起来应当不仅仅是一位母亲的自我慰藉。我搜寻图片，发现荣民总医院的点滴架，看起来并不承受力超凡。南施姐说，三毛与她体重相当，大概50公斤，即便不重，也不是一个点滴架可承受得起的。加之，人自缢身亡，会痛苦，甚至会后悔，更有可能因此挣扎，但三毛毫无挣扎痕迹，表情平静安详。再且，自缢离世，常理应是悬挂身子，但三毛走时坐在马桶上。只要她后悔，稍微站起身即可。陈妈妈坚信，三毛不会自尽，理由很简单："她答应过我们，不会走在前面。"

我问南施姐，陈妈妈有没有将此见解告知媒体，南施姐叹惋，当时台湾的死亡报告明确写着"自缢身亡"，加上许久前三毛的德国未婚夫心脏病突发离世，三毛曾割腕自杀，手腕上的伤痕，一直用手表盖着，家人便没再深究。

在荷西的墓碑一旁，有这样的悼词："这些岛屿不再是他们的人生天堂，意外成为他们的坟墓。水、地，尤其是每个冬季的阳光，连接所有的生命充斥了他们的遗体。前葡萄牙航海员行程、拉帕尔马岛美岛及台湾宝岛因此一线连接的记忆：人、海、和平。"

这段话由拉帕尔马岛一位本地作家写就，说是作家，实不恰当，他是拉帕尔马岛文化局的一名记事官。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远赴拉帕尔马岛，为的就是看一眼荷西生活和去世的地方，这个现象引起了当地旅游局和文化局的重视。2015年5月，当地政府出资，在荷西发生事故离去的海域旁，建起了荷西纪念广场；同期，未曾见过三毛荷西却对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兴趣的这位记事官，通过走访记录，集成了一部《橄榄树与梅花》（西班牙语书名：El Olivo Y La Flor Del Ciruelo），以西班牙常见的橄榄树喻荷西，以梅花喻三毛，记述了三毛荷西在拉帕尔马岛的人生最后光阴。

墓碑悼词由记事官用西班牙语写作，想必是借用了网络翻译，才语法不通。我问南施姐，“前葡萄牙航海员行程、拉帕尔马岛美岛及台湾宝岛因此一线连接的记忆：人、海、和平”这一句如何理解，南施姐说，三毛与荷西的逝世有很多相似处：他们都在年轻时告别，他们都离开在海岛。

早在16世纪中期，葡萄牙航海员来到台湾，惊叹地叫着“Ilha Formosa!”意为“美丽的岛屿”。因此，台湾岛在早期也被欧洲称为“福尔摩沙”。而荷西意外故去的拉帕尔马岛，西班牙语别名是“La Isla Bonita”，同样译作“美丽的岛屿”。冥冥中的凑巧，叫人叹惋。

陈爸爸、陈妈妈只见过荷西一次，这一次，即是永别。我身边有朋友好奇，为什么三毛与荷西成婚数年，一直不见三毛父母，是否算不孝。南施姐却很理解：那时机票价格高昂，飞台湾需要20万台币，以当时加那利群岛的人均收入水平来说，人们需要工作4个月、不吃不喝，才付得起一张单程机票。于是经济条件更好的三毛父母借着中秋节，前来探望女儿女婿。后来，三毛与父母一同飞往马德里，送爸妈回台湾。那天是个周末，荷西与朋友外出游泳，身子被卡在礁石之中，最终离世。三毛与父母得知噩耗，当即从马德里赶回大加那利岛，由于机票售罄，三毛是同飞机驾驶员一同坐在驾驶舱返回的。

陈爸爸陈妈妈遥遥万里，前来探望女儿女婿，却意外面对如此大的苦痛。大家都坚信，如那时陈爸爸陈妈妈不在身边，三毛心理上必定熬不过这一关。

见三毛悲切，三毛弟弟曾悄悄问南施：“三毛荷西，以前在岛上真的快乐吗？”

真的快乐。南施姐回忆，且不说荷西在世时，三毛与荷西恩爱情深，邻里互重，没有生活压力；荷西离世后，三毛再回大加那利岛，只要一封书信、一通电话，邻居就赶去机场接她。大家都很爱护她，

每天去她家里闹她，争着带她吃饭，请她喝酒，不放她回家，就怕她寂寞难过。

玺哥打趣我，说我这趟去了撒哈拉，见了三毛故居，又到了加那利，总算触到三毛生平，知道三毛荷西不是假的啦。

然而我从未质疑过三毛笔下故事的真伪，一来我爱旅行，也有奇遇，那些叫人惊奇的故事，在我看来都是旅途寻常；再者，三毛荷西是真是假，三毛笔下的故事有否加入文学性的修饰，毫不重要，我、我们、千千万万的我们，爱得真切的是三毛传达的善良与真诚，而这种善良与真诚，在我们的人生里，好像一盏明灯，于浓沉的迷雾里，照亮我们心灵的路。

这趟旅行的目的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原本该有的意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三毛荷西和他们的故事终究是故去了，三毛之后，世间再无三毛；荷西之后，世间亦无荷西；而我们的人生还在继续，受教于他们的爱与善良还在继续，且生生不息。

CHAPTER 8 不惧去爱的贝蒂娜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


TAVOLA



画家朋友贝蒂娜

她只需艺术与爱来养活

2011年，我从俄罗斯，一路旅行到叙利亚，途径埃及、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以色列圣城耶路撒冷，我经好心人介绍，住在易卜拉欣的家里。信仰伊斯兰教的易卜拉欣虽住以色列，却是巴勒斯坦人。他年轻时颇爱旅行，中年开始投身和平运动，呼吁以巴停火，以防加沙地带再有平民无辜身亡，年老后，他开始免费接待全球旅行者，提供免费食宿、配套的洗衣和网络等设施。

在易卜拉欣的和平小屋里，我认识了来自西班牙的画家贝蒂娜。那时，在贝蒂娜的眼里，我还只是个在念大学的小丫头。有时大家聊起两性话题，贝蒂娜会给大家使眼色，意思是“别带坏了Carrie”。眼界高低，并未阻碍贝蒂娜接纳我。这数年间，我们书信频繁，直至这次，我终于应了承诺，特地来马德里探望她。



贝蒂娜在画室

贝蒂娜出生于古巴的哈瓦那，从小随父母移居西班牙，而祖父母则出生成长于加那利群岛。多元化的家庭背景，让她得以把中美洲文化与欧洲生活方式结合，这或许也是她成为画家的原因之一。可是贝蒂娜也无奈："真正的艺术，不为赚钱，无法糊口；一般而言，画作也只在画家过世后才值钱。"于是，她只好在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凌晨5点起床，到保险公司工作至下午4点，晚上7点去画室工作，直至10点才回家。问她累吗，她连作答的力气都没有。

贝蒂娜离婚三次，第一任丈夫是日本人，其后则为黎巴嫩人和西班牙人。据她描述，每次离婚，都如同挣脱一场灾难。

可她家里却挂满了她为三任前夫绘的素描，还有不少笑得甜蜜的合影。我嗤笑，问她怎么不销毁，也不怕新人介怀。她把双眼瞪得大

大的："销毁？！这是我的人生！没有这些爱情、婚姻、伤害和甜蜜，我的人生就是空壳。这么美好的东西，我才不要销毁，我要展示！"

她乐观，但并不掩藏离异对她的伤害。日本丈夫想要孩子，她尝试试管婴儿，直到身心俱疲积蓄花光还是没有结果时，她签了离婚协议："我爱他，但我更爱自己。"黎巴嫩丈夫有着迷人的深棕眸子和俊挺的鼻梁，但她终究明白外表不是唯一，心灵契合才顶顶重要，于是又告别了这位连西班牙语都不会、只靠外貌就把她拿下的男人。第三任丈夫是西班牙人，用她的话来说，两人共度过一段无比美好的时光。他曾经上进富有，然而经商挫败，让他从云端跌落，慌了神——他深知，爱马仕不会再有，敞篷车也将要易主。于是，他逃了，找了一位千金小姐，怕什么吃软饭，只要能穿金戴银就好。

坐在酒吧里，我问贝蒂娜，如果他没弃你而去，你愿意同他贫富与共吗？贝蒂娜晃着手中的白葡萄酒，缓缓地说："我是一个爱喝香槟的人，但我完全不介意一辈子吃水煮蛋。"她还说："我爱他，不是爱他身上的名牌。"

我正想安慰，贝蒂娜却忽然点开手机相册，捂着嘴笑："你看，这是我新男友，是个律师。我和他的结识很微妙，是在一个滂沱的雨夜。我在电影院旁等朋友，等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人，只好去咖啡店躲雨。咖啡店客满，只有他身旁有一个空位，我问他我可否坐下，他看了我一眼，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你的手真凉。'那时，我刚做完雕塑，手上都是泥巴，又脏又燥，他却不介意，一直握着。半个小时后，等我朋友赶来时，我们已经在接吻了。"

"可是，"贝蒂娜抱怨，"他有一段长达13年的婚姻，离婚后的他另觅伴侣，约会频频，对我爱理不理。"我有我的亚洲价值观，因而不解地问她，何不矜持一些，对他的情感内敛一些，甚至是，欲迎还拒。

她又瞪大了眼睛："我不管他对我的态度怎样，我的人生很短暂，我不要戴面具，我喜欢他，我就要表现出来。"我笑，她可真勇敢，一般人在经历感情创伤后，都开始质疑、蜷缩、害怕，甚至欺骗和伤害下一任，然而贝蒂娜，活得真性情，爱得真洒脱。

有一次，我提及朋友的相亲经历，和缓的语气惹怒了贝蒂娜，被她教育了足足一夜："你怎么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提起'相亲'这种泯灭人性的事？相遇至相爱应该是等待上天的安排、听从缘分的指示，而不是两家人面对面坐着聊自己的学历资产以及探讨未来要买几套房子。"还指着我的鼻子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幸被安排相亲而不去抗拒，你就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Carrie了！"

曾经，我无法理解西方人普遍的感情观，认为他们放浪。后来见得多、听得多，我也开始尊重和理解各种对待感情和生活的方式。虽然我深信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会做大的更改，但也认为，天大地大，我们不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框住其他大活人。

我好奇贝蒂娜乐观个性的成因，直到我见到她的妈妈，所有疑问都得到了答案。

贝蒂娜开车接妈妈一同逛公园。她那88岁的妈妈穿着件深紫色小棉袄，隔着马路见到贝蒂娜的车子，却不急着过来，反而顾着去逗街边吹着泡泡的小娃娃。好一会儿，她才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挤进车子后，转头来看，才发现后座的我，呀呀呀呀地叫了半天，用上个世纪学的英语向我问好，不外乎是初次见面的客套句子。她急，拍着脑袋同我解释："60多年前学的英语，早忘光了。"

西班牙美人儿把牛角包藏进柜子后，叫我不要告诉贝蒂娜



西班牙美人儿把牛角包藏进柜子后，叫我不要告诉贝蒂娜



西班牙美人儿说我离得太近，拍出了她的皱纹，大喊不悦

车行半途熄火，贝蒂娜下车检修。老太太不慌，也不过问，只从包里取出一本数独，消遣起时间来。

有行人经过，原是老友，认出她来。小伙子对她亲了又亲，喊她“西班牙美人儿”。她咯咯笑，那男子准备离去，她转身对我说：“这家伙喜欢贝蒂娜，哎哟喜欢得不得了，可惜贝蒂娜不喜欢他，他一厢情愿啊！”她耳背，不知自己音量惊人。男子早已窥听到，只好在车盖前低着头讪笑。

我们去公园，西班牙美人儿又哇哇叫，命我给她和花儿拍照。我靠近她，她摆手冲我喊：“Carrie，你走开，走开！不要这么近！会拍出我的皱纹！”拍了一会儿，她坐下，拿出画板，准备写生。这种酷劲儿，是历经了一生的风雨沉淀，不是18岁少女鼻尖上的钢环、腰间的蝴蝶文身或是指间的薄荷香烟可比拟的。

贝蒂娜邀亲戚们来吃中餐，我忙活了好一会儿，见西班牙美人儿把饺子送进嘴里，眼睛瞪得大大的，鼓着嘴叫好吃，我便觉值得。

西班牙美人儿吃热了，抱怨说想脱外套，忽然想起什么，指着胸脯、拍着桌子对我说："大地是何等的残忍啊，竟叫我的胸部下垂了这么多！想当年，我在古巴开敞篷车，只要我经过，处处是'哈罗'，整个小镇唯我独尊。哎，光阴不再。"全家人听了，无一不大笑。

贝蒂娜的两层居所，在公寓楼的顶层，位于阿尔卡拉大街，这也是马德里最长的街道，长达10.5公里。日出时、黄昏时，我从窗户往外看，看到朝阳和落日这般美，叫人不甘愿错过，才明了在忙碌的马德里，凡是下班后，人们为什么都会到街头喝一杯，把努力工作和享受生活的天平扶得稳当当。



在贝蒂娜公寓阳台拍落日

我一直盼着贝蒂娜能把天台的钥匙交给我，好让我看一次日出或日落。但她说登顶太危险，必须挑一个清朗的白日。可她工作忙，总是晚归。一天黄昏，见夕阳美得醉心，我按捺不住，从手臂宽的小窗户爬了出去，登顶后，忽然狂风大作，乌云盖顶，可马德里的街景依然梦幻。贝蒂娜得知后，气呼呼地喊："你这个中国小疯子！"

贝蒂娜热衷于研究艺术史，常为我介绍教堂、画作、雕塑和马德里各景点的历史文化背景。她带我去酒吧街，穿街过巷进了一家外表平常的酒吧，走入地下室，才现乾坤。这家酒吧曾是妓院，地下室的昏暗隔间曾用来招待嫖客。后来，有商人买下酒吧，把地下室建为微剧院，特地招聘失业的男女专业演员出演微型戏剧。每个隔间里都是一场独立演出，只容纳15名观众，不许拍照录像。演出并不高雅，穿插不少荤段子，但演员敬业，毫不受场地狭窄的限制，剧本也巧妙，结尾处总惊人。微剧院掀起巨大成功，法国、阿根廷都有商人复制此种商业模式。我看的那场，由两位美艳女子演绎，一位痛恨男人，一位热爱男人，无论是痛恨与热爱，她们都通过黄色段子来表达。

后来，有就职于欧盟的朋友邀我看欧盟举办的古典音乐会，我脑子里乍现微剧院女子袒胸露乳说着黄色段子的场景，心里忽然明白了何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我问贝蒂娜，我为艺术画了界线，这样公平吗？贝蒂娜很认真地说："艺术的界线不在于内容，而在于目的。微剧院虽出彩，但只为赚钱，决定了它的艺术影响只是一时的；但舞台上这些古典音乐家，肯定不为金钱屈尊，这些艺术的影响是恒久的。"

她带我参观建于中世纪的科拉莱斯剧场。它虽形似古罗马剧院，但不同的是，剧场建筑并非刻意为之，而本来只是居民楼中间的共通区域，后被用作舞台，表演戏剧、音乐剧、弗拉门戈等。楼上住的人家，都会备好糕点，在后院观看，而最下一层，则是马厩。贵族人家，不愿出入常用入口而自降身份，便坐着马车，从特殊通道进入剧

院。当天的演出越吸引人，马车越多，由于没有厕所，马匹随地排泄。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为即将演出的演员和赴考的学生送上这样的祝福：“祝福你马粪多多。”

在马德里待久了，我生了腻，只拾掇了两套衣物，便前往邻国葡萄牙转了一圈。财物尽失后，又乘大巴回到马德里，要同贝蒂娜告别。

马德里的历史文化建筑，不是几天走马观花可领略完的，时间不多，终是要走。贝蒂娜不高兴，说我待的时间太短。我不担心她不高兴，因为我知道，只要这世上有艺术和爱，她就能活得很好。

跨越大洲的重逢

2015年夏季，贝蒂娜漂洋过海来中国看我。

抵达前，我几乎每天都要回复她那数不清的问题，从天气、食宿到民俗习惯，她担心得很。她说自己从未曾独自旅行，那次在以色列与我相识时她独自一人，是因为被早就约好的旅伴放了鸽子。

她由始至终都不能理解我为何独自旅行，她抱怨说，独旅既孤独又乏味，连留影都得求着路人去拍摄，还得下一番功夫考察那个路人是否可靠，以防他揣了相机就跑。

只有司机或路人帮拍照是事实，与独旅相伴的孤独也是事实，但我坚持独自旅行并不意味着总是孤独一人，因为一路上会认识许多有趣的人，有缘分的话，还能结伴同游一程；而享受孤独感也是我最爱独自旅行的原因，在异域的每个深夜都是直面自我的良好时机，每每此时我都会自我剖白，思考怎样的人生是我想要的。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依然想不通什么人生是我渴望获得的，但我深明什么样的人生是我不希望过的：没有自由的人生。

我带贝蒂娜去了香港、澳门、深圳和青岛。

为了能让她体会香港各区的不同风情，我们几乎隔几天就换住不同区域的酒店。轮到九龙时，早已定好的九龙酒店却回复说系统出错无法入住，我逗贝蒂娜："你不是说想去印度却一直不敢去吗？近在咫尺的重庆大厦就满是来自印巴的投宿者，整栋大楼都蕴荡着咖喱的气味。"为加强神秘感，我还吓她，"从毒品走私到欺诈偷盗，重庆大厦

无一不有，还有像空调水一样滴渗的情色文化，让这座大厦更加复杂多元，你要不要住一下？”



与贝蒂娜在重庆大厦门前



“香港最帅的男人”

本是玩笑话，却撞上贝蒂娜这个满是好奇的枪口，最后我是被她央求着住进了重庆大厦。为了不吓坏她，我尽量挑了高价位的房间，两人进屋后，还是吓了一跳：从门到卫生间仅有半米宽，而从卫生间门口一步就能跨到床上。贝蒂娜远道而来，我为自己待客不周而抱歉，贝蒂娜却毫不介怀，笑着拍照不停，还同她妈妈视频聊天，给她展示香港的“寸土寸金”。

夜里，她同我聊天，说自己在街头海报瞧见了“香港最帅的男人”，还趁我洗澡时，凭记忆把对方画了下来。我自言自语，“香港最帅的男人是张国荣吧”，一看画作，这不是古天乐嘛。然而经我再三与贝蒂娜核对，才知道她画的是刘青云。

贝蒂娜很喜欢澳门，觉得既有葡萄牙的闲逸，又有别样的粤式怀旧风情。每去一处，她都要久作停留，拿出画板写生。

我和朋友陪她去全澳最高的旋转餐厅，聊起来才发现彼此都在大大小小的国际城市里去过不同的最高建筑，都感慨在追求国际化的路途上，许多城市的个性与原味已被远远抛却，以求完美接近这个世界对国际都市的遥遥幻想。而如今，仿佛每座俗气的大都市里都有这样一处耸入云霄的旋转餐厅，里面的食客窥视着夜幕里的车水马龙。

青岛是我和家人陪着她一起去的，她的好奇心就像泉眼般咕噜噜地往外冒，每天都有数不尽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显得年轻，是因为爱睡午觉吗？餐厅里为什么供应热茶而不是冰水？中国人与家人朋友之间为什么不说谢谢，也不拥抱？进别人家门，为什么要穿拖鞋，他们是嫌弃我的脚很脏吗？

贝蒂娜提得最多的，是蹲厕让她不习惯，她抱怨说，自己已经50岁了，根本就无法下蹲，而且社会上很多残障人士也无法使用蹲厕。我只好解释，西方人体格强壮、腿要更长些，身体的平衡点不一样，所以很难做到后脚跟完全落地的“亚洲蹲”，但这个姿势对东亚人种而言则毫无难度。至于服务残疾人的坐厕普及率不高，的确如她所言，这类基础设施亟待完善。

贝蒂娜的在华之旅，几乎被写生和提问所填满，直到有一天，我们把她带进了青岛外贸市场。在我记忆里，贝蒂娜是那个坐在马德里酒吧吧台旁，说出“我爱香槟，但不介意一辈子吃水煮蛋”的最佳恋人，也是那个认为“人们爱的是我，不是我的名牌包”的酷女人。然而

眼前的她，却一头扎进了正在甩卖的手提包里，不一会儿就双手挂满大大小小的包，冲我喊："这个是给外甥的，那个是给妈妈的，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我自留的……Carrie，你快过来砍价呀！"说着，呼了一口气，吹掉眼前挂着的几缕乱发。

那日以后的每个清晨，贝蒂娜睁开眼就问我："今天去哪个市场呀？"

品得起香槟，也逛得起外贸市场的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马德里。就在她抵家不久后，她在社交网站上传了两张照片。

我曾骗她，说青岛的"脸基尼"是中国时下最时兴的装束，防晒又时尚。她便不仅给自己买了一套，还给西班牙美人儿捎了一套。

这张照片的配文里，她用西班牙语写着："我爱'脸基尼'这款在中国时兴的玩意儿，它让我和妈妈远离了日晒，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有斑点和皱纹。"

底下是她爱慕者的回复："贝蒂娜，你永远那样敢为人先！"





贝蒂娜给妈妈买了脸基尼，在马德里公园里展示中国时尚

号啕在里斯本街头

在那趟欧洲之旅里，我在马德里逛腻了，要乘车去邻国葡萄牙旅行。夜里，我告别贝蒂娜，准备坐地铁前往巴士站坐车。

此前，我的储蓄卡和信用卡在北非摩洛哥和西班牙都无法取现。数月以来，我一直尽量刷信用卡，车票也是在网上用信用卡订的，压根忘了检查身上还有多少现金。

走到地铁站后，我发现身上的现金不够买地铁票，而售票机又不接受我的信用卡。我只好走回地铁站门口，试探性地朝路人们问了一句："请问有谁可以给我2欧元吗？"没想到，路上好几位行人都纷纷解囊，最先把钱递到我眼前的是一位西班牙老太太，她见我马虎的样子，担心我记错票价，怕2欧元不够，给了我3欧元。我连连拥抱她作为最真诚的感谢。



从里斯本塔看城区

再次走到站台去购票。我先取出1欧元硬币，想留作幸运币随身携带，没想到就在我把它往裤袋里塞时，它摔落地面。我眼睁睁看着它立着一路滚到墙边的下水道里。

我哀叹一声，取出那仅存的2欧元硬币，塞进购票机里，而显示屏却毫无变动。我来回按了几遍，确认是故障后，叫来了管理员。他道歉，说维修工已下班，要第二天才能退费。

我焦虑起来，说自己要去赶那趟开往葡萄牙的大巴。管理员安慰我说：“别怕。我再给你买一张就好了。”说着，他掏出硬币，换了台售票机给我买到了票。

谢过经理后，我总算是坐上地铁，赶上了那趟大巴。

葡萄牙实在太美。从波多到里斯本，我没有止住过心里的惊叹。不仅风光，就连葡萄牙的食物和佳酿，都叫人记忆深刻。

第二日，我从网上搜寻信息，惊喜地发现附近有一家自动柜员机接受我的国内储蓄卡，便前去取现。

时隔两个月，第一次有机会取现，我当然取了一大把钱，以备日后的不时之需。

取钱后，我登上里斯本塔，远眺城区，大小高低各异的砖瓦屋顶十分可爱。

以往我旅行，都会把现金分开藏好，万一被偷被抢，还有现钞可用。然而那天风光太美，我的心思一时不在钱上，把现金都放在了随身包的钱包里。

从里斯本塔下来后，见到几只流浪狗。我去买了火腿肠和面包，在街边喂起狗来。而我的随身包，就被我大大咧咧地挎在身后。

忽然感觉随身包被触碰，我转头去看，没有人影，而包已被打开。赶忙去摸钱包，竟然不在了，整个包里只剩下护照，现金、银行卡和其他证件随钱包全数被偷走。

我沿原路去找，心中祈祷钱包只是掉落在街头。而我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坐车回马德里，眼下自己连回旅馆拿背包的车费都没有。一路都没有线索，我越想越急，站在街头大哭起来。

围着安慰我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其中就有两位服装店的店员。这两位店员，我先前是见过面的，我进店里没有购物，但同他俩问了好。

女店员不断安慰我，并建议我去报警。

见我只知道哭，她说：“我和老公陪你去警察局吧。”说着，她转身去把店铺的闸门拉上。我这才知道，这对夫妻是服装店的主人。

我随他们到了警察局。

眼前的警察除了张嘴问话，一动不动，既不去找线索，也不去查看街头监控。想着索回钱财无望，我又哭了起来。

警察看着我，拍了拍桌子：“别哭了，有什么好激动的，不就是钱的问题嘛。”

我哭得更惨了，几乎哀号地喊着：“问题是我没钱啊！”

突然想起什么，我忙问警察，能否把手机借给我，让我打电话给银行停掉我的信用卡，而电话费我可以回国后通过国际汇款还给他。

警察反问我：“你下一站去哪里？把地址给我，三天内我会把钱包证件寄给你。”

我一听，破涕为笑：“怎么寄？”

对方说：“你放心吧，我对这些窃贼的手段清楚得很。他们只偷你的现金，对于你的证件和信用卡，他们会随手扔在附近的垃圾桶里。今天你要赶车回马德里，来不及等我们搜索，我们会尽量搜寻附近的垃圾桶，你的卡很快就会回到你手上。”

这么听下来，结局似乎也不太惨，我还是坚持向他借电话，他嘱咐我先回旅馆，收拾好行李后再回警察局签口供文件。

我不解：“签那些文件有什么用？”

“可以向你的保险公司索赔。”他说。

我又是一声哀号："旅途比预期的长，我的旅行保险昨天刚刚到期！"

他毫不在乎，只是不耐烦地看着我，催服装店夫妻把我带走。

这对善心夫妻载我回旅馆，一路上安慰我，说人平安无事就好，钱财丢了都是小事。妻子还不断对我说，要把我的经历告诉给她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儿听，让她知道世间险恶。末了，她转头问我："这是你第一次出门旅行吧？下次可千万别这么大意了。"

我平日里挂在嘴边吹嘘的多国游踪，此刻根本不敢如实告知，怕她笑话。

回旅舍收拾好东西后，夫妻又把我载至警察局。

这时，我想起国际信用卡都有免费的挂失电话，便用手机查到了该号码，态度强硬地提出要借用警察局里的座机电话。

警察这回拒绝不过，便把电话推到我面前。

电话接通，核实身份后，接线员告诉我："小姐，您的信用卡刚才被刷了好几笔，购买了多样物品。"

我紧捏拳头："告诉我最贵的！"

"一只劳力士手表。"

我又"哇"的一声哭出来，看得身旁的夫妻俩焦虑不已。

那警察依然纹丝不动，淡淡地说："放心吧，你跟银行提出申诉，到最后银行都不会让你付款的，毕竟你不是刷卡人。"

过去一小时里的种种迹象，让我不得不怀疑起眼前的警察是窃贼的同谋，而他嘱我回旅舍收拾行李，或许是给窃贼购物拖延出足够的时间。一切争论都不具意义，我不再理会这个警察。

签了文件后，我上了服装店夫妻的车。

这对夫妻对我十分关切，途中担心我赶不上巴士，还一直致电巴士公司，向对方解释我的情况，直至对方答应会等到我才发车。

车站售票处乱糟糟的，问了才知道，原来今晚里斯本飞马德里的所有航班都忽然被取消，许多要从马德里赶搭国际联程航班的人，都急得四处找车去马德里。被告知车票早已售罄后，那些从机场赶来的人们，沮丧地瘫坐下来。我上前去安慰，告诉他们，我被偷得身无分文还搭上了手表等贵重物品的债，可是只要人安然无事，就是莫大欣慰了。他们听了，居然笑起来。

这时，夫妻俩走过来，丈夫把一袋面包和一瓶饮料递到我眼前，温柔地笑：“你不是身无分文。”说着，一旁的妻子把50欧元放到我手上。我忙说，回到马德里后，只需几欧元就可搭乘地铁回到我朋友贝蒂娜的家，50欧元实在太多，夫妻俩便给我塞了20欧元。

夫妻俩离开后，几位准备上车的乘客都来安慰我，甚至有两位祖籍浙江的阿姨，把手机给我，让我打越洋电话给父母报平安。上了大巴后，这两位阿姨还时不时走过来，给我递上她们蒸好的包子。她们说自己移居西班牙多年，这回是来葡萄牙旅行，还说自己是佛教徒，遇上我，是佛祖给她们行善积德的机会。

我自诩是个遇事不慌的人，在那天里的喜怒哀乐却是显现得大起大落。长久以来，我在路上都没有丢失过钱财，但因为相信概率学，所以我总认为自己对旅途中的失财有心理准备，却没料到无妄之灾真正到来时，我却不能平静下来，沉着以对。那一天，路人们安慰我的

语句里说得最多的便是“人平安就好”，这句话日后也常常被我用来自我慰藉。

坏的经历，都成了好的茶余故事。回望这场匆匆的旅行，若说还有意外收获，便是那对善意的夫妻吧。他们的名片我仍珍藏着，期待未来的一天，我可以带着中国特产前去探望。

巴黎铁塔下的爱与离别

华裔好友从心和法国男友丹维尔恋爱了7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知道我在欧洲，便让我去巴黎充当一回业余摄影师，给他们拍婚纱照。

从机场出来后，竟就困在了地铁站里——因有人卧轨自杀，地铁停运两个小时。在等待的慵闲里，我坐到角落去窥视万象，看各色人等匆忙穿梭，看铁轨上四窜的硕大老鼠，还有挂着伪造工作牌的骗子在四处游说外国游客从他们那里购买车票，理由是“售票机坏了”。这不是文人笔下的巴黎，没有转角烘焙店漫出的甜香，没有穿着开司米大衣在临街咖啡店啜饮的妙龄女子。这是真实的巴黎，小青年紧贴着乘客进入闸门，逃掉了几欧元的车票，而那些因地铁延误而滞留站内的乘客们互相埋怨着。地底下的这层空间里人声鼎沸，热气蒸腾。

地铁复工后，我乘车抵达了巴黎市区。那时丹维尔正在法国南部探望生病的外婆，于是从心让我先给她拍个人婚纱照。

我和从心备了足足一个行李箱的衣物和饰品，沿街找拍摄背景。后来，从心嫌换衣服麻烦，干脆穿着婚纱绕街过巷，路上行人无一不侧目，冲她点点头、眨眨眼，送上一份祝福。

在巴黎铁塔下，我和从心正拍照，两名女警走了过来，让我们提供商业拍摄许可。从心一再解释自己的确是新娘子，女警却说：“你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拍杂志照片，就得申请商业拍摄许可，否则赶紧滚蛋。”说着凶巴巴地叉起腰。

我们灰溜溜地离开后，忽遇一场大雨。方才还蓝得发亮的天，刹那间就乌云团聚，好像有人在天庭用盆乘着水，哗啦啦地往大地上泼。

而在这灰黑的雨幕里，巴黎的美忽就显现了出来。地面积水载了浓墨重彩的建筑倒影，才要看清轮廓，又叫雨滴搅散。雨帘中的城区显得烟波迷离，唯独橘黄的路灯氲氤般弥散。大雨如瓢泼，一对青年情侣干脆脱了鞋，光着脚丫子踏进水坑里，一只手拎着鞋子，另一只手还不忘牵着彼此。

那几天的巴黎并不受宠，天气无常。我和从心跑遍了巴黎市里的几个区，看完了塞纳河的游船、卢浮宫的日落，还有日晒雨淋下的巴黎铁塔后，丹维尔总算回到了巴黎。

巴黎人有傲气，行旅他国，自我介绍时，断不会说自己是法国人，而是会气定神闲地说出一句"我来自巴黎。"丹维尔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却暂且没展露出这份优越感。

他俩规划着婚后要回到从心的家乡开一家法国餐厅，因为从心的家人都希望她能回到身边来。从心和我都是湛江人，我们这个城市人口数量虽惊人，国际化进程却同生活节奏一般慢，居民进了新开的西餐厅，都要点上一客咸鱼鸡粒炒饭，至于开一家正宗的法国餐厅，被接受程度不言而喻。

我探问丹维尔，去一处陌生的国度，到一座几乎没有外国人的小城扎根生活，心底真的乐意吗？他说："对我而言，中法之间没有界线。她居之所，便是吾乡。"说完，把从心一把揽过，轻吻她的脸颊，恩爱流露得自然纯粹。

7年共处不是短的时日，尽管没领取那一纸之证，但两人已是夫妻间的相处模式。在我收拾行囊时，丹维尔会窝在沙发里搂着从心，两

人静静地看我，不时对视一笑。

一晚我们在巴黎铁塔下拍摄，毫无征兆地，上空放出璀璨烟火。幼童时期的我最怕看烟火，总觉得灿烂只是一时，待音乐和舞步骤停，人群散去，炮声已缈，只有头顶的烟花碎片和余下的一片清冷最是真实，见大人离场，以为自己被抛弃，必定大哭。长大后才开释一些，知道独自看烟火也不是那般凄凉。转头去看他俩，从心已把头埋进丹维尔的怀里，烟花在他俩的眸子里大朵地绽放，晶蓝和深棕交相辉映。

后来我突然因故要缩短行程，希望在回国前到法国南部探望老友洛尔和亚利斯，便告别了从心和丹维尔。

启程前一天，我和洛尔在网上闲聊，她问我："你还记得我和亚利斯都是素食者吗？"

我一看，吓得话都没回，猛地一把合上电脑。洛尔和亚利斯是纯素食者，连蛋奶都不碰，也不喜欢宾客在自己面前吃肉。那天从心出门工作去了，我抓起钥匙就冲向地铁站，坐了一小时的车，到了美丽城的唐人街，连吃了几家餐馆，猪肉牛肉鸡肉和甜品都点足了分量。粤菜馆子里吊着的叉烧，上了盘才发现肉柴酱稀，但想到接下来的日子都要吃素，我还是和着饭吞了下去，饭后又喝了广式糖水，这才心甘地前往洛尔的家。



巴黎铁塔

洛尔在网上给我找了拼车，价格比火车要便宜30欧元，让我第二天一早去城区的东边与车主会和。

从心的家在西边，于是我翌日一早抵达地铁站，要坐车去城东会车主。结果等了近40分钟仍不见地铁前来，问了车站职员，才被告知“有人跳轨自杀，致使列车停驶”。我只好花了80欧元的车资，坐出租车去城东。当然可以临时爽约，但怕人家自此再不相信亚洲人的承诺了。

途中有暴雨，车程比预计得还要长。到了小城瓦隆后，远远看到寒风中的洛尔正把帽衫拉至下颚处御寒。见到我，她扔下背包跑过来，一把抱住我。

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丝毫没有生分，而她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模样，瘦高，不施妆，衣着质朴。

我们是在印度沙发主阿奴家认识的。凌晨5点，她进门时，睡在阿奴客厅的我腾地坐起身，舞着手臂跟她打招呼。她回忆说，打扰我睡觉本很愧疚，没想到我这么热情，于是她转身放下背包，想同我聊聊天，没想才一瞬，再转过身去，我已睡得不省人事。

洛尔真诚直接，喜恶都坦白说出，待人更是热情，不是假惺惺的礼分。那段日子里，我、她、阿奴还有阿奴叫来的印度沙发主们，每晚都开车去孟买海边游车河㊟吹夜风，聊聊茫然的未来，教彼此唱自己国家的歌曲，压根忘了自己的游客身份，也不再照着地图索引去探寻一处又一处的旅游胜地，只想一大帮人嬉笑打闹黏在一块。

那次在印度分别时，她送我一条手工编织的紫色手绳，告诉我那象征着我俩之间的友谊，也把另一条手绳系在自己的手上，“这象征着你，Carrie”，一脸的真诚。

那条手绳，我戴着去了许多地方，秋冬春夏都经历过，艳紫早已被洗得褪尽，终究是磨得太破，被取了下来。再见她时，她手上那条象征着我的绳子也已不在，我偷偷地笑，好不默契。

洛尔和亚利斯换着法子给我做素菜吃，夜里睡前总要叮嘱我不要吃她家的猫和兔子，还要解释道：“它们只是看着肉多，其实都是毛发，除去毛发就剩骨头了。”最后总以我拍桌子抗议中国人不是什么都吃而告终。

一周后，我告别，洛尔和亚利斯坚持要开车送我到90公里以外的机场，连背囊都不许我提，两人轮番帮着背。上了飞机后，我才翻出背包里洛尔偷偷放的信和她缝的手工布袋子。而她在临别时塞进我手里的，则是亚利斯一早起来烤的松软蛋糕。



巴黎卢浮宫



巴黎爱桥，附近只有简易的小锁出售，但桥上很多爱情锁制作精良，想必是情侣费心思做足准备，千里迢迢来锁住一颗心，真不容易



洛尔和亚利斯与他们的猫和兔子

这是我最期待的友情状态：不是时时联络，不必凡事告知，但再见面时的话匣子是几天几夜都合不上的；没有拘束，麻烦了彼此也不觉有负担，他们的家就像是我的家，告别时也没有离愁别绪，只期待下次再会。

回国后一个月，想起从心和丹维尔的婚事，我忙去问日期是否已拟定，换来的答复，却叫我吃惊。

从心说：“我们分手了。”没有哭的表情，没有哀怨的语气，淡得好像不是真的。

这才知道，从心无意间错登了丹维尔的社交账号，发现他私下联络一位法国女孩，言辞露骨。丹维尔认错哀求，从心却是下了决心要分开。从心说自己很清楚这不过是导火线，真正分开的原因是两人之间太过熟悉，几乎没了恋人间的激情。

两年过去，再聊起丹维尔，从心只说：“现在恋爱开心就好，哪还会一时头脑热乎就喊着要结婚。”她一点都不恨他，反而感激他这么多年的照料，他一直是她口中的“好男人”。

爱情流逝，却赋予从心智慧。她清楚爱情的美丽不在于永恒，不在于结局完满，而在于追逐的过程。一味追求快乐的结局，显得肤浅平庸。

那些彼此间爱过的痕迹，像是埃菲尔铁塔下的那片春意盎然的油绿草地，像是那晚擦亮天际的灿然烟火。四季更迭，草坪长了又枯，游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总有人记得那片绿草茵茵，也有人心头记着那些烟花带来的回忆。

爱过了，便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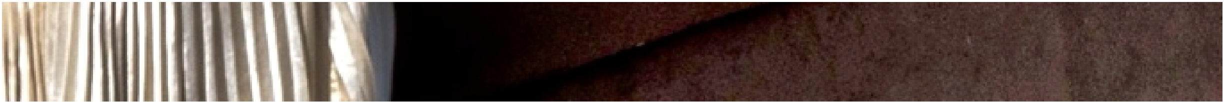
---

1. 游车河：粤语白话，开车兜风看风景的意思。

CHAPTER 9 迷失哈瓦那

古巴





车轮上的爱恨

是在车轮上爱上哈瓦那的。

航班降落在哈瓦那机场那刻，机上乘客齐齐鼓掌。上次在飞机上遇到这样的集体鼓掌，还是数年前飞抵俄罗斯时。极寒的东欧国家与极热的中美国家，就这样不约而同。

走出机场，热浪袭来，却又有风。选了辆粉红色的出租车，坐在副驾观察这个新奇的国度。

远处是低得几乎压到楼顶的大团乌云，一场大雨是否会倾下成了谜。这种潮热，像是家乡广东天气的复刻，正是我熟悉又喜欢的。向来痛恨寒冷天气，就算晒得脱皮，也宁可选择烈日炎夏。

车子自然是上了年纪的老爷车。



满城的老爷车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获胜后，美国禁运政策规定美国汽车厂停止向古巴出口汽车和配件；当时古巴政府又规定个人买车只能选择1959年之前生产的车子，加上数十年的被封锁和自我封闭，造就了哈瓦那满城老爷车的独特景观。

粉出租虽老旧，开起来却不输新车。飞驰上路，闷热的车舱里就这样灌进了大把的风。

抬头看天，亮蓝蓝的一片，又看云，大团大团的煞是好看。车外那些暖色的老楼，把西班牙式的迷人风情都装入了后视镜里。身边司机见我疲态，也不来打扰。

风是我想要的，人是和颜悦色的，街头身材傲人的黑人姑娘是让人惊羡的，连空气中的温度和这场酝酿着的将落未落的大雨都显得那么恰如其分。这趟旅行宁静愉悦得好似在那刻就定下了基调。

按照网上搜到的旅馆地址一路开去，问了好几个路人，仍是寻不到。司机心善，坚持以谈好的价格继续前驶找寻。眼看越找越偏僻，我也不愿意在这样位置不便的地方落脚，便改了心意，让司机开去市中心找住处。

找了一家当地的民宿。1997年，古巴政府开始在政策上允许民众将自家空房出租给游客，以收取租金的方式增加收入。而在当时，饭店、露营地、汽车旅馆等住宿都属国营，只有这种称为卡萨（Casa）的民宿是由私人运营的。屋主每月都要给政府缴费才能继续合法持有民宿的经营执照，每个月赚来的租金也要与政府分成，真正返到屋主手上的利润并不多，因此有的民宿选择在淡季不营业。

多付司机些车资，司机连连感谢。

独特的车子和体贴的司机，叫我生了欢喜。却不承想，接下来的旅程里厌恶起古巴，也是在车轮之上。

办好入住后，被门口人力车夫叫住，问从哪国来。这种问句，最是叫我矛盾：答吧，对方便一路聊下去，没完没了；不答吧，又让人觉得冷漠无礼。“中国。”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西班牙语词汇已蹦出了口。

车夫闻言，果然打听起我在哈瓦那的游览计划，又说由他带着游览，一小时只收5红比。

我说不用，他却仍坚持。而我始终学不会冷漠转身，只好上了他的车。

他明显在偷懒。只是平地，却踩得极慢。同样的人力车，过了一辆又一辆。想着他讨生活不易，我不出声。

见到认识的车夫，他更是停下打招呼，大声说："我搭了个中国女孩！"对方对着我吹口哨，喊着"China Linda"，我只好别转脸去，不看他们。

距离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路程极短，我们却花了半小时才到达。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及修道院始建于1580到1591年，在18世纪中期重新修缮，带有一栋36米高的钟楼，属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教堂地下室建有墓地，根据身份不同，贵族靠近祭坛，而受洗礼的黑人靠近门边。修道院现成为宗教艺术博物馆，定期展出各种与古巴有关的宗教文物。

我才在修道院转了半圈，车夫已走向人力车，一副促我离开的表情。仍顾及他挣钱艰辛，我压住愠恼。

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起一家餐馆，称食物美味，歌舞表演精彩，我看过一定会大叫喜欢。



说着，他便把车子停在了这家餐馆门口，领我去看。还没到用餐时间，餐馆内不见食客身影。他走向吧台，指着我对服务生说：“这位小姐想订今晚的座，你来告诉她怎样交钱预订。”

连服务生都看不过眼，对我说现在非用餐时段。

他不气馁，才骑了半条街的路程，又把我拉到另一家餐馆，用同样的招数，叫服务生帮我预订。我拒绝后，他领我下楼，说有一处游览胜地，游客都爱去。

去到那一看，又是餐馆。我对他说，如果再领我去餐馆，我便不坐他的车了。

终于不再游览餐馆，而换成纪念品店。去的当然是相熟的店家，他驾轻就熟地和店主打了个招呼，便叉着腰在门口等我。我不知哪来

的好脾气，也没发火，进店里转了一圈，装出失望的模样：“没看上什么呢。”

拖拖拉拉地，总算转完了哈瓦那老区大部分有名的建筑，而车夫总是不等我转半圈就说要去下一站。这般走马观花，我只好在心里盘算着改日再来——得走着来，不再乘任何人的车子。

不愿再做他的乘客，便请他载我回住处，想走去海边看日落。

他倒是不担心我要下车，刻意踩得更慢。我看表，本想着只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耗了近一个半小时，可恶的是，都是半小时内可转完的路程。

哪追得及黄昏，这样的速度，待我到日落大道时，只看到最后一丝亮光消散在海平面。

车夫总是摆出善良人的姿态一路没头没尾地讲解，也是我一路不发火的原因。人家都没卸下羊皮，我又怎好意思咆哮。问他价格，他装作计算时间，脸不变色地答说两个半小时，12红比。

“5点到6点半，两个半小时？！”我恨他手段低劣。

“是的。5点到6点半，两个半小时。哦不，你是4点上的车。12红比。”他含糊圆场。

“我付你一个半小时的车钱，7块5红比。”我没零钱，懒得跟他纠缠，给他10红比。

他只找给我2红比，还摆出一副宽容的姿态，对我说：“8红比就8红比吧，小姐，没关系的，你乐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吧。在古巴，我们不在乎金钱。”

见天色全黑，我不愿冒险，速速下了车。

“小姐，再见！”

再也不见！我头都没回。

迷醉人心的莫吉托

慢行在日落大道，看路灯下坐在临海长堤的哈瓦那民众吹着海风聊天。热潮褪去的哈瓦那，温柔又带着凉意。和她的民众一样，这座城市有着太多不同面孔。

长堤边上有人不断冲我吹口哨，我只好往前走，不搭理。

“嘿，你好！”身边的西班牙语招呼声又起。

我装没听见，继续前行，对方不放弃，又问：“你今天好吗？”

我仍不理会。对方换了英语：“你是中国人吗？你好，中国。”

这下得停下步子了。我那该死的民族自尊。

一看是一对夫妻，便放了心，走过去笑说，是啊，我从中国来。丈夫的英语出奇地好，给我介绍起哈瓦那。

妻子不懂英语，我不愿冷落她，用仅会的简单西班牙语同她打招呼。她很开心，说自己是拉丁舞老师，周末休假，与丈夫出来吹海风。



哈瓦那的临海长堤



路边酒馆

妻子笑着看我，说有礼物要送我，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枚硬币，指着上面的格瓦拉头像对我说，这是多种币值里，唯一印有格瓦拉头像的硬币。

我感激，频频谢她。

“你喜欢古巴的莫吉托吗？”她满脸笑意，期待我的肯定回答。

“我……还没在古巴喝过。”莫吉托鸡尾酒是我所钟爱的，但为保安全，独自旅行时总是尽力避免酒精饮料。

她吃了一惊，说：“所有古巴人，还有在古巴的游人，都是从一杯莫吉托开始他们美好的一天的，你怎么可以不试呢？”夫妻俩指着对面的小酒馆，“那家酒馆很有口碑，你想在那里品尝第一杯古巴莫吉托吗？”

见夫妻俩面相善良，又赠我硬币，我不好拒绝。

他们没骗我，这家酒馆的莫吉托的确好喝。不同于其他国家在出品前敷衍地沉入几片薄荷叶，这家酒馆把揉碎的薄荷叶置于杯底，还创新地加了青瓜汁调味，少糖多冰，每一呷都清新沁凉。

与他们聊起古巴的免费医疗，丈夫的怒火平地而起，“免费医疗？那真是天大的笑话。看病费用是免了，但是如果你不去贿赂医生，他们便像对待狗一样对你，你甚至连狗都不如！”

见他激动，我转换话题，问他，作为古巴人，对互联网有没有好奇。

作为被互联网占据生活绝大空间的人，我很难判定利弊孰大。只敢肯定，它让人间交情更淡薄，所有曾被一只手细细书写出来的关切和问候，都被表情符号所替代。谁买了新物品，谁换了新男友，谁三

餐吃了什么，那些本蒙着神秘色彩的生活细节，那些我们不感兴趣的信息，如水一般泼向我们。

“互联网？”丈夫反问我，“难道中国可以用？”

“当然。”

“中国人可以自由搭乘飞机？自由出国旅游？”他继续问。

“当然。”

夫妻俩瞪大双眼，告诉我，在古巴，普通民众支付不起办护照的费用，更没有随意出国旅游的自由。妻子哀愁地说，自己在幼儿园教授拉丁舞，月收入不足百元人民币。尽管医疗和教育都免费，他们却觉生活很讽刺。

忽然，他们说：“谢谢你请我们喝莫吉托。”

谢谢？请？尽管我脑子塞满了问号，但也许这杯莫吉托是他们负担不起的消费，我便付了钱，准备离去。

夫妻俩却挽留我，邀请我到家中吃饭，“难道你不想品尝古巴传统菜肴吗？”我不乐意添麻烦，丈夫却立马接话，“只是简单的家常菜，来答谢你的莫吉托。”依旧那副满脸的真诚和笑意。我便随了去。

他们的家十分残破，墙皮处处剥落，霉味散发在潮热的空气里。住处虽破旧，却是古巴政府提供的，月租金只需几十元人民币。

沙发上坐着夫妻俩的儿子，20岁出头的模样。丈夫开起玩笑，说儿子帅气，读的是音乐系，才华横溢，让我考虑成为伴侣。

妻子套上围裙进了厨房，又转身，递来一张手写单子。

“这是？”我疑惑。

“在古巴，做客是需要携带礼物的。正好我们需要买些酒水，你去买吧，我让儿子陪着你，以免迷路。”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年轻傻气，本可翻脸走人，却一心念着人家下厨的恩情，愣是随着他们儿子去了店铺，按照单子一一买下。

单子上几乎列了能买到的每种酒类，我和他们儿子两个人四只手才拎得过来。

回到家中，发现菜已上桌：一碗米饭，一份煎蛋，一小碟冰箱取出的泛黄蔬菜。我扒了几口饭，说饱了，要离开。

丈夫叫住我：“明天有全国最大型的拉丁舞狂欢节，你要去看吗？”

问具体时间地点，丈夫答：“这个节日一年只举办一次，十分受欢迎，很难买到票。我明天一早就会去排队，你给我60美元，我给你买好票，在门口等你。”

千万别再踩进圈套了，我在内心冲自己吼着。

丈夫见兜售不成功，问我：“要回去了？难道你没有礼物要送给我们吗？”

妻子插话，“对呀，你有首饰吗？”说着，身子凑上前来。

我逃不过。妻子一路随我回民宿，要“礼物”。

我收拾了两件衣物，叠好了递给她。不说再见，头也不回。其实穷不可怕，怕的是丢失尊严。

日间在街头赏画时，我买下一副立体画，正面看是格瓦拉，左侧看是何塞·马蒂，而从右侧看去是卡斯特罗。因画得缘，结识了创作者鲁本和他的丹麦朋友瓦尔德玛。

坐在步行街的石凳上，在咸腥的海风里，我边捋着那些狂舞的乱发，边问鲁本对格瓦拉的看法。他却侧过脸去不看我，只说：“他是个英雄吧。”含糊得叫我好失望。

鲁本要守摊位，我便同瓦尔德玛去逛老城区。路上，瓦尔德玛提醒我：“你不该在公共场合问鲁本对格瓦拉的看法，那很敏感，鲁本也不敢诚实作答。”倒也是，而且那个问题提得毫无必要，因为鲁本的看法早已渗进了我买的那幅画里：画中人，是革命先驱，也是刽子手。

瓦尔德玛在丹麦是个服装商人。他说自己全靠看书籍和时尚杂志，了解各种品牌价值，养成独到眼光再去判断下一季流行趋势，亲自去法国选材质看款式谈价格，再进货到丹麦售卖。没有念过大学的瓦尔德玛在经商成功后，在丹麦公立大学免学费的优良福利体系下，选修了大学的法律系。满腹经纶的他，不仅对古巴革命有着清晰见解，还将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各国的革命历程向我一一细述。

这位和丹麦前国王同名的老头子，那时已是71岁的高龄，走路的速度也是慢极。他几乎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他用的是老式彩屏手机，点进相册需要半分钟才有反应。因此每次他兴致来了要给我看照片，我都得在古巴的烈日下暴晒5分钟，才能看到那些低像素的模糊照片。他同我说，几天前他在哈瓦那看牙医，“那牙医已经80岁了，而他诊所的设备居然用了70年，知道之后，我吓得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死活不让他掰开我的嘴。”说着，又在烈日下花了几分钟翻手机相册，给我看那些锈迹斑斑的补牙机器。

同瓦尔德玛走在古巴街头，我悄悄观察路上的古巴人。古巴人种构成丰富，总人口里占大比例的是白人，有三成是黑人，混血人种占两成，而亚洲人也占了近一成。这丰富的人口构成让古巴成为多元文化的熔炉，也让街头的色彩碰撞显得更为强烈。



鲁本（左）和瓦尔德玛在聊天





我买下的鲁本画作。后来我才知道，鲁本并非名不见经传，他的其他立体画作还被收进了古巴博物馆，部分画作以每5幅1000美元的价格在哈瓦那的国家饭店展出售卖。他说，在街边立摊售画是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

瓦尔德玛常住哥本哈根，40多年前起，他每年都到古巴旅行一次，每次都会在哈瓦那住上几个月。他这辈子，总共来过古巴40多回。

他说，年轻时来古巴是出于喜欢，而这份喜爱是第一次游览时便种下的，年老后再来古巴是出于习惯，不乐意再耗费精力去熟悉新的国度新的民俗。

“但我想，我是该换个地方度假了，这几十年来，我亲眼看着古巴人民淳朴的性格是如何被旅游业给带坏的，现在你看到的古巴已经不再是我最初看到的古巴了，我厌倦了。”就在瓦尔德玛说这番话时，我身后的黑人姑娘们向我吹起嘲弄的口哨，她们操着法语笑我是妓女，说我连老年客户都不放过，气得瓦尔德玛踉跄地追着她们骂。

我离开古巴的前一天，瓦尔德玛想同我话别。我忙着收拾行囊，没空出门，便把我住的卡萨的地址发给他，请他来我这里。

见到瓦尔德玛入门后，卡萨的女主人变了脸色。我一再同她解释，瓦尔德玛是我的普通朋友，视我如孙女，我更是尊重瓦尔德玛的渊博学问，却也挡不住她猜忌和轻视的眼神。

我瘫坐在客房的椅子上，同瓦尔德玛说道：“这个房间古怪得很，夜里很难入睡，我都没同她抱怨，她反而给我看起脸色来了。”瓦尔德玛倒是不去抓重点：“古怪？说来听听。”

我告诉他，入住的第一夜，我很早便上了床。毫无困意，闭上眼睛，竟看见一个棕铜肤色的南美面孔的男人冲我张牙舞爪。我吓得立马睁开眼睛，环顾房间四周找鬼魂，见什么都没有，以为自己因疲惫

而多心，便又闭上眼睛。这回，我看见一个女人把一双留着长指甲的手穿过墙壁伸出来，指尖淌着血，蟹钳一般地张合。因为女屋主就在隔壁屋，我倒是不怕，只讨厌“他们”扰我入睡，于是我睁着眼祷告，先是画十字求基督教的耶稣，然后呼唤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又在心里拜了弥勒佛。想着这下总可安心了，才又闭上眼睛。可这次，我竟然看到一群人推着自行车，男性居多，也有年轻女孩，他们先是站在原地冲着我笑，忽地就把头颈拉长伸到我面前，脸孔张大扭曲，对我嬉笑着。其时已是半夜，我不忍心打扰女屋主，只好时而睁眼时而闭眼撑到了凌晨时分，把狠话通通骂了一轮，终于累得意志模糊地昏睡过去。“他们”似乎只是逗我玩而已，因为夜里无梦，“他们”没再来打扰。

瓦尔德玛说，哈瓦那都是老楼甚至危楼，“说不准这栋楼已经历经了几代人的出生和离世，墙里藏着很多‘朋友’呢。”说着，他扣起手指敲了敲墙，像同里面的朋友问好，骇得我毛骨悚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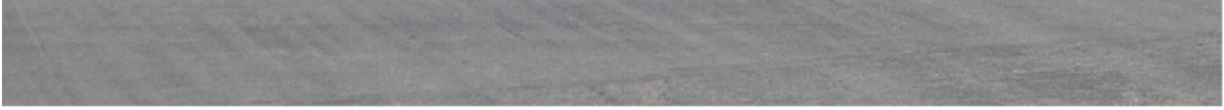
我赶忙换话题，问他对古巴人情风貌的看法，他说这几天与我同游所遭到的白眼，加深了他对古巴的成见，他不久后就要回丹麦了，“下一趟旅行，我要考虑更换目的地了，可能是印度孟买，也可能是越南的胡志明。”

他说这番话时，我已收拾好了行囊，在阳台吹着风，同哈瓦那作最后的道别。望眼过去，是哈瓦那市区港口的海边景貌，堤坝旁的人们又开始了他们对日落的等待。那里面，可能就有那对唤我去买酒的夫妇或者骗我车费的司机，在老地方揽着下一位淳朴的外国游客。迎面吹来的海风中弥漫着朗姆酒的气息和雪茄的甜香，吹得我慌神，已分不清那些过去日夜在古巴发生的故事里，哪些是真切的善意，哪些又是丑陋的谎言。

CHAPTER 10 一艘不航行的船

新西兰/阿根廷


ORTELIUS



登船这天，乌斯怀亚风和日丽，结果时隔不久，我们就被告知船坏了

38封邮件

清晨7点，我又醒来了。

近4个月来，对阿根廷签证的挂心，比闹钟还有效，在每个清晨的鸟鸣间唤醒我。那时的我，在新西兰旅居一年，便联系了阿根廷驻惠灵顿使馆办理签证，好让我从阿根廷乘船前往南极。

大使馆里的人，先是决然地用“即便旅居在新西兰，但你是中国人，应该回中国办签证”打发我，在我的坚持下，又展现出一周回一封邮件的南美工作效率，分别跟我催要英文陈述信、旅行计划书、行程安排表等文件。每次按照他们的要求，把文件发过去，欢喜地翘盼着，以为下一步就是被安排签证面试，却不想，一周后等来的，又是催要其他证明文件的邮件。为什么不在一封邮件里列齐所有需要的文件？别问了，阿根廷人爱在工作时间用思维度假。

第33封邮件发出后，我已然进入自寻烦恼的状态，满心牵挂签证进展。

嗷！我的南极！为了不去想你，我倒是乐意去做一只鸵鸟，把头插进沙堆里，你的冰雪极地世界塞不进我的沙缝，自此与我无关。

就在距离第一封邮件发出90多天后，在不知经历了多少个这样的清晨，距离南极船出发仅余一周的时候，我终于收到阿根廷领事助理克莉娜的回复：“我们接受你的申请。请于下个月来大使馆面试。”

我不可置信地大叫：“他们疯了吧，疯了吧！”

我的申请材料上写得清清楚楚，我需要在一周内抵达阿根廷，才赶得上那艘去南极的船，他们却叫我下个月再去面试。

这就是所谓的“南美效率”。要去南美的是我，不怨谁。这头刚咒骂完，那头马上假兮兮地回复邮件：

“我亲爱的、叫人敬重的克莉娜，实在感谢你给我面试机会！遗憾的是，我的计划是下周从阿根廷前往南极，请问您可否给我安排尽早的面试，让我有机会于下周出现在阿根廷？”

第二天，克莉娜的邮件悄悄出现在我的信箱，告诉我已把面试安排在一天后。

按约定时间来到大使馆。一位南美姑娘从接待处出来。“Carrie你好，我是克莉娜。”

我报以感激的笑——3个多月来，使馆里只有克莉娜回复我的邮件，其他人不是叫我回中国办理签证，就是用半句话打发我。我的好克莉娜啊，签证官何德何能，把你这样的贤能助手留在身旁。

克莉娜让我再等一下，说签证官很快就会见我。一听是“她”，我稍有悦色，南美女性，在处理中国人的签证案例上，可能比男性少了一些政治敏感，稍好说话。

果然，见面时，签证官主动与我握手，感谢我从别的城市赶赴惠灵顿面试。签证官问了我许多问题，她似乎不满我把阿根廷当作去往南极的跳板，而不花时间去游览阿根廷的风光。我讪讪地探问：“如果你们可以给我多次往返签证，我会再回阿根廷旅行。”

她爽快地说：“当然可以呀！”说完看向克莉娜，让她去拿阿根廷地图。

签证官将阿根廷北部、南部、中部、东部和西部五张地图摆在我面前，细细地跟我介绍阿根廷的地理概况，并叮嘱我一定要去她的北部家乡看看。

末了，问我："你在惠灵顿停留几天？"

我慌张，知道这个问题关乎印签证的时间，便如实答："我只来参加这场面试，今晚就离开。"

签证官顿了顿："哦？看来需要今天出签证了。"又看向克莉娜，问她："你今天有空弄签证吗？"我的好克莉娜啊，这时毫不迟疑地欣然地点头："当然啊！只要是Carrie的忙，我一定帮。"

告别时，签证官递给我她的名片，嘱我在阿根廷拍了好的照片，一定要与她分享。我给克莉娜和签证官各送了一盒巧克力，感谢她们的善意。

签证官问我，为什么快要出发了才来申请签证。我笑了笑，没答复。

我可是三个半月前就开始跟您申请了呢！

毫无期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搭航班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要去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

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时，已是下午，而第二天飞往乌斯怀亚的航班是在凌晨。自然，是打算在机场睡一夜了。

不似上一站的新西兰，机场里设有供转机客人过夜的连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不仅没睡处，连淋浴间都没有。坐了一天多的航班，蓬头垢面，便去洗手间洗把脸。洗得小心翼翼，怕溅湿了洗手池外围。

不想这一洗竟遭了卫生间清洁工的白眼。她斜着眼睨视我，毫不友好。我忙道歉，她并不回应，看起来并不接受我的歉意。

我只好匆匆把洗手台擦拭干净，再道一声歉，退出卫生间。临走偷看她一眼，她的脸色并未转晴，我那一番擦拭，未免显得太卑贱。

阿根廷的首都人，怕是不好惹的。

衣物整理完妥，又取出书来阅读，这一读，便到凌晨。一看表，该办登机牌了。听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两个机场，为保险起见，我拿着手机里的电子机票，去问机场柜台职员，自己的航班是否在这个国际机场。

职员看了眼机票，不太耐烦，说是的，还加一句，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办登机牌呢。我望向办理登机牌的柜台，前方已排起了小长龙，怕耽误时间，办理登机牌宜早不宜迟。

等排到柜台前，办登机的工作人员一看，对我说：“你的飞机在另一个机场起飞，离这里有一小时车程。”我一听，急了，问有何交通可选择。她说，半夜三更的，哪有什么选择，搭出租车呗。

奔出门，选了眉目和善的司机，谈好价格，一路飞奔去另一机场。我心急如焚，没心情聊天，沉默了一路。

只见窗外的城市飞驰着变换面相，一会儿是全球大都市通通可见的摩登大厦，一会儿是屋顶被吹翻外墙也已剥落的老楼，该国的贫富差距，可见悬殊。

少女时期，读博尔赫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感情：

原以为这座城市是我的过去，

其实是我的未来、我的现时；

在欧洲度过的岁月均属虚幻，

我一直，包括将来都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

如今，我来到这座他生活的城里，历经了大喜大落，的确体会到他所写“人生岁月不哀戚，还有梦境与黎明”的意境。

司机知道我赶飞机，把油门踩得起劲，比预想中更早抵达国内机场。付完费，谢过他，下了车，准备自己取后车厢的行李。看过了几个首都人的脸色，想着这位司机也是收了钱不认人的脾性，便未寄望太多。不料他还下车帮我提行李，并祝我旅途顺利。

进了机场，目光落在自己的行李上，顿觉不妥：外套呢？跟了我5年的外套呢？！可惜的是，无论它是丢在机场还是落在出租车上，都没有时间去找回了。

那是件防风外套，价格早已记不清，只记得它跟着我走南闯北，不亚于一位忠实旅伴。心里难过，眼泪唰唰就下来了。机场过客来去，步履匆匆，用疲惫的余光打量我，若是知道我的泪为一件死物而淌落，必是要笑话。可谁又能断定死物无情？那件外套，见过我连续赶路搭夜车的憔悴模样，也在荒野大漠里给高烧的我带来过温暖，叫我如何轻松面对它的忽然丢失。

背负着深重自责去办理登机牌，目光呆滞地站在队伍里，随人群移动。终是到我，柜台男子却招招手，把我旁边队伍的阿根廷男子叫上前。我想，或许他比我先排队，先办理登机牌，也是应当。待他办完，我向柜台迈步，又被柜台男子摆手拒回，身后一位太太被他指点着先办登机牌。

虽不清楚状况，我已开始不悦，等那位太太办完，总该到我了吧，他却又把我身后的女孩叫到前台去。连女孩都不解，指指我，用西班牙语问："你怎不让她办？"

柜台男子草稿也不打，张嘴就答："她的航班是最晚那班。"

我明明要搭最早那趟航班，便走向柜台，"你让我等了又等，一句没问我是哪趟航班的，却能未卜先知，知道我搭最晚的航班？这就是你的服务态度？"他不搭理我，还是坚持给那个女孩办登机牌，女孩却正气凛然，让他先帮我办。

他看看我的电子登机牌，发现我要搭的确实是那趟最早的凌晨航班，眼看就要开放登机，只好极不情愿地点头，帮我办理。

无端被不公对待，叫我迷惑。办好登机牌后，我去航空公司柜台要了一张意见反馈表，誓要吐出这番苦水。想起爸爸常叮咛"一样米养百样人，放宽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稍作犹豫，还是决心继续填反馈表。我不知道，是否自己的亚洲面孔，让他如此歧视和嚣张，如果

是，那么我的忍气吞声，是否会让以后的同胞再次步入我的窘境？这么想来，笔下唰唰唰，写满了反馈表，管航空公司看不看，这番怒气咽不下。

折腾一夜，总算登机。飞机庞然，驶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面，如一只大鸟冲入云霄。空中看布市，异常璀璨，连坐在一旁的本地太太，都急急把脸凑向我这一侧的机舱窗户，嘴中喃喃"太美太美"。

的确美，可谁的眼神又够犀利，看到那灿然灯光照不到的大片贫民窟，又有谁体会过这座大都市里时刻发生着的冷漠和不公。

拉博卡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贫民区，由于房子色彩缤纷，近年来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前往，几乎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游地标。

200年前，阿根廷打败宗主国西班牙，成为独立国。新生的阿根廷政府当时定下国策，要参照北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将阿根廷建成南美最发达的国家，且在欧洲大肆宣传该政策，以招徕移民人才建设国家，并承诺给他们提供土地、住房和工作机会。然而，在当时真正被吸引到阿根廷的，多是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欧国家的穷人。

面对这些坐船大批涌入阿根廷的穷人，政府很快就宣布取消当初承诺过的土地、住房、工作等优惠政策。新移民急需生存，于是他们开始在下船的码头做起了搬运工和修船工，并用船厂废弃的、造船用的边角铁皮搭起了一间间的简易房。房子搭好后，他们发现根本支付不起刷墙的油漆，因此当时船厂用剩的油漆就成了他们的装修材料。这罐油漆用完了，就随手再拿一罐，对颜色根本没有要求，这便有了后来五彩缤纷的拉博卡建筑群。

游客们在拉博卡区享受着南美咖啡，观赏着当地人跳热情的探戈，但很少人去探知拉博卡区彩色房子背后的故事。

虽说拉博卡区曾诞生过马拉多纳这样的球王，但球王的际遇和传奇，并不时常上演。贫民区里的居民，上进的多去从事了旅游行业，期冀在这前景无限的市场里分一杯羹；不上进的，则拿着政府每月发放的救济金，去买酒和毒品。

只要游客稍微往拉博卡深处走，就会发现五彩斑斓的外围里，是蜷缩在露天椅子上的流浪汉，和等待着交易对象的毒贩，甚至还有人在物色抢劫目标，而他的口袋里，很有可能装着一把枪——蓬勃的旅游业，与这危险的贫民社区形成了讽刺的对比。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金融区和贫民窟，分别装着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的上层人士堆金积玉，驾肥马披轻裘；另一个世界的底层人士，无檐遮头，布絮不蔽身。我兴许还会再来，但却失了期待。

最漫长的夜

已是在船上的第四夜了，浅眠醒来，再无法入睡。把枕头垫在身后，坐起看天花板，回想往事。不敢开灯看书，也不敢挪动，怕吵醒同舱的芮珍娜。

芮珍娜却自己醒了，蹑手蹑脚地下床去洗手间。我怕惊到她，尽量轻声地说："别怕吵到我，我没睡。"

她放心地点了点头，嘟囔了句"噢，你这个可怜的家伙"，知道我又在倒时差了。

在智利也游走了数日，不料到阿根廷才开始受时差折磨。整夜整夜睡不着，思维清晰，到了日间却像在梦游。

尤其今夜。

无法入眠，一来是受倒时差影响，分明是阿根廷的黑夜，我却度着新西兰第二日的黎明；二来，是心里装了太多期待——明天，我们的船就要驶向南极了，我和芮珍娜约好的南极冰泳，就要实现。

历经千苦万难，我终于来到阿根廷南端城市乌斯怀亚的码头，登上奥瑞里斯号。一进船舱，就看到一位亚洲模样的女子对着船舱接待处很着急地说着什么，看她说不清楚，我问是否需要帮忙。原来是同胞，她丢了手机，希望接待处帮忙寻找。我为她翻译后，又帮着找，快把接待处翻遍了都没结果。15分钟后，她转身进舱，没对我道半句谢。

我按照接待处给的舱号，找到了自己的船舱，一看，双人海景舱？可我明明付的是6人舱的最低价格呀。问了接待员，她大笑：“你运气好，我们给你升舱了。”6人舱与双人海景舱有着几万的差价，但在这充满奇迹的大洲，我也不去寻根问底了。

就这样，与芮珍娜成为了舱友。芮珍娜是法国人，约莫六七十岁。

打开衣柜，看到她挂起的一件青不青、白不白的连体滑雪服，我吓了一跳——谁会带这种又丑又怪的衣服来南极呀？她却很兴奋，取出滑雪服，放在身前比画：“我的大孙子说它太丑了，我偏要把它带来南极穿。我的朋友知道我带这么丑的衣服来南极，都觉得我疯了。”

也是，疯的人才会一心往南极去。

我当然不会那样说她，只夸她“你这么酷，自己到南极旅行，你的孙子们一定很崇拜你吧？”

“才不呢，”她有点不甘，“我的小孙子挺崇拜我，但我的大孙子觉得我就是个古怪的老家伙。哼，我只疼我的小孙子，至于我的大孙子，我才懒得去管他怎么看。人生短暂，我可不想花费时间讨好那些不喜欢我的人，尽管那是我的孙子。”

可就连特立独行的芮珍娜，在面对延迟发船的消息时，也是不知所措。

在我们相识的那个下午，彼此都已知悉，我们的航船无法按时出行——她在上船时，就被服务生告知了；而我日间在乌斯怀亚市中心的餐馆用餐时，碰巧遇到几位即将同船的游客，称自己收到船公司发出的电子邮件，通知“因船故障，我们无法在16号出发，改为17号出发”。我们还碰了酒杯，称彼此是患难之交。

倒时差的生理折磨，加上期待满溢的心理状态，那一晚成了我人生中屈指可数的最漫长夜晚之一。

夜静得出奇，芮珍娜呼吸声均匀，我则坐望圆形窗户外的乌斯怀亚。在鹅黄路灯的映照下，小镇像一幅欧洲油画。我幻想，同样是这扇小圆窗，再过一两天，就会框住南极水面的一座座冰山，环住那些古老幽深的冰晶蓝。

这么想着，在虚化了的朦胧夜色里，乌斯怀亚真的开始变幻，先是鹅黄光晕褪却，渐渐地，密集建筑群也远离，南极的冰川逐座显现，带着幽静透亮的蓝。

在这般漫漫的长夜里，因牵挂着那片古老的冰封大地，我无法入睡：一抬眼，便看到了心中那片纯净凛冽的极地，那些棉絮一样的雪片，哗哗地下。

可知自己的内心，有多么期待看到那些连绵在地球底端的雪山，和那些在万年前由极地河流冻结而成的深蓝冰川。而当真正相遇，会是激动地屏住呼吸，还是平静地内心欣喜，答案封在亘古的冰里。

我是都市的孩子，从来只在水泥森林中穿行，起身一抖，拍落的只有水泥灰。那种因亲近自然和泥土而产生的质朴感，向来不被我所拥有，更不会出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可在嗅多了满斥塑料气息的现代文明、触多了趋利浮躁的人心后，我开始向往未被染指的远方大地。

我只知道，在地球仪最底端，有这么一个冰雪世界，人类假想出来的轴心从它的表皮穿插而过。在那里，太阳有时日夜都不能跃出地平线，有时又整日整夜都无法退下地平线。那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似乎只有极地动物，在坚硬的白色褶皱上穿行；那又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与万里之外的人类有着妙然的相连。

人的心，是世上最深的口袋，装着随时往外倾泄的喧嚣，套了止不住的征服和窥探欲望，渴望去占有那些看似难以拥有的人和事。而我知道，我要远赴那冰雪崩落的世界，亲自踩上一脚，才会心安。哪来莫名的敬畏自然，我没有这般伟大。

芮珍娜似乎进入深度睡眠，呼吸声都低下去。我的头开始钝钝地痛，思维却异常清晰，在这漆黑的白昼里。

无法出航的船

一早，船上的喇叭召集全体乘客开会，大家都迅速赶往讲座室。经过接待处，我回头问服务生："是好消息吗？"她没表情，顿了顿："他们很快会让你知道的。"我很乐观，还笑她调皮，认定她藏着好消息不透露，免得少了那份惊喜。

根本不曾想到驾驶员会宣布航行取消。

女驾驶员克莉斯汀娜握着麦克风，用带着德国口音的英语，一字一顿地说："抱歉，船，修——不——好，我们的航行，被迫取——消——了。"英语里有句说法是"把石子朝他们砸得轻一点"，克莉斯汀娜此刻就是那个握着石子的人，她语速很慢，尽量把坏消息的打击程度降到最低。

谁都不躲，任她的石块砸。

我望向两边的乘客，他们一副反应不过来的表情。又转回来看克莉斯汀娜，等她笑场——谁知道呢，欧洲人这么爱开玩笑，谁知道这是不是一场恶作剧呢。我盯着她看了足足半分钟，她不语，默默承受越来越重的乘客目光，神情无奈。

难得的是，没有人掀桌起义。全船人的沉着冷静，让我感动。

克莉斯汀娜解释："船的锚坏了，尽管我们夜以继日地抓紧抢修，也大致修理了它，但今天船务处来视察的官员，还是说我们达不到航行的安全标准。"

我发现法国舱友芮珍娜没来参加会议，回房后见到她，她才说，自己比大多数乘客提前两个小时知道无法出发，因为她去过驾驶舱找克莉斯汀娜了解情况，被告知船锚无法修好。芮珍娜回忆：“克莉斯汀娜很自信地告诉我，没有船锚，她照样能驶抵南极，可是来视察的人不许她这么做。”

这么一听，我倒是受触动了，南极是要去，但不能冒死去。芮珍娜又说：“我感到很吃惊。要知道，这可是南美啊，遇到什么事，掏点钱就可以解决。船公司完全可以出钱让船务处的人点头，允许开船。他们却没这么做。”

或许因为船公司由荷兰人运营，还是按照西方的严谨模式，不会只看利益，罔顾乘客安危。

晴天霹雳已闪过去10分钟，会场却没有鼓噪，乘客们低声商量着解决方案。事发突然，为船公司担保的保险公司还未商榷好赔偿方案。而驾驶员克莉斯汀娜依然主持着大局，尽可能地解答乘客的疑惑。

一位乘客举手问：“如果我们等，坚持等上两三天，有开船的可能吗？”

克莉斯汀娜摇头：“短时间修理不好，近期航行全无可能。”

又有乘客问：“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克莉斯汀娜苦笑：“我在这艘船上工作了10年，只在7年前遇到过一次，但那次修好了。”我们这群倒霉的可怜虫。

“有别的船可供我们搭乘吗？”很多人问。

被告知近几天离开的船全部客满，如要预定，只能定其他船公司下个月出发的船，要交至少2000美元的差价，以及未必有舱位。

一位印度乘客颤着声音说：“我不辞万里，来到这里，是要赶赴一生的梦想之地。我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梦想就这样被轻易取消。”

在座所有乘客几乎都是自助行，都在此前比较过各公司的船票价格，不是腰缠万贯的人，都要为改签机票所花费的手续费而苦恼。南极之行花费不菲，我们还要不自量力地来，自然也是做着与这位印度乘客一样的梦。

南极洲，遥远得若不去拨弄地球仪，都会忘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块神奇的土地。无论从哪里出发，都至少要十几个小时的航行，多达几站的中转，飞越数个时区，带来昼夜不分的生理反应。然而这些都没能阻挡整船的乘客来到这里，于谁而言，这个消息不是一锤子敲在梦想上呢。

无尽的失落促我出船舱，到乌斯怀亚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晃荡。很多乘客还在船上等候选方案，我却已不抱希望。

初抵乌斯怀亚，风狂肆得让我错觉已到了南极：如此大的风，怎么没把这巴掌大的小城刮跑。已是夏日，我穿着朋友送我的美国科考站南极项目的工作大衣，却仍冷得发抖。

在外喝足了5个小时的风，吹得脸部麻木，我回到船舱。

经过船舱接待处，服务生叫住我，递来一张纸，告诉我这是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

“抱歉，由于船体故障，我们遗憾地取消此趟航行。我们提供以下补偿方案。方案一：您可以免费改定今年年底的19天南极航船；方案

二：您可以取消旅行，得到全额退款，以及高达500美元的机票补贴。”

我读完了，看看周围乘客，都皱着眉头。找了几位相识的旅客，问他们的决定，都说下个月没时间来坐船，而且都计划了别的旅途，改签机票以及改变行程的花费，远多于1500美元，实在不划算。我没反应过来，问：“你说下个月？他们下个月还有船？”他们答，当然啊。

我抓起纸张重读，才发现解决方案里还有一行小字：

“方案三：您可以免费改定2月份或者3月份出发的航船，得到您支付船价25%的退款，以及高达1500美元的机票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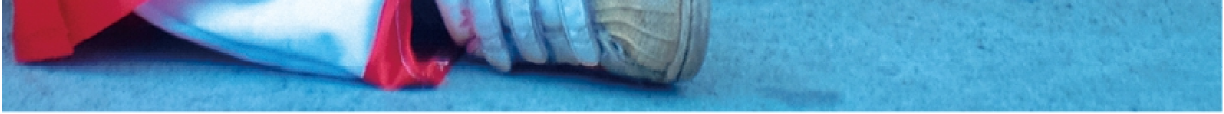
我大喜——我既没订机票，又没行程计划，这个方案，对我来说再好不过！想着又可以去南极了，还能拿回很大一部分船款，我失心疯一样地笑。

其他愁眉苦脸的乘客看了看我，恨不能把我踹下海，更低落了。

CHAPTER 11 走到世界的尽头

美国/墨西哥/阿根廷





乌斯怀亚狂欢节上的小男孩

美国不美

在船上免费住了几天，把接下来的中南美洲行程都粗略计划了一番后，我告别了那些同经患难的船友们，飞往美国。

从冷漠的美联航空姐，到波士顿机场粗鲁的地勤，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本以为轻松可过的海关，却像审犯人一样对待我：把我的护照翻了又翻，质问我："你为什么去中东旅行？"

我不解："中东和北美，难道还有高等和低等的差别吗？"他不接话，却突然瞪着我："你为什么有美国口音？是不是在美国留过学？"

"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我如实告之，努力让自己的态度诚恳友好。

"哼，放心，我的同事会查出你的留学记录。"说着，他指指一旁的空地，让我站过去，便不再理我。我压住情绪，等他的同事过来把我带走。

我被带往的地方，人称"小黑屋"，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设在机场的"接待室"。接待室的大堂不仅不黑，还宽敞明亮。在那里，我见到约有20人在等着"被接待"，这其中多是皮肤黝黑身形魁梧的人，看着像美洲土著，也像太平洋岛国的岛民。而另外小部分人，则是怀有身孕的黑人女子。我饶有兴趣，好想同他们交谈。

可还没等我开始细致观察，两名警官就把我带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今天过得好吗？”长官礼节性地问。

“好不好，显而易见。”我沉着脸。

“看你的护照，你不仅去了欧洲，还几乎把中东中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都走遍了，为什么？”他边问，边低头翻看我护照上的签证印章。

“旅行而已。”

“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等等这些中东国家，都是旅行，‘而已’？”他故意强调。

“是，都是旅行，而已。顺便纠正您，阿富汗属于中亚国家，而巴基斯坦属于南亚。”

果然是受过专业心理学训练的警官，他丝毫不觉难堪，继续问：“那里有何好看的？”

“人和文化。”差点说出口的，是“以及你们对人家的战争影响”。没胆，咽了下去。

“你在那些国家，有认识的人吗？”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想看到我心窝里去。

“去之前，一个都不认识；去之后，倒是结交了很多当地朋友。”话一出口，我立马就后悔了，怕他会问结交的朋友里是否有恐怖分子。

“你在中国的军队工作过吗？”他顿了顿，“又或者，在中东地区给任何国家和当地人提供过培训吗？”

我怀疑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瞪大眼睛看着他，“什么，培训？”

“是。培训，我指的是，是否在中东地区培训过当地人如何使用武器，比如说，枪支。”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连摇了好一会儿的头，“当然没有！我又不是黑寡妇。”答完才觉得姿态太高，便装出小孩模样，“再说，我爸妈要知道我在中东做培训，不打断我的腿才怪哩！”

“好。再问你，有没有在中东国家教过英语？”他问。

我笑得涨红了脸，“没有，长官，我权当你在夸我英语好了。”

他不放过这个话题，“你真的没有在美国念过书？坦诚作答，我们是可以查到全部出入境记录的，你的作答内容会成为日后的法庭证供。”

“不仅没有在美国留过学，连美国的土地，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踏上。我只接受过中国的教育，没有任何留学经验。”

“好。那这点，你总不否认了吧：你去过这么多国家，你的父母一定很富有！”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不，一开始的旅费来自于我的实习收入，后来的旅费，来自我的全职收入。”

“呵！”他冷笑一声，“3秒内回答我，你从智利的圣地亚哥，飞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票是多少钱？”

我记得清清楚楚，连小数点后的分毫都报给他。

他的同事与此同时在该航空公司的官网上搜票价，不一会儿，抬头给他个眼神，他转向我，“看来还真是自己付的款。”

“何止机票，去南极的船票、飞美国的机票，全部价格我都记得清楚。继续问我呀。”我真是初生牛犊，得了点认可就不怕死，挑战起边境官来。

这诸多蠢问题，一来一回地，耗费了我近一个小时。我渐渐甩掉了刚进小黑屋时的焦灼，松垮垮地靠在沙软的皮椅子上。

坐在办公椅上的长官，边记笔录，边问我：“最后一个问题。你说你要去南极，你在那里有没有朋友？”

我抿了抿嘴，忍住不笑，答道：“有，我有。”

终于听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他激动地抬起头来：“谁？！”

“一群小企鹅。”

出乎意料地，训练有素的长官竟笑了起来，告诉我，审查结束，我可以走了。

我没有马上离开，对他说：“你知道吗，在我的祖国，看多了好莱坞影片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个概念：‘美国梦’。对于我们来说，它象征着在美国大地上，人们敢于做梦、勇于追梦，而美国社会尊重自由、鼓励梦想、保护信仰。然而今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意识到美国人过高地评价了自己的国度，这里不仅没有做梦的氛围，还有着脱离不掉的顽固认知，以为人人都想入侵美国、留在美国。你们忘了，我们深爱自己的祖国，并不觊觎你们的土地。”

长官没有打断我，在我说完后，他向我道歉：“我们只是觉得一个年轻又好看的女孩，自己跑了多次中东中亚，看起来叫人好奇而已。”

“长官，即便你说我看起来像世界小姐，也无法抹去今天这番审问带给我的坏印象，你强调了‘中东中亚’，难道这一个小时的对话，仍

然没有让你感觉到，在我眼里国家和地区是没有高劣之分的，正如同在长官你的面前，我不为我的平民身份感到卑微，我们是平等的，国家也是。”

他站起身，推开了办公室的另一扇门，那扇门通往登机的快捷通道，“小姐，我很抱歉。来吧，我送你登机。”

排队入境，忽然见到一对同样进过小黑屋的黑人母女。我冲她们微笑，她们用胜利的眼神回望我，好像在说：

“噢，你也逃出生天了。”

温情的墨西哥

在美国旅行了二三十天后，我在加州的边境城市圣迭戈市区，叫住一辆人力车，前往美墨边境。边境管控非常松，一个步子，就跨进了墨西哥城市蒂华纳。

其实，无论是在荒凉的蒂华纳，游人如织的坎昆，还是在热闹非凡的墨西哥城，我都提心吊胆，甚至不敢带相机出门，就连手机都常放在裤袋里不敢拿出。之前听到过一些游客在墨西哥遭遇抢劫的故事，而墨西哥不低的犯罪率和严重的贩毒及暴力犯罪案件，也时刻扯着我的神经。

这样异常小心的旅途，让我少了很多乐趣。

有天，在蒂华纳的红灯区，我看到了姿色各异的站街女子。她们靠墙站立的姿态、打量过客的眼神，都透露着万种风情。我看着她们，指了指手机，询问可否拍照，她们摇头拒绝，我也不冒犯，便走了。

失落时，食物最安慰人。走进一家街头餐厅，点了两人分量的墨西哥菜，不听服务生的好意劝告，自是添了很多墨西哥辣椒，被辣得泪眼朦胧，叫服务生们看得捧腹大笑。

走出餐馆，只见对面一个流浪汉隔着马路凶戾地盯着我，还过马路朝我走来，伸手要钱。我摇头拒绝，流浪汉不饶，神情更凶了，步步逼近我。

突然，他踉跄地后退一大步，眼神惊恐地看向我身后。我转过头去，看见一位路过的健壮男子正狠狠地瞪着流浪汉，用西班牙语

说：“离她远点！”流浪汉仓皇离去。

我因为害怕，连感谢都忘了说，只给了男子一个感激的眼神，自顾地离开。走了半个街区，我回望男子，他仍站在原地，目送我离去的同时，不时望向另一头的流浪汉，直至确认流浪汉向反方向越走越远，他才安心转身。

那时，沿街店铺播放的西班牙语歌音量震天，我的心里却静悄悄地放入了一份陌生的暖意。

再后来，我飞往墨西哥城，要赶下一班前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再从布市转机去乌斯怀亚，搭乘改签后的邮轮前往南极。

不料第一班飞机晚点，抵达墨西哥城时，我的联航已飞走了，而当天飞往乌斯怀亚的航班只有一班，我是无法赶上同天出发的邮轮了。

当时，我身上根本没有墨西哥比索，只带了50美元现金，又是半夜，机场换钞店通通关了门。

机场没有免费网络，我无法给船公司打网络电话。我急出了泪，去找付费的公用电话。

刷了信用卡，拨了船公司的号码后，听筒却传来墨西哥接线员的声音：“小姐，你的信用卡被冻结了，拨号失败。”恐怕是由于我在不同地区多次刷了信用卡，警惕性高的国内银行做出的反应。

我灵机一动，走到了仍在营业的机场星巴克咖啡店，希望用网络电话联系船公司。

失落沮丧到极点的我，不耐烦地对星巴克小哥说：“一份小杯卡布奇诺。”

小哥满面笑意，问我：“热的冰的？”

我瞪他一眼：“随便。”

他又笑着问：“要三明治吗，我们新推出的口味值得一试。”

我朝他翻了个白眼：“不要。”

他不放弃，“需要杂果酸奶吗？”

我一忍再忍，即将爆发。

最后，小哥问：“卡布奇诺要多大分量？”

我拍了拍桌子，一口气说：“我说了我要小杯的卡布奇诺，小杯！我只是随便点杯喝的，因为需要用你店里的无线网络打个紧急电话！”

“嗞”的一下，小哥的嘴拉链般地合上，静静地敲击着下单机器。

付款时，我将银行卡一把甩过去。就在他接过卡的一瞬间，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卡被冻结了呀。

当然刷不了。他问我，有现金吗?

我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没有。”

“有其他卡吗？”他问。

我又摇头，“没有。”这次不仅没了点餐时的气焰，我还几乎是带着哭腔回答他。

只见他没有再问，把手伸进制服的裤带里，掏出自己的卡，帮我付了款，冲我笑了笑：“这杯算我的。”

泪立马不争气地涌了出来，所有对登船的焦虑都烟消云散——管他什么南极北极，去了我幸，不去我命。遇到善良的人、纯白的心，才是旅途的意义。

取咖啡时，给小哥递上了一张纸条，写上我的电子邮件地址，请他有机会一定到中国玩。

再后来，待我回国，收到了小哥的邮件，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家人坦诚出柜，向朋友们公开了自己的同性伴侣。还告诉我，那时他在机场星巴克打工，是想存一笔钱进入演艺行业做歌手，而如今，歌手还没做成，他却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演员。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他的善意帮助下，我输入付款小票上的随机密码，连上了无线网络，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并在朋友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定船票的旅行社，他们与船公司协商后，为我改订了第三艘船。

世界的尽头——乌斯怀亚

这回，再次抵达乌斯怀亚的我，再也不敢乱跑了，生怕错过第三艘船。

乌斯怀亚被称为“世界的尽头”，因此处是离南极洲最近的大陆。尽管有科学刊物曾指出，从精确地理位置来看，智利南部的合恩角才真正与南极隔海相望，是世界最南端的聚落，但这丝毫不影响大批游客前往乌斯怀亚，感受类似南极的风光地貌与极端气候，并带着本子前往乌斯怀亚邮局，傻傻地盖上那枚刻着“世界尽头”的印章。

乌斯怀亚很小，小得我已熟悉每间餐馆的招牌菜式和网络密码，小得每处街角都已然失去惊喜。而南美人对夜生活和疯狂派对的崇尚，也不是我所能融入的。多日蕴聚的孤独感，像一层垫厚的阴霾，始终挥拨不去。

偶尔，我会去远郊的灯塔，感受《春光乍泄》里，张震对着录音机说话的那番孤寂与无助。那部片子里，张震在灯塔下，对着录音机说：“1997年的1月，我终于来到了世界尽头，这里是美洲大陆南面的最后一个灯塔，再过去就是南极，突然之间我很想回家。”

就在我快将游览的耐性耗尽时，遇到了阿雅。

阿雅是我同旅馆的室友，她自己背了个大包，从日本出发，游了新西兰，去了加拿大打工，带着存下的钱来到南美洲。不懂西班牙语的她，在南美洲点个菜都困难。于是，已自诩熟门熟路的我，自告奋勇领她游乌斯怀亚。

带她看码头边的半沉船只，看夕阳悄悄隐匿在船身后背，勾出一圈橙黄的光，看海鸥围着船檐低飞。同一个太阳，在家乡落下，不叫人留恋，在异乡落下，却多了一份凋零的美态，惹得人不舍。

都是我看腻了的景象，她却惊喜地哇哇叫，露出典型的日式夸张。

陪伴阿雅，给我等待登船的无趣日子带来一丝乐子。虽然在她而言，这可能是相互作陪，或许她在经历长途独旅后，也一样的孤寂。

登船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一早睁眼，旅馆里认识数天的几位住客已在我床边站成一排，手脚笨拙地舞着，给我唱西班牙语生日歌，还夹杂着美国旅客的英语歌词。倒是走运，碰上那天是乌斯怀亚狂欢节，我们一伙人相约着去看街头的演出。

从舞台的搭建，到路旁的装饰布置，我每天都观察在眼里，对这场演出满是翘盼。演出是乌斯怀亚议会组织的，歌者舞者都是当地居民。

等候开场时，我留意到一旁的阿根廷五口之家。年轻的妈妈背着小女儿，膝旁有两个小男孩靠在一起，而爸爸也在一旁。小男孩都长得俊美，哥哥身着黑色披风，画了胡须，弟弟穿着球服，戴着假的爆炸头。不一会儿，弟弟不耐烦，问妈妈可否取下头套，妈妈不同意。

弟弟的模样好滑稽，我在一旁忍不住地笑。他见我笑，更委屈了，扯着妈妈的衣角，求她帮忙取下发套，妈妈仍摇头拒绝。他生气了，自己一把拽下发套。才过几分钟，妈妈又给他套上，还命令他不许再摘。

等待开演的间隙里，观众们四处觅寻着视野更好的位置，路上的人来来往往。这时，一位黑人母亲带着女儿从阿根廷家庭前走过。阿

根廷母亲伸手去拉了一把小女孩的爆炸头，见头发纹丝不动，便向对方母亲打听：“你女儿的发套质量太好了，是从哪家店买来的？”女孩的母亲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说：“这是她的真发！”我和路人们听了，疯了一般肆无忌惮地大笑，眼前戴发套的小男孩和爆炸头的小女孩苦着脸，就差哭出来。

喧嚣的音乐响彻开来，狂欢节正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年轻舞蹈演员们大部分跳得漫不经心，只有领舞的人才放了些许激情，狂欢节的“狂”不见踪迹。我转头去看身旁的观众，人并不算很多，顶多数百。相比印象中的巴西狂欢节，眼前这场演出规模小得可怜。

中段出场的小演员们散散落落，有套着马辔装置的孩童走着走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领队喊了好多声，他才起身继续摇摇摆摆地演出。

狂欢的氛围，居然是在老年演员出场时才彰显出来的。戴着厚重头套的老人们，尽了全力扭动着身子跟上伴奏的节拍。我看得感动，用劲鼓掌。他们这份态度是对演出的尊重，更是对人生的热爱。演出结束后，我跑向他们，像粉丝一样恳请着要合照，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演出是受到喜欢的。老人们好开心，揽过我的腰，用我的手机拍了之后，还要用自己的相机拍。他们笑着同我说：“我们年纪都大了，这样的场合，演一场少一场呢。”



不开心的弟弟



狂欢节上的兄弟俩



乌斯怀亚狂欢节



乌斯怀亚狂欢节



乌斯怀亚狂欢节

那天阴天，乌斯怀亚气温极低。但在演出结束后，演的人、看的人都舍不得离开，拿着罐压泡沫互喷着玩。我是游客里头一个中招的人，抢过身边背包客的彩喷，对着捣蛋的小朋友呼啦啦地一通反击。

同旅馆的伙伴们被小屁孩喷得浑身泡沫，然后一起湿漉漉地凑钱买生日蛋糕。

入夜后，旅馆里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关掉了大厅的灯，给我唱起了生日歌，歌声里夹杂着西班牙语、英语和我根本听不懂的语言。长住在旅馆的当地酒店大厨法昆都也给我买了一个蛋糕，一群调皮的人恨不得把唱生日歌的速度调到最快，好瓜分眼前的两个蛋糕。

这样的时刻，我深知不会再有。总是在路上，总是生活在他乡，不知前路有何人何种际遇，因此也更好奇命运。

蛋糕没一会儿就被瓜分完了，住客们如鸟儿四散。只有阿雅还在原地，淡淡地给我递上一条巧克力，说是礼物。那是我爱吃的牌子，只在无意中与她提起过，没想到她会放心上。



开心的小屁孩



和乌斯怀亚旅舍里的游客们在一起

登船那天终于到来了。那天一早，阿雅坚持要送我去码头，还固执地拎起我的背包。

去的是天气变化多端的极地，我带的物品不少，连防寒大衣都沉得吓人，更别说整个背包了。她小小的身躯抱着背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码头安检严格，为了防止外人混进游艇，没有票的人一律不让进。无法送我上船，阿雅显得很伤感。

我跟她告别，踏进船舱，看她还在远处呆呆地站着，手伸进铁围栏里，朝我挥着。

我也朝她挥手，心里想着，这份陌生的恩情，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报。

CHAPTER 12 我已出发

南极洲/智利/阿根廷/巴西


perception



船行，一路向南

曾在乌斯怀亚的中餐馆用过餐，无意间瞅见他们有中国国旗，既不扬起挂出，也不撇到一旁，只叠得整齐方正，置于收银前台，自有一份庄严的神圣感。

与服务生攀谈，得知国旗是中国游客所赠予。后来，在我登船之前，又去了一趟这家中餐馆，希望能借国旗，用来在南极拍照。

来自上海的女老板十分干练，语速过人。她听了来意，答得爽快，热情地问要借带杆子的还是不带杆子的。

我贪心，弱弱探问可否两面都借。她竟连连摆头，答不行，理由是“店里只有两面中国国旗，万一你忘了还，那可怎么办。”

把国旗递给我后，她转身在日历上画圈，标识出国旗归还日。看她在乎故土，把乡愁寄在一面旗子上，我心里又敬又喜，欢欣维持了大半天——多怕她会爽快地说不还也没关系。

于是我的背包里，就这样多了一面中国国旗。

登船后，好运的我依然被安排入住两人船舱。那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居然就是我登上的第一艘船——他们把它修好了！

感叹完命运的奇妙，我开始好奇谁会是我的舱友。

第一次登船时，我当时的舱友是法裔加拿大人芮珍娜。她的自我介绍是“虽然我70岁了，但我感觉自己像17岁”。在知道我准备去南极

游泳时，她毫不犹豫地接过了我递去的另一件泳衣，说要和我一起入水。

见过这么有趣的舱友，我自然对新船的舱友充满期待。只见舱友的床铺收拾整齐，却不见人影。我看了一眼背包上的行李牌，名字一栏，写着“金芭莉”。

20分钟后，全船的乘客在听到广播后，齐聚在会议室，等待点名。听到“金芭莉”时，我循着答声望去：我的舱友，看起来足有两米高。

这个纽约女人温和友善，她告诉我说，身高两米的她，是家里最矮的。她大学4年都为美国国家篮球队效力，也因此被免了4年的学费。

金不是典型的美国人，或者说，不是我印象中典型的美国人。我的美国友人们不大旅行，总觉得要先成为富翁才能旅行，他们甚至连美国境内的州际旅行都懒得行动。

金不一样。她在康复院兼职，工作随她的时间表来调派，一年里工作半年，度假半年。不安分的她，用积攒下来的年假，参加了为期7个月的旅行团，从地处北极圈的美国阿拉斯加州出发，途经中美洲和南美洲，一路玩遍南美才解散。眼见来到离南极最近的乌斯怀亚，干脆买了前往南极的船票。

说起那7个月的旅途，她苦笑：“年轻人，都是临时参团，玩几天就走；能全程坚持下来的，都是七老八十的人，而作为唯一留下来的年轻人，我自然被封为了‘老年之友’。”

这是几天里我与金唯一的一场长对话，在接下来两天的海上航行中，我被晕船折磨得无法开口。

天气条件乐观的话，从阿根廷航行至南极，需耗时两天半。而这期间必经的德雷克海峡，是世界上风浪最大的海峡，它带来的，是船身不间断地剧烈摇晃。晃动在夜里尤剧，身子像是被人抡了起来，不断甩打。

强烈的晕船反应不时袭来，我只要稍稍起身，就得抓一把呕吐袋，哗哗地吐，吐得只剩苦胆水。

船舱过道里每隔半米就穿插提供呕吐袋，取用的却都是亚洲乘客；白人乘客，大都龙精虎猛，在餐厅里谈笑风生，身体条件的大不同叫人气馁。

金很是体贴，每隔一会儿就凑前来查看我的晕船情况，给我递水，又从餐厅给我端来食物，并不断鼓励我起身去餐厅，“或许走动一下就不晕了。”

她这般热情，我实在不好拒绝，只好随她去用餐船舱，可还没坐稳，就捂住了嘴——阵阵恶心翻滚上喉。

尽管两天的航行过程没让我的胃有丁点的舒适，却收获了与金之间的私谊。船抵南极时，我俩已交情甚笃。



从乌斯怀亚借来的国旗



从阿根廷开往南极时，我因为晕船，几乎两天没有进食，只跟呕吐袋相依为命，这是我用呕吐袋画的



极地比基尼



极地比基尼



到处都是小企鹅



终于抵达南极，我还没来得及激动，就被金拽着，一起参加了皮艇队。

从未划过皮艇的我，以为衣物够厚足矣，根本不知防水才是关键。运动员出身的她，划得得心应手，而衣服和手套都渗入了雪水的我，在前面被冻成了雪人。

在南极的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换上了泳衣，怂恿着金，让她也穿泳衣。

她不肯，我便激她：“有来南极的勇气，却连穿泳衣的勇气都没有？”果然奏效，她跟我一块去雪地撒了把野，留下了几张日后让我炫耀了几年的“极地泳衣照”。



刚吃了一只企鹅的海豹

邮轮上除了划皮艇，每天还有露营、讲座等不同活动。由于户外活动有严格的人数限制，每人报名参加同类活动的机会只有一次。于是那晚的露营，便是我和金唯一一次能够看到南极银河的机会。

然而天公不作美，那天傍晚不仅飘起了雪，还夹带着雨丝。眼看着层云厚实密布，深知当夜已不可能观星，我和金还是坚持参加那20人的露营。

已是傍晚，天却没有黑下来，因着雪地的反射，周围仍是白茫茫一片。

营地只有两顶帐篷，我们都自觉地让给了同行的老者。大家都忙着用铲子挖地，准备铺防潮垫和睡袋。我偏不，跑去另一处积雪厚实的地方，躺在地上，滚来滚去。

待滚够了，我斜眼偷看那两位准备睡入帐篷的老年船友。其中一位满头银丝，连搭帐篷的动作都颤颤巍巍。叫我看得动容：他这一生，恐怕喜怒哀愁都经历过了，在这八九十的年岁里，不仅没有厌倦人生，还有这份执念来看一眼南极，这是多么乐观的人生态度。

再转头看金，这家伙，居然把自己卷进睡袋里，准备入睡了。

到南极旅行，必须遵守《南极公约》，观赏任何动物，都要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当然更加不能触碰它们，以免人类和动物身上的病毒细菌交叉感染。登岸前，我们还要换上船公司准备的已经消毒的雨鞋，才不会把自己鞋底附着的土壤带上南极陆地。

因此，即便离我不远的岸边站满了可爱的小企鹅，我也是不能去触碰的。眼看着天色渐黑，除了滚来滚去似乎也没有其他娱乐项目，我便走回营地，铺起了睡袋。

露营翌日一早醒来，看见这个将亮未亮的世界





露营翌日一早醒来，看见这个将亮未亮的世界

就在我挖地时，天完全黑了下来，我没有耐心打手电照明，干脆马马虎虎地把垫子往地上一铺，把睡袋一塞，自己钻进这胡乱铺就的蚕茧里。一张防潮垫和两个零下温标的茧形睡袋，都是船公司提供的，暖得很，才躺一会儿，便出了汗。

夜很静，竖起耳朵，能听见其他旅客的细细低语。小企鹅们将睡未睡，脖子窝向腋下，咕咕咕。因雪地反光，夜已深却并不漆黑，倒像将破晓的鱼肚白，一片混沌的世界。

我如梦游者一般，呆望天空。没有银河，甚至没有一颗星。雨夹雪簌簌飘下，落在我的眼睛里，被温热，变成水，泪一般划过。

一只贼鸥伶伶仃仃翔过岸边，叫声打破平静，而又远去，余孤寂万里。我舍不得入睡，想钻出睡袋呼吸，又怕风雪太袭人，扯着睡袋口的手松了又紧，任雨水雪水落在脸上。像孩子初次出远门般新鲜又畏惧，睁着眼一处处地细看，看天也看地，看企鹅入睡的憨态，看冰封海湾处那古老的冰晶蓝，听来自冰川那遥远而清晰的冰崩响声，要听要看的太多，别怪我忘了归途。

身边所有游客都已渐渐入睡，低语声已不再，寒气阵阵袭向我的腰背和头颈，耳机里传来恩雅的“A day without rain”（无雨的一天）那是全世界静止的一刻。

第二天醒来，天仍是混混沌沌的模样，不亮也不暗。而我的头上积满了连夜的落雪，肩颈后的雪受压一夜已变成了结实的冰。

再查看睡袋里的相机等电子设备，发现它们因为受潮，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心里，已不去在乎了。

在南极的最后几天里，有一夜，我们聚在船舱的吧台聊天。船上有一位与金颇聊得来的英国男孩，他喝得醉醺醺，直言不讳同金抱

怨："南极旅程那么长，害得我都没法回到陆地，继续我的艳遇之旅。"金看向我，一脸的失望。

看完了壮美的极地风光，我们又回到真实的人性社会里，所有的物质、欲望，又回到了心头。

在世界的另一端遭遇不公

我们这艘船共108位乘客，华人里有美国籍、加拿大籍和阿根廷籍，另外还有中国台湾同胞。而真正来自中国大陆的，只我一人。

最初我还得意，以为会有特殊待遇。不料在接下来的航行里，自己因这矜贵的身份，吃了不少苦。

船上的副领队是一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女士，自首次登岸起，就没有停止过地提醒我："不要靠近企鹅！"

我们登上的这片陆地，满岛的企鹅。我一直刻意避开它们，不仅是深知《南极公约》的相关规定，更是下意识里出于对极地动物的保护。然而，我偶尔躲过了右边的企鹅，却在无意中靠近了左边迎面走来的小企鹅。我观察其他乘客，发现他们同样无可避免地偶尔走近一些企鹅，然而，被马达加斯加女士厉声批评的，只有亚洲游客。

整趟旅途，我几乎没有一天可以躲过马达加斯加女士的指责。有一次，船上3个结伴旅行的俄罗斯游客，靠近岸边一只正在休憩的海狮，只见他们仨猛地起跳，跳到海狮跟前，还大笑不已，惹得海狮不断露齿咆哮。马达加斯加女士就在一旁，不仅视而不见，还走到我跟前来，毫无由头地提醒我远离企鹅，叫我哭笑不得。

这么多次的委屈，我都忍了下来，是不希望自己作为中国人，与船上副领队发生争执，让一旁的乘客错下判断。

在南极的最后一次登岸，我与金结伴走着。她突然转头看着我，笑得很调皮："Carrie，给我拍张照吧。"

看她说话的方式别有用意，我担心：“你该不会想靠近企鹅合影吧？”

金求我：“就一次，就一张照片，拍了就走。”

“好吧，但动作要快，你知道的，船上有位女士24小时盯着我。”

金听了，不以为然地哈哈笑着，蹲下身去，靠近一只正在发呆的小企鹅。她与企鹅的距离大概在1米内。

就在我按下快门的时候，余光已瞥见马达加斯加女士向我们跑过来。说“跑”，真的毫不夸张，就连她跑的幅度，都带着一股即将能够批评我的兴奋劲儿。

果然，金在她眼里成了空气，她径直跑向我，大吼：“你听不懂英语吗？！”

我太懂她的话中话了，她的意思是，领队早已用英语告诉过全船乘客不得接近企鹅。我不仅听得懂，还比她这位满嘴法语口音的人听得更懂。

但成为金的“同谋”、给她拍照是事实，加之不希望给其他不知就里的乘客营造出“中国游客与船领队争吵”的画面，于是我低下头去，说：“我觉得很抱歉。”

“不，你一点都不觉得抱歉！”她继续吼我。

待她走后，金一直同我道歉，我很低落，没有回应。

那天，船上有一个发小费的环节。船公司给乘客们提供了一个白色信封，大家可自行放入现金，当作是给全船员工的小费，金额自定。

超出我预料的是，船上一些乘客，在听了金叙述我的故事后，纷纷来到我的船舱安慰我说："Carrie，为了给你报仇，我们都在信封上写了'小费给可爱的全体职工，除了那位马达加斯加女士'。"

南极之旅，就这样翻篇了。

然而，没翻篇的，是受到不公对待留给我的阴影。

带有偏见的，不仅有马达加斯加女士，还有一位在船上兼职做短期登山向导的香港男生。

一开始，他听我与船上的华裔乘客说普通话，以为我来自北京。派发登山鞋时，他对我的态度极其冷淡。直到我跟他用粤语交谈，他才露出笑颜，惊叹："自己人。"冲他这狭隘的看人视角，我没再同他有交谈。

回到阿根廷后，我在乌斯怀亚的码头碰到了他。

我问他："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为何这样处处刁难？"

他不屑："我不是中国人，我在香港回归前申请的护照，我是英国人。"

我笑："持BNO英国海外国民护照，连英国居留权都没有，就自诩是英国人？"又问他："在船上做兼职，你或许是在赚旅费，可见你是爱旅行的人。爱旅行的人，多有包容心，而你轻易地以国籍和地域取人，实在不配被称作旅人。"

他看我一眼，毫不在乎地说："不仅是我，在南极从事旅游业的人，很多都不喜欢中国人。给你讲个故事，南极邮轮上都配一名摄影师，有一次一位摄影师告诉我们，他船上的中国团员携带的几乎都是昂贵的莱卡相机，有的中国游客还说是为了在南极拍照特意买的，结

果登岛回来后，他让旅客们分享照片，发现他们根本没照。一问才知道，莱卡是全手动的，他们不懂设置。你看，这只买贵的，不是很有中国特色吗？”

没等我反驳，他继续说：“还有一个故事。在你去南极前，我们有一艘邮轮是‘中国游客专列’，一艘船一百多名中国人吵吵嚷嚷，永远静不下来，而团里只有一名导游，永远挥着小旗子，让乘客‘安静’。有一天，我们的清洁工在例行清洁客房时，在一间客房的洗手间里发现一只活的小企鹅。员工们吓坏了，赶紧驾冲锋艇把小企鹅放回陆地。事后，他们质问这名中国游客，他回答说自己是用一个黑袋子偷偷地把企鹅装回客房的，而原因竟然是‘想带回阿根廷大陆，试一下企鹅肉’。”

当时在我身旁的，还有其他游客，他们听了这个故事，啧啧称奇，开始想象和延伸这个可恶的游客偷企鹅的细节。而我，为这个不知名同胞的行为羞愧得红了脸。

经历了极地的风浪袭击和十数日不似在人间的旅途后，返回乌斯怀亚竟有归乡的错觉。这家咖啡厅几点迎客、那家街角餐馆的无线网络密码是什么、转角处甜品店哪位店员会说英语，我都那么地熟悉。

第一次来时入住的旅馆，经营者是阿根廷的男孩里昂；二月份，我登船前再去入住，竟已易主，换成美国人阿力。我从南极归来，门铃都不去按，径直推开旅馆的门。阿力见了我，露出笑意，说记得我是该这天回来，特意给我留了房间，说着指指身后的懒人沙发：“你自己的家，别客气，赶紧捣乱去吧。”

第一次前往达乌斯怀亚的那天，风雨交加，飞机抵达后，我惊喜地见到了彩虹。在我离开乌斯怀亚这天，竟又遇到彩虹。我本想悄悄溜走，却被阿力抓住，拍了几张合影。我抱抱他和他的老婆，说“下次

见”。阿力精明地笑：“不会有下次了。这里是世界的尽头，你只会来一次。”

没坦白告诉阿力，其实我从没喜欢过乌斯怀亚。这个小地方像一杯温水，把我的孤独泡得无限大。不知何时起，阿根廷传有这样的说法：得意的人都喜欢去伊瓜苏大瀑布，而失意者的最好疗伤地则是火地岛。火地岛上满布积雪的山峰、大片寒带针叶林和万里冰川，满足了孤独旅人的所有自我放逐。而乌斯怀亚，正是火地岛的首府。

其后在阿根廷旅行时，我碰到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女士，她刚刚结束英国科考站在南极的年度科考工作。听我叙述了因国籍而受到的不公待遇后，她也不忿：“我在科考站工作时，常提醒同事，每年来南极的游客多达一万五千人，接待的人多了，同事们也会累、也会不耐烦，但一定要管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的一次偏见和情绪失控，很有可能会毁掉游客们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南极之旅。”

心是最好的纪念品

后来，我到了智利。在首都圣地亚哥旅行了几天后，我搭车前往北部的沙漠地区阿塔卡玛，拿着辛苦等来的玻利维亚签证，希望从那里坐车前往玻利维亚。

然而，到了边境，才发现自己的智利签证是单次入境，意味着如果我去了玻利维亚，就无法再回智利，搭乘那班我已定好的、前往巴西的航班。虽说我可以在玻利维亚再申请智利签证，但不多的时间不允许我这么做。

放弃了玻利维亚，我安慰自己：不过一汪盐湖，无缘相见，便祝它观客满满。

在阿塔卡玛的镇子上，穿行于飞扬的沙尘，去找饭馆用餐。

餐馆的老板娘与我无法沟通，只见她跑出了餐馆，跑了半条街，想抓个路人给我翻译点菜。没怎么见过亚洲游客的食客们盯着我看，叽里呱啦地讲着智利西班牙语。

老板娘回来，摊手说没找到翻译，索性做出胜利的手势摆在头顶假扮鸡冠，发出“咯咯咯”的啼鸣；又抚着下巴模仿山羊胡须，发出“咩咩”的叫声，问：“你是要‘咯咯’肉，还是‘咩咩’肉？”——直到咯咯肉上桌，餐馆里还回荡着笑声。

旅途，没有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未知的惊喜，永远在计划之外。

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坐飞机前往巴西。告别智利，我再次返回阿根廷，进行了长线的旅行，并在游览了位于阿根廷边境的伊瓜苏大瀑布后，陆路进入了巴西。

巴西诗人曼努埃尔·班德拉曾说：“白天，世界上没有巴西；晚上，巴西就是整个世界。”夜幕里的巴西，满是诱惑。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我才到旅馆就卸下行囊，洗了个澡，便满脑子的“巴西烤肉”。为了不招窃贼惦念，我把现金和钥匙塞进内衣里，不带任何随身包，湿着头发穿着短裤踩着拖鞋就出了门。

找了一家装潢高级的烤肉店，自助开放式的食品区，光水果就有很多种我叫不出名的，更让我感动了：食物的世界充满学问和奥妙，吃货应漫漫求索。

招手让服务生过来，他以为我和他打招呼，也举起手摆了摆，和我打招呼。我只好又招了招，让他过来，他便更开心地朝我招手。只好换了位智商正常的服务生，可是他不懂西班牙语又不懂英语，用葡萄牙语向我比画39块9雷亚尔一份自助餐。



巴西边境城市居住着的原住民

一听，心里大喜：我的食量，能吃下十份39块9。于是我把各种肉类甜点蔬果点了个遍。吃得太多，虽然还没饱，但想起自己代表祖国形象，让巴西人错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总不太好，于是我不舍地放下刀叉准备结账。服务生过来报价，简直天文数字。我与他再三核对账目，比画半天，我才明白，这家餐厅不是任吃，是按公斤算，大部分食物都是39.9雷亚尔一公斤，只有蛋糕便宜一些。

我顿时懊悔于人生，要知道，我连西瓜都吃了几斤，更别提那配寿司的大半碗很占重量的酱油了。面对如此蠢的我，服务生笑作一堆。

用过了餐，里约夜已黑。但我舍不得太早入睡，坐大巴去市区晃荡，不料坐错了班次，眼看车子开向荒芜的郊外，里约的治安情况有所耳闻，我的心脏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到达终点站后，车上只有两名乘客。我向身后的乘客问询，他一听，执意要送我去搭别的巴士。另一位乘客也不放心，要一起送。这两位都是巴西人，一路对我讲葡萄牙语，我尝试英语加西班牙语，都无法沟通。我们仨只好在潮热的里约街头沉默地走着。

他俩偶尔问我问题，看我一副听不懂的疑惑模样，又自顾笑了起来。总有我听懂了的，他们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是中国人，男子激动，大叫“毛泽东！”送我到车站，男子承诺说自己会全程陪伴，女孩便回了家。

他见我害怕，想缓解我的情绪，于是哼起了小调，把音乐作为安抚的语言。慢行的巴士，过了一辆又一辆，偶尔有拎着酒瓶的小混混，男子都把我往他身后拉。40分钟后，总算等来了对的那班车。男子开心得手舞足蹈，送我上车后，几番叮嘱司机，才放心离去。

回到里约市区，我不甘浪费夜色，仍不肯去睡，干脆跑去喝果汁。

这家果汁店是我光顾过几回的，店员和我熟，点了一杯，赠了一杯。在我和店员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时，店里忽然进来位衣衫褴褛的拾荒老人，背着一袋空矿泉水瓶。只见他从袋中抽出一个空瓶子搭在柜台上，双手作揖状哀求着店员，嘴里嘟囔着含糊不清的字词。店员装作没听见，不去理他。

我问店员老人要什么，店员不屑，朝洗手池努努嘴，说：“那家伙想要水。”我于心不忍，干涉道：“给他一瓶矿泉水吧，开销算我的。”

店员难为情地挠了挠头，无奈地转过身去，假装才听见拾荒老人的话，从水龙头给他装了一杯水，没给矿泉水，兴许是不想让我花钱。

喝完果汁，别过店员，我踏着夜色回住处。夜深，偶尔路过几个醉汉，惊得我快步走过，头也不敢抬。路上灯光昏暗，我总感觉身后有人跟着。

到了旅舍楼下，小巷捷径里忽然窜出一个身影，看着我，把我吓得不轻。细看，才发现是方才那位讨水的拾荒老人。他冲着我笑，满脸沟壑，用葡萄牙语不住地说，谢谢，谢谢，还手脚并用地比画，说是怕我走夜路遇到危险，他才一路默默跟着我。

我便开心了一路。

这段在美洲的旅途太漫长，我肩部负重能力越来越弱，背囊里舍弃的物品也越来越多。加之南美潮热，我再三思虑，把一个陪自己走过大洋洲和南极洲的睡袋弃在了阿根廷的旅舍厨房里，希望于后来人有用。那是一个有故事的睡袋，是我在湛江机场与妈妈抗争了好一会儿才塞进背包的，因为妈妈觉得“又不是去流浪，带什么睡袋”。

她不知，女儿真的去流浪了，晃荡在大千世界善恶各异的人心间，浪迹于不同国度不同文化带来的撞击中，沉迷在每天美轮美奂的日出日落里。

睡袋的故事告诉给朋友听，换来“残忍”的评价，他们都觉得那些物品刻着旅途的记忆，是该永久珍存的。

我的朋友们不知道，小时候，我参加演讲比赛时穿过的鞋子和裤子，后来穿得边角都磨破了，仍舍不得扔，觉得那是“战衣”。长大后念书的假期里，在国内坐着绿皮火车独自旅行，从船票、车票到旅游景点的门票，都攒了一大沓，觉得那是走南闯北的见证。后来踏上异域，19岁的光景里有着无穷大的力气，异国见到的瓷杯陶盘，哪管三七二十一，好看的都装起来，想把整个风景胜地都装回家。回到家，

再一一摆上书柜，展示于人，“这是某某国带回来的”，好大的口气，恨不得把去过的国度给对方列一张表。

后来走多了才明白，那些年战战兢兢、独自走过的异国巷弄，承受过的陌生庇护和不图报酬的馈赠，蹭过的当地人家的饭菜，都不是一双球鞋、一件冲锋衣等任何一件物品能够记录得完的。

那就让这颗心记载一切吧。

CHAPTER 13 我家沙发借你睡

澳大利亚


BYRON



德国沙发客和西班牙沙发客一早从我家出发，准备在马路上搭顺风车，结果下午失败归来我家，又住了几天

从背包客到沙发主

2016年初，我搬到了悉尼。在新居安顿下来后，我做了这件一直想做的事：接待沙发客。

沙发客，指的是从CouchSurfing这个网站上寻找免费住宿的人，大多是旅行资金紧张的背包客。用自己的家来免费接待沙发客，是我一直以来的计划，无奈多年旅途漂泊，无固定居所可接待。

这个念头，始于2012年首次到印度独自旅行，那时我遭遇航班更改，行程住宿计划都被打乱，幸得沙发客网站上一位印度女性阿奴好心免费接待我，才不至流落街头。阿奴后来成了我的印度干妈，我每年都会去探望她一回。

再后来，我走中东、闯非洲，渐渐把七大洲都踏过了，虽然没再做过沙发客，但旅途上受到的陌生恩惠不计其数，有阿富汗的旅馆老板免了我一个月房费；有伊拉克当地的大家族不允许我独自旅行，招待了我数周；有葡萄牙服装店夫妻见我钱包证件被偷，给我现金搭车前往西班牙；有墨西哥咖啡店小哥见我信用卡被冻结，用他自己的卡给我付账……凡此种种，我接过了一颗又一颗滚烫的心，欠下陌生人的恩情太多，也已不可能一一归还。



印度沙发主阿奴给我办生日派对，喝了半杯啤酒就醉倒的我，被大家取笑

既然如此，那就把这些恩情，报到陌生的沙发客身上去，希望他们能将这份善意报给下一位陌生人。如果进门来的沙发客在离开后并没有把这份善意传达给他人，我也不会恼，毕竟施与本身就是一种获得。那时的我，根本猜不到，从接待沙发客里，我认识到许多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也学会了更多辨人的技巧，招待沙发客对于我而言再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付出，而成为了学习文化、观察人性的课堂。当然，都是后话了。

搬入新家的第一天，我便把自己在网站上的接待状态改为“开放接待”；与此同时，把家中客厅的沙发床套洗了又晒，家中地板、厨房、厕所，都一清再清，为了让沙发客住得舒服些。不是有人说，与家有关的幸福感，第一来自于信号满格的无线网络，第二来自于塞满了的冰箱。于是，就连冰箱，我都用饮料和食物把它塞满了。

不到半天，请求接待的信息唰唰地来。并非我的资料有多诱人，只是因为悉尼住宿太贵，且那是圣诞节期间，酒店旅舍房价更是翻数倍地飙升，市区旅馆一间30人混住的宿舍间加价至400人民币一晚；加之，愿意在节假日免费接待、且家住市中心的沙发主，恐怕全城就这么几位。

在这么多的请求中，不乏纯粹抱着“找一张免费床”心态的沙发客。而让我印象深刻的请求，来自一位法国男生。他的申请信写得最长，不仅显出诚意，也处处带着文书的礼仪。他发的是“最后一分钟请求”，意为住宿需求非常紧急，他希望翌日就能入住。

我当时唯一的顾虑是性别。衡量再三，我想，接待本就基于纯粹的信任，对沙发客，我是用性本善的标尺去度量的，没有过多地疑虑他们是否觊觎家中财物。那么在性别方面，我也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啪”，我按下了“接受”按钮，通过了他的请求。在简单的邮件交流后，确定他第二日一早入住。那个月凉如水的夜晚，是搬入新家后唯一一个我能独霸客厅的夜晚。



圣诞前夕，熙熙攘攘的马丁广场

客厅里放着Joel Hanson唱的Traveling Light（轻装前行）——

I staggered and I stumbled down

我摇晃着，艰难前行

Pathways of trouble

眼前只有困境

I was hauling those souvenirs of misery

我拖着这些负重和苦痛

And with each step taken my back was breaking

感觉每走一步，自己就要被压垮

Till I found the one who took it all from me

直到我发现生活重担的缘由

Down by the riverside

我如释重负，漫步河畔

Now I'm traveling light

现在的我，轻装前行

My spirit lifted high, I found my freedom now

我的意志又回来了，因为我找回了自由

那一刻，坐在客厅享受着静谧时光的我，定料想不到，后来的日日夜夜，因着接待世界各地前来的沙发客，这个客厅上演了各种喜怒哀乐的戏码——我因送走心爱的两位沙发客姑娘而大哭一场，也曾怒气冲冲撵走过不请自来的沙发客。

是啊，那一夜，怎会预料到这么多。

我只在安静的客厅里坐着，背后是煮汤圆的噗噗声，小圆锅盖盖不住故乡的气息；前方窗外是悉尼漆黑浓稠的夜，等待着翌日的黎明，和我未曾谋面的陌生客人。

汤吉，一路向南

接受汤吉的沙发请求，原因很简单：他很有礼貌。

那时正逢澳大利亚旅游旺季，每个小时涌进我收件箱里的沙发请求不计其数。在这数不清的请求里，多是开门见山要求接待的人，通篇都是对自己留宿需求的描述，鲜少见到礼貌的打招呼。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找一张免费的床，而忘了沙发客背后的精神是沟通与交流。

而这所有的来信请求之中，用词有礼又不凡的汤吉脱颖而出。

这个来自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的家伙，在沙发请求里，开头就道："嘿，我绝不会提你的圣诞树丑，实际上，我见过更丑的。"

圣诞树这个笑话，缘起于沙发客网站个人主页的固定模板，其中一项"当前任务"里，我写的是："1.减肥，2.杀死所有蚊子，3.击毙那些把沙发客网站当成约炮工具的人。——遗憾的是，以上一样都没有达成。"

而在"家规"一栏里，我列了几条自定的规矩，诸如"来我家，接待你只是举手之劳，不要给我带礼物，不要勉为其难地给我做饭，我知道很多沙发主希望收礼物或品尝各国沙发客的手艺，但我更希望你把时间和金钱，花费在未知的旅途上，而毋要让恩情变负担。"另一条则是："不许说我的圣诞树丑。因为它真的很丑，而真相很伤人。"

汤吉的信，寒暄过后写及自己的旅行计划，如同大多生性自由不受束缚的欧洲人一样，汤吉潇洒地拿出了一年时间来环游世界。

他说自己正在新西兰旅行，由北部搭顺风车南下。一开始，他会在搭车牌子上写上目的地。现在，他干脆只写“往南走”，只要有车停下，他就跳上去，让好奇心带着他前往未知目的地。

我也曾在新西兰搭过便车旅行，但每次拦车都会仔细研察司机表情、语气和车内情况，有了足够的判断才敢上车，而且都是在缺乏公共交通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像汤吉这样随车而安，我不敢。

汤吉来的那个早上，我给他煮了饺子就匆匆去工作了。

下班回家，见汤吉正在做晚餐，见我进家忙迎上来，说给我备了瑞士法餐。

“瑞士法餐？”我不解。

他解释，他妈妈是瑞士人，爸爸是法国人，因此自己常年在法瑞两国轮着住。

我瞥一眼厨房，发现汤吉居然添置了新的刀叉、盘子和玻璃杯。

我刚搬入第二天就开始接待客人，家里连餐具都没来得及备齐。多了几对汤吉买的刀叉，虽然偌大的厨房还算不上齐备，但我心头，总感觉这几套餐具让厨房看起来满满当当，什么都不缺了。

如果说接待沙发客有初衷，那就是尽力帮助那些在旅途上希望节省住宿经费的旅行者，只望他们把这份善意传给下一位陌生人；至于回报，我是不曾去想的。

而汤吉却改变了我的想法——他并非想要省住宿费，而只希冀通过沙发客这样的途径，去认识更多人，交换更多故事。

说着，他摆好盘子，聊起自己的过往来。

他曾是个音乐家，现在也还是。

尽管旅行让他脱离了职业生涯，但天地之间，尽是演奏场所，所以游走世界并未让他离开本职，只是不再赚钱了而已。

我见过很多不安分的人。不安感是他们的人生支柱，是他们冒一切险、追求一切彼岸景致的动力。但我无法给人心的不安分理出个缘由。比如汤吉，或许是多元的家庭背景，使他骨子里有着四处游走的血液，又或是后天对音乐的执着衍生出对种族、文化的好奇，使得他某天放弃事业，跑出来，生活在别处。

但不同于人们的想象，汤吉自有他食人间烟火的烦恼，比如说，女友嫌他不能在身边陪伴，离他而去。

汤吉说，自己仍爱着她，但不强求。

夜里，汤吉在客厅的沙发床入睡。

回到房间后，我对着门锁愣了好一会。澳大利亚的房屋，不知是否出自全盘信任的社会价值观，房子内的门几乎都没有锁。

我也曾想过用厚重的桌椅抵住门背，但一想到汤吉表现出的随性与有礼，我未免小人之心了，便不再忧心门锁，睡去。

汤吉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白天去邦迪海滩晒日光浴，夜里参加社交媒体组织的神秘派对——先报名，派对开始前半小时才通知地点。

他是个节制有度的人，并不喝得醉醺醺，参加派对也不为猎艳，只图好玩，顺便考察悉尼酒吧里的音乐水平。有时他也扫兴而归，嘟

嚷着悉尼酒吧水平参差不齐，闹哄哄的，远不如欧洲酒吧的装潢情调和选曲品位。

我和汤吉的共处平安无事。

几天下来，我不仅抛开屋主的架子，还在这位客人身上学到了不少弦乐知识和欧洲生活方式，甚至他那副追求自由不拘小节的灵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我曾在职场上野心勃勃，恨不得吞掉一切实力相当的对手。汤吉身上凡事无所谓的气质，却教导我，何苦呢，一份谋生的差事而已，何不随心而活。

汤吉住下的第三天，两个外向的德国大男生朱廉、亚斯也加入了。他们仨挤在客厅，很快打成一片。

三男一女，照说我该窘迫不安，但他们爽朗的个性很快让我丢掉了对性别的介怀。

家里，常出现这幕：

我拍拍脑壳，“哎，锅呢？”

“这儿呢！”其中一个大男生指指柜子。

他们没有拘束，和我聊他们的学生时代，聊自己的感情经历。我甚至忘了自己的沙发主身份，当起了聆听的宾客。



汤吉离开前，给我吹了首曲子，他是个视音乐为生命的人，旅行时带着一个大箱子，装了各种罕见的乐器

朱廉是个爱耍宝的人，天生的领导气质让他从不怯场。无论我的哪个朋友来访，朱廉总能摆出主人的姿态，与对方聊天，并递上饮品小吃招待。

然而，同样是这个家伙，却在日后某天触犯了澳大利亚的法规，给我们惹了麻烦……

被酒吧撵出来的朱廉

法国男生汤吉、德国男生朱廉、亚斯和我三男一女的共处局面，很快被打破。

新入住的伦敦闺密安蓓和玛雅，是一对多年至交。得知这是她们头一回做沙发客，为避免她们与男生共处的尴尬，我把主人房腾出来给她们，自己搬到客厅沙发床。

男孩们一开始吵吵嚷嚷，说我发神经。后来发现我对睡处的确不挑剔，也就由着我了。

玛雅虽有英国女孩的爽朗做派，但那小麦色肌肤、深邃的棕瞳和夹黑的头发却透着南亚韵味。一问，原来是印度裔。

而安蓓的家庭则是英法结合，她的法语带着伦敦腔，汤吉一句都没听懂。她留短发，从不施妆，男孩气颇重，却又总有着说不出的忧郁。她自有20出头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并不多问。

出于感激，他们总想给我做饭，汤吉做过瑞士法餐，玛雅做过印度咖喱，安蓓很坦诚，说自己只会吃不会做。朱廉和亚斯深藏不露，直到住下第二周才自荐下厨。

那晚，他俩往超市跑了两趟，神色紧张，一直不让我们靠近厨房。

我偷瞄几眼，才发现他们连煤气炉都不会开。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两人唤我们上桌，上了一盘意大利面，又上一盘，还是意大利面，煮得软塌塌，汤食一样，番茄切得大小不匀，小块的熬烂了，大块的没煮软。

我们不抱怨，都七嘴八舌地违心称赞，一边赞一边努力咽，他俩还好心，递来一瓶罗勒青酱，说换个口味。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面前那份扒光，一抬头，看见朱廉和亚斯渴望被肯定的眼神，我不忍心，昧着良心问：“还有吗？”

面前立马甩来另一大盘意面。

“究竟煮了多少？”

“11包。”

我震惊了，扭头看厨房，只见那运气好、没被抽中的第12包意大利面，正静静地躺着，笑看这一切。

当然没吃完，力求不浪费，通通放入冰箱。

那晚过后，家里冰箱、客厅乃至天花板都浸酿着意面那斥满番茄洋葱的气息；即便后来我用粤式牛肉青椒炒面的做法，让剩下的意面起死回生，还是无法阻止“意面”就此成为我家的禁词，只要一提，汤吉、安蓓、玛雅就要作呕吐状。



朱廉和亚斯正在煮11包意面



圣诞节前夕，给沙发客们做饭吃，他们要坐在地毯上，说有野餐的感觉。背景是安蓓和玛雅重新装饰过的圣诞树

我们自来熟，几天下来就似连体婴，周六达令港烟火要伴着一同去，周日悉尼郊外蓝山也约着一起爬。平日夜里，我们会围坐一桌，玩玩尤克里里，聊聊几大洲的文化异同。

一夜，对音乐狂热的汤吉叫我们陪他去市中心著名的三只猴子酒吧。

这并不是酒吧的名字，这个称呼来自酒吧门口的三只石猴。有国内朋友戏谑地说，三只猴子捂嘴、捂耳、捂眼的造型恰好代表《论语》中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是智慧的标识也。

名气响当当，但领队汤吉一跨进门，却气坏了：音乐怎么那么吵！怎么一会儿电子乐一会儿重金属！啊天呐怎么还放贾斯汀·比伯！

凳子还没坐热，酒杯还没抿上，汤吉就任性地要走，一副没吃到糖的噘嘴表情。我见大伙都在兴头上，也没多挽留，便把备用门卡给汤吉，让他自己回家。

我们正一桌人闹哄哄时，保安过来，请朱廉摘掉鸭舌帽。朱廉照做了，但等保安离开，又迅速把帽子戴上，说今晚没整理发型，全靠帽子保颜值。

然而，酒才过一巡，保安又来了，这回话也没说，拎着朱廉的帽衫，就把他往门口扯。动作虽无礼，脸上却笑着说："你在酒吧里戴帽子，违反了澳大利亚法规，请你出门，这是我的职责。"

见朱廉被撵走，我们一群人也败兴跟随。

朱廉在珀斯做过半年交换生，来我家后常抱怨澳大利亚的法律法规奇怪，"在维多利亚州，私自换灯泡违法，周日午后穿粉色短裤违法；难道，在新南威尔士州戴帽子进酒吧也违法？"

至今，我们都没弄清戴帽子进酒吧不符合哪条法规，细想可能只是违反酒吧规定：因室内监控视频难以拍到帽檐下的人脸。

不能放肆的夜晚，干脆回家里喝果汁聊天。

一开始，聊的还是严肃的欧盟难民危机，没多久就转为各自的旅途故事和职业追求。这一聊，朱廉才猛地想起，凌晨3点，保时捷公司要给自己打电话面试！

朱廉个性外向，做事情没头没脑，常套错袜子，一黑一白地出门。但在学业方面，他可年年拿一等奖学金，在澳大利亚做交换生也是学费全免；不同于一般人自诩是“不用看书的天才”，他总自谦这是夜里挑灯的结果。眼看学业快结束，他急着找工作，不料一封求职信过去，保时捷德国总部真的给出了面试机会。

因担心对方认为自己身在南半球而无法及时入职，他只在求职信里留了自己的德国号码。

我们给他做模拟面试，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聘用你呢？”

他毫不正经地说：“因为我很棒呀，何止欧洲，全世界我最棒呀！”

“你棒在哪里呢？”我们忍住不笑。

“棒在我很会煮意大利面！”

我们笑作一团。

一群年轻人，明明都知道公平世界竞争残酷，却希望把世俗要求的好成绩、好工作、好归宿的评判标准暂抛一旁，只沉浸于这片刻的幼稚时光。

凌晨4点，我起身喝水，被阳台上的硕大人影吓了一跳。

一看是朱廉，他眼神呆滞，缓缓低声道：“3点的时候，保时捷没给我打电话……半小时后我才发现，原来忘了换上德国手机卡。”

问他怎么不睡，他慢半拍地说：“为了打足精神应付面试，我今晚喝了8杯咖啡……”

一夜无贼，全赖朱廉驻守在阳台。

《西班牙公寓》是我颇喜欢的影片，它关乎青春的迷茫和泛泛的日常，关乎追寻自我认同和探知人性的差异，关乎身在异乡的失落和惊喜。

但我从未料想，片子里那些欧洲青年对崭新环境的不安与翕动，无目的无规划的旅行，以及那些混乱的、琐碎的、嗡嗡响的生活，正每天在我的公寓里真实上演。

舍不得离开这个温馨的小团体，他们几乎每人都把旅行计划延后了。

一对情侣带来的沙发噩梦

每次挑选前来入住的沙发客，我都比较谨慎，先是看沙发请求写得如何，再看其个人主页上来自其他沙发客的评价。但对于莎拉和她男朋友，我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

原因很简单，在她的沙发请求里有这么一句，“入住那天是我男友的生日，而我们从未做过沙发客，希望你能接受我们，当作是给他的生日惊喜。”

在莎拉和男友搬入前，我和这位同年纪的德国女生已聊了开来：

“莎拉，你得教我用手倒立。”看了她资料图片的我，羡慕地要求着。

“好好好，可是我很久没练倒立了，要教你，我还真有点紧张。”

莎拉和男友来的那天，家里还有一位丹麦沙发客，以及当晚准备告别的安蓓和玛雅。

莎拉和男友坐下后，有一搭没一搭地加入我们的话题，在安蓓聊英国派对文化聊得兴起几乎要站上饭桌时，莎拉男友打了个哈欠，而莎拉则一直盯着手机。

他们是德国情侣，不怪他们。

对于德国国民性格的讨论，在我家里进行过不少。

此前接待过的朱廉、亚斯等都是德国人，他们却对着我嚷嚷：“Carrie，你怎么可以接待德国人，我们可是没有笑话没有情绪的

民族！何止没有笑话，简直没有心，没有肺，没有感觉。”

有次朱廉做菜切伤了手，血染红了一张创可贴，他却镇定自若，自嘲道：“别担心，我可是德国人，没有感觉的德国人。”

当然，以国籍来断人，实在肤浅片面，我们的论断，也不过茶余饭后的消遣，并不当真。

打着“介绍新环境”的旗号，我把莎拉和她男友骗到了后花园烧烤区，打开烧烤盘子，是我们早已备好的丰盛食物。

“生日快乐！”众人对着莎拉男友说。

他根本没料到还有生日庆祝这一出，没来得及反应，我已捧出自己亲手做的生日蛋糕。

他和莎拉都呆住了，不住地傻笑。

吃着笑着，聊着在澳大利亚的旅途故事，没一会儿，安蓓和玛雅就要起身告别了。

这两位英国姑娘，各自给我写了一封感情满溢的信。

不同于我们感情维持紧密的亚洲作风，信里虽充满了不舍，却也有着欧洲人的洒脱：“Carrie，如果能再相逢，希望我也能如你今日一般，给你免费的食宿；如果不能再相逢，那我祝你生活如愿，爱你所爱。”

把两位姑娘送到门口，彼此抱了又抱，哭得稀里哗啦。

几周共处下来，已然丢却了主客的界线。她们不仅没有给我添麻烦，反而在适当的时候留予我足够的私人空间。有时见我情绪不佳，她们会默默地去花园散步，不打扰我。这些微小的细节，我都看在眼里。

擦掉眼泪鼻涕回到家里，加入德国情侣和丹麦男生的牌局大战里去。莎拉男友问我们，可否坚持到12点，陪他跨进新的一岁。

丹麦男生第二日有早班机要赶，而我翌日一早也有工作，但我们都不忍拒绝这个请求，点了点头。

牌局实在无聊，苦苦撑到零点，我把家里音响开大，放了首中文的生日歌，逗得大家哈哈笑。

我以为生日庆祝就这样结束了，不料莎拉男友掏出手机，开始与家人视频，兴奋的他，对着爸妈大喊：“看，这是我的沙发主Carrie，免费接待我和莎拉！她是中国人，中国人真好！”

尽管分贝惊人，但一听到他这样赞美中国，我当然高兴，凑了过去，用蹩脚的德语夹杂英语，同他家人打招呼。

丹麦男生疲乏得像泄气皮球，我让他进房去睡，还装出仗义，“这个寿星，我来陪就好。”

我靠在沙发上，巴巴望着天花板，期待这场庆生尽快结束。

莎拉男友没有消停的意思，视频的间隙，还喝起了Goon。

Goon是澳大利亚俚语，指的是外包装为纸盒，内里是塑胶袋包裹的袋装酒，通常是白葡萄酒；纸盒配有类似水龙头的开关，只要拧开，酒就从阀门里流出来。



备好的烧烤食材，以及我给莎拉男友做的生日蛋糕，一种在澳大利亚颇为流行的蛋白霜奶油蛋糕Pavlova

Goon恐怕是澳大利亚最便宜的酒类，口感劣质，一般年轻小鬼开派对才会买来撑场。

沙发软，夜又深，我很快睡着了，被莎拉男友的视频声响吵醒时，已是凌晨3点了。

想着对方是同游异国的年轻情侣，对这般免费食宿招待充满感激，又碰上过生日，我实在拿不出气魄，只轻轻提点一句：“夜深了，可以小点声吗？”

莎拉男友瞥了我一眼，嘴上说好，转过头去，噼里啪啦的德语又洪亮地冒出来。而莎拉，也陪着男友，对镜头嬉笑着。

凌晨4点，我终于听到“晚安”这个词从莎拉男友嘴里蹦出。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去睡了。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过了半年仍刻在我心里。

结束视频通话的他，似乎已醉意醺醺，在莎拉的搀扶下，从地毯上站了起来。

才站起身，“哗”的一下，他吐了。

莎拉慌了神，我也呆住了。

根本没料到他会喝醉，都是劣质酒Goon的错。

他喷射性地吐，地毯、沙发、餐桌，甚至是沙发床的枕头全遭了殃，客厅里一片腥臭。

我强忍怒气，没说一句话，径直走进我的房间，把烂摊子留给他们，期待他们能清理干净。

翌日一早，这对情侣出门游玩去了，我看见客厅的字条，上面留言说因为没找到清洁剂，所以待他们回来再清理。

客厅恶臭如故，沾染呕吐物的家居用品正大剌剌地躺在洗衣机里。

我致电清洁公司，才把客厅拯救回来。

这对德国情侣不仅没走，还继续住了两日。我们之间，几乎不再交流了，但我尽量没给他们脸色看。

沙发客网站是有评价系统的，每位沙发客走后，我都要写评语。莎拉和男友离开后，我为评语犯了难。

如实写吧，可人谁无过，一场醉酒撒野不该成为终生污点；只写他们好吧，万一他们没汲取教训，日后做沙发客时劣迹又现，我岂不是错失了一个提醒他人的机会。

在咨询了不少沙发客后，我选择如实将他们的醉酒行为写出，但也写下："希望这次犯错，能让他们成为更好的沙发客，学会尊重他人居所，学会感激他人付出；也希望其他沙发主再给他们一次体验的机会。"

过了半年再去看他们的资料页面，在我之后，也还有沙发主接待他们；期间，也有沙发主给我发邮件，咨询我是否该接待他们，我回复说不妨给他们一个机会。这对情侣给我上了一课：以前，我只用"善良与否"去衡定一个人的人品，这次过后，我懂得了，若要共住一檐下，还需要衡量很多其他的品格。

有人问，若有天这对情侣再来悉尼，我还会见他们吗。当然会，过去种种并不影响我们交流，但能否再让他们做我家的沙发客，我可就不确定了。

唯一确定的是，在他们走后，我在家规里粗体加黑写了一条：

不许喝Goon!!!

劳伦斯：粉底盖不住的秘密

劳伦斯总是蒙着一层愁绪。

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个性低调或是初识的生分，后来终于辨清，那是愁绪。

当沙发客的，多是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年轻人，希望通过找到免费住宿来为自己减轻旅行经费负担。

劳伦斯却不是。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长大的她，在社区教育机构教授英语，不仅收入可观，还有带薪的寒暑假。

我问她为什么选择当沙发客，得到的答案是："想与更多的人交流。"

她说话时，不大看我的眼睛，总是盯着桌角，或是墙边，寻找可以让眼神停歇和隐藏的场所。

我分不清，她是天生个性使然，还有守着不堪的人生经历不肯说。

尽管嘴里说着想与更多人沟通，但家里来了新的沙发客后，劳伦斯依然不甚言语，只坐在沙发边角上，听我们对聊，偶尔也会插两句，问沙发客的家庭情况。

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必是去厕所化妆，门紧闭着，出来后脸上就多了几层粉底，甚至有沙发客在的夜里，她也用粉底盖着，直到大家都入睡，她才去把妆容洗掉。直到一夜她卸了妆，我才看清，常覆着粉底的脸上分明有瘀伤。

其时是悉尼的初夏，南半球缺了臭氧层保护的区域，每天一早就被艳阳炙烤着。天一热，劳伦斯的妆容持续不到半天，粉液浮末都显了出来，那底下一层的瘀伤，淡青得更明显。

家里的冷气运转不停，顾不上环保，其他沙发客一回家，也是嚷着热，跑向遥控器，“滴”一下赶紧打开空调。

但这样的艳阳天里，劳伦斯却总是身着长衣长裤，从未减衣。

澳大利亚女性自由奔放，夏天一到，恨不能天天吊带热裤人字拖上阵，连内衣都可以弃掉；劳伦斯却是例外，四肢遮盖得密密实实。难道说，这不是她的衣着品位，而是她的保护色？

我们都看在眼里，依然不去过问，留予她足够的隐私空间。

劳伦斯看我挂在家里的照片，说我摄影水平不错，问我喜欢拍什么类型的照片。我说非常想尝试新闻摄影。

“比如说，什么题材呢？”她问。

想也没想，我直说：“我总想跟拍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用图片来说话，来呼吁、唤醒大众。”关注“家庭暴力”，来自于一位曾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朋友的建议。她说，近年来，世卫组织已把“暴力”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其中占最大比重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没想到听了这番话的劳伦斯，脸上霎然失色。

这之前我和其他沙发客对她的所有猜测，在那瞬间突然就得到了定论。

她不知道拍摄家庭暴力题材只是我的无心之言，以为自己的伤痕被看穿了，便再也不忌讳，敞开心扉地告诉我，“你提到的家暴，是我正在经受、且长期经受的。”

她描述得不多，却句句如尖锥刺我心：结婚10年，她没穿过短袖衣服，不能给别人看见身上的伤。

他用猎枪对准她的脑壳，吓唬她，“再敢反抗，我让你的脑袋开花。”她下班晚归，回到家里就被他绑着吊起来，用皮鞭抽。

她说自己不敢叫喊，怕邻居听见报警；还尽力拧过身子，让重重的皮鞭落在后背，第二天要上班，不想让同事看出来。

她说：“最可怕的是，有时夜深入睡，忽然就被拽起来，往死里打，说怀疑我勾搭了别人；他梦里梦见我出轨，睁开眼后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向墙边，扯着我的头发，按着我的头往墙上撞……”她求我，“我知道你是正义的人，所以才不敢告诉你事实。不要报警，这些家事由我自己处理。”

我气得跺脚。气他的残酷暴行，更气她的懦弱和姑息。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惩戒上，澳大利亚是体系成熟的国家：警方可对施暴者强制逮捕，在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

在澳大利亚，不仅有刚性的政策，还有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传达软性信号：家庭暴力行为，是澳大利亚社会所坚决不能容忍的。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让劳伦斯挣脱。

劳伦斯离开悉尼那天，我连送都不乐意送。

就连患了皮肤病，人们都知道要根治，面对家暴，她怎能一味遮盖。我不能看她的脸，不能看她盖了又盖的粉底下的青紫瘀伤，不能看她烈日下穿着长衣长裤的模样，生怕她下蹲，会露出衣衫里皮肉绽开的伤。稍一看到，我就无法宽恕她的妥协。

赶飞机之前，她坐在家里客厅缝缝补补，一会儿给我变出一个手工布袋子，说要送我。我很感动，翻箱倒柜地找礼物回赠。

她离开后，我过不了自己的道德关，也抑不住好奇，用她的全名去搜社交平台，想看她残暴丈夫的长相。

她并不常发照片，只在半年前的一天，发了一张网络图片：户外，一个裸着上身的少女，背对镜头，前方是无尽的原野；天边弥漫着破晓时分的青蓝薄雾，远处原野深处，却是无尽的黑。

我看不出这是希望还是绝望。

过了约莫两个月，忽然收到她的短讯："Carrie，我要独自去香港旅行了。真兴奋，这可是我第一次去亚洲。对了，你提起过想拍摄家庭暴力题材的图片故事，建议你找相关的保护组织，他们或许有途径联系到肯出镜的人。"

最该找保护组织的不是我。

而这句话，我最终没有说。

道不清的“游客”妙妙

妙妙很不怯场，初次谋面，她已然像老相识一般跟我打招呼，Carrie前Carrie后地叫着。

同时期，在我家住着的还有一位荷兰沙发客，与我共处了几天，也算互相了解。妙妙进屋时，我正和荷兰妹子聊着工作轶事，妙妙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的对话，用中文问：“哎，Carrie，你每个月工资多少啊？”

荷兰沙发客虽听不懂，但觉得妙妙打断谈话的举动无礼，面色不悦。我也教育妙妙：“在西方国家，交情不深的朋友间，不问薪资、不问情感状况，这是对他人私生活最起码的尊重。”

妙妙听了，竟丝毫不觉难堪，还自言自语道：“澳大利亚工资一定很高，我怎么才能留下来呢……”

我悄悄打量她：厚重的粉底盖不住肌肤的纹路。她眼角的鱼尾和脖子的折层，都暗暗告诉我，这个女孩子在沙发请求里写的26岁是个虚伪的谎言。

入住我家已两天，妙妙却几乎不出门。只有傍晚饿了，她才去临近的超市买回一袋食材，洗煮一番，够吃几天。

我好心赠她地图，给她指路，告诉她悉尼哪里好玩。她却总提不起兴趣，没有游客的气息。

有时见她翻阅华人报刊，不看头条，不关注时事，只径直翻到末版，饶有兴致地细看招聘版面，还问我：“Carrie，你说我能在这里找

到工作吗？”

“你要是能找到合法工作，那最好；如果你去打黑工，那无异于给祖国丢脸。”我答复得毫无情面。

她竟不恼，还是嬉皮笑脸的模样，“那你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吧。”

我讽刺她，“男朋友？你连年龄都不老实相报，对方要是知道你撒谎，我脸面往哪搁。”

她还是笑，“嘻嘻，你就说我27岁左右嘛。”我气结。

妙妙自称是上海人。但听她夜里给母亲打电话，讲的分明不是上海话，我不全听得懂，也懒得去辨。

妙妙说她在国内的职业是经理助理，我诧异，“假期那么长？”

她支支吾吾，说是年假。又问她工作内容，她答不出细节，用别的话题敷衍我。

打断别人对话的习惯，妙妙一直改不掉。每次旁听我和荷兰姑娘聊天，听到一知半解的英语单词，妙妙立马来劲，插入对话，问我单词的意思。见她上进，一开始我还耐心讲解，后来被打断得多了，我也恼火，叫她自己去查词典。她不至于傻得看不懂脸色，打断的次数逐渐少了，只托着下巴，静静看我们聊天。

荷兰沙发客随和，大小事情一笑而过，性格讨喜，妙妙很喜欢她，但语言不通也叫她急得跳脚。

有一次我们三人夜聊，聊起中澳两国的职业观，我说差异大得很。澳大利亚重视技能，水电工、装修工等职业都有颇高收入。

妙妙抱怨国内薪水不理想，举了个例子：“幼儿园老师每月薪资不到两千，还得受气，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们都得捧在手心，稍有怠慢，都得罪家长。”哗啦啦甩出一筐细节来。

顿时，直觉告诉我，她的职业就是幼师，也不难解释长假的来由了——寒暑假。

才住下几天，妙妙爱上去夜店，常夜不归宿，大清早才一身酒气地回我家。

澳大利亚移民方式多样，其中一种是伴侣或配偶担保。如她是寻开心，我当然任她自由；但也担心她为了留在澳大利亚，就在酒吧里胡乱找个本地人做担保。

怕她受骗，我暗暗提醒她：想留在澳大利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回国学一门技能，补一下英语，过几年再来也不迟。

妙妙摊手：“英语？真是要我老命！技能？我哪有耐心学！”

我气不打一处来，训她：“你有想要的东西，却不为之努力，还看不到别人的努力。一腔虚荣，是没法给你带来好日子的。”

她竟又嬉皮笑脸，“说不准呢，万一我嫁了有钱人，嘻嘻……”

看她这样，我干脆不再干涉。但她夜不归宿的日子持续了一周多，我起了疑心，毕竟再爱泡酒吧的人，也不可能每天都去，精力可不是手机电池，插一根线就能充满。

一天清晨，在她如常带着酒气进门后，我站在门口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在夜场打黑工？”

她正歪着身子，褪去一只脚上的高跟鞋，被我的直接吓得一愣，鞋子砸落在地板上，“你，你知道啦？”

我呛她：“我又不是傻子。”实则，我真是傻子，免费招待她住宿两个多星期，才看出这位同胞是过来打黑工的。

可不知为何，看到她满脸化开的廉价妆容和眼里的疲惫与无奈，我忽然心软，只抛下一句：“小心中介，记得每天都要讨要工资。”

她在亚洲人经营的歌厅工作，客人多是华人。她向我抱怨客人灌她喝酒，小费也给得少。

我不出声，恨她持非法身份去工作。

她给我煮汤、烧菜，想讨好我。我不领情，只吃自己的食物。

她知道我看不起她，却并不沮丧，继续讨自己的生活，偶尔有对她感兴趣的客人，会在白日里带她逛悉尼大桥，去动物园看袋鼠。

我抑不住好奇，有时也想问她是否出卖身体，但细想之下，她每天一早就回家，应该只是陪客人唱歌喝酒。我总努力往好处去想她，尝试理解她的难处，却又忍不住，恨她不上进。

一夜，妙妙妈妈打来电话说家里水管漏水，妙妙便一直给物业打电话，语气低下，恳请对方上门免费修理。挂了电话，她往床上一瘫，无奈地叹气：“唉，修个管子，又得好几百。”

不久后一天，她说要搬走。那天，正值国内酷暑，她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嘱咐：“别不舍得开空调，一定要开，知道吗？”

过了很久，点进妙妙的朋友圈，发现她已回国。想是幼儿园开学了，她必须回去。

她最新的一则分享，是参加佛教徒聚会的照片，一袭白衣的她，素面朝天，和在悉尼夜里工作化着浓妆的她判若两人。

幼师、佛教徒、夜店陪唱，妙妙在这些身份之间转换，顾不得它们是别人眼中矛盾的存在。

悉尼街头熙熙攘攘。这座城市包容力无限，一条街道集聚了六大洲的人们，相安无事。

我家楼下有个在闹市铺睡袋玩智能手机的乞丐，我总想问他怎不去工作养活自己。直到一天，我见到三个年轻的南亚女孩赠他一大袋食物，女孩们满脸施舍的欣悦，而乞丐止不住地说谢谢，直到女孩们走远，他还呆呆地遥望她们背影。

习惯了二元思维的我，总要辨个对错，总要用自己的道德框架去审视他人的行为；后来渐渐明白，黑与白的中间还有一道灰，有些行为是难以定性的。若是理解了妙妙那复杂矛盾的真实人性，也就理解了人生的虚空。

圣诞夜，我家免费招待了15人

悉尼转眼入夏，圣诞期间的住宿价格也开始疯涨，市区一间12人混住的宿舍床位竟要150澳元。看到沙发请求越收越多，我想着干脆多接待一些人，只要他们不嫌我家小，一切好说。

_____伤透我心的柯娜

德国女生柯娜是在圣诞节前一天给我发沙发请求的。要知道，计划圣诞节来澳的沙发客，大多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发送请求了，像柯娜这种“最后一分钟请求”，多是没人乐意搭理的，何况圣诞期间，澳大利亚人都忙着和家人团聚，接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写：“Carrie，如果你拒绝了我，我可能就要睡大街了，因为所有住宿都订满了。”我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



我给沙发客们做饭吃，朱廉推荐来入住的沙发客给我带一包意面，旨在提醒我关于11包意面的噩梦

柯娜来的那天，正逢沙发客们和我坐在客厅聊天，大家一副慵懒悠然的模样。柯娜看了，居然抹起了泪，大家忙问怎么了。

她一个劲儿地说，这里是天堂啊！

原来，她是成千上万来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的欧洲人之一。持这种签证的多是年轻人，喜欢到农场、果园等地体验生活，顺便挣些旅费。但柯娜说，农场生活是非人般的，马来工头对他们进行欺压，交了介绍费却不给工作、扣压工资的情况很常见。

澳大利亚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农场非法剥削的事，我也有所耳闻，但听亲历者诉说，还是头一遭。

脑子一热，我对柯娜说，你被特批了，和我睡一间房吧，我家里的物品你随便用，不需咨询我。

自此后，柯娜与我就像是连体婴，只要我不工作时，我们都会结伴出游。

然而这份情谊的发展趋势大不如我所料。柯娜见我待她好，在家中举止越来越随心，霸占洗澡间一个小时是常有之事，其他沙发客一见她进浴室，就知道自己该去楼下健身房洗澡了。

她也喜欢轻易给人贴标签，家里招待的沙发客，她多半不喜欢，说这个闷骚，嫌那个多话。我也曾暗地里示意过她，人的性格有多样性，要多相处才好做出判断，她仍一意孤行。

最怕她夜里去酒吧。我家入楼门和进电梯都得用门卡，她去酒吧，把门卡给她，我不放心；大半夜让她按门铃，又怕吵着其他沙发客休息。干脆告诉她，快回家前联系我，我好下楼给她开门。

因而常有：凌晨2点，她给我发短信，说在回家路上；3点，说快回来了；4点，5点，6点……叮咚叮咚，她没信守承诺，还是按响了家里门铃。她也常喝得醉醺醺，一回来就开冰箱翻柜子找零食吃，噼里啪啦。

渐渐地，我们的关系跌至冰点。柯娜已记不起自己的客人身份，常给其他沙发客脸色看。她习惯在睡前把杯子带进卧室，却从不拿出去清洗，我提醒她，她把眉一撇：“怎么，你不想让我喝水吗？”

柯娜在我家中住了三周。走的那天，我送她坐车，抱了一抱。

随后把她沙发客页面拉黑，没留评价，算是最后的情谊。

决意从此不再相见了。

_____讨喜的莱拉

莱拉是荷兰人，也是个满世界乱跑的独行侠。

不同于同时期入住的欧洲小屁孩，莱拉已经30岁了。自打20多岁开始，她的每个生日，都在陌生国度度过，今年轮到了澳大利亚。

问她生日计划，她说要去跳伞。

果不食言，生日那天她起了个大早，去参加直升机跳伞团。陪同跳伞的教练，在400多米的高空问她，“怎么挑了个大风的日子？”莱拉边擦去被狂风吹出的哈喇子，边扯着嗓子喊：“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身后的教练问：“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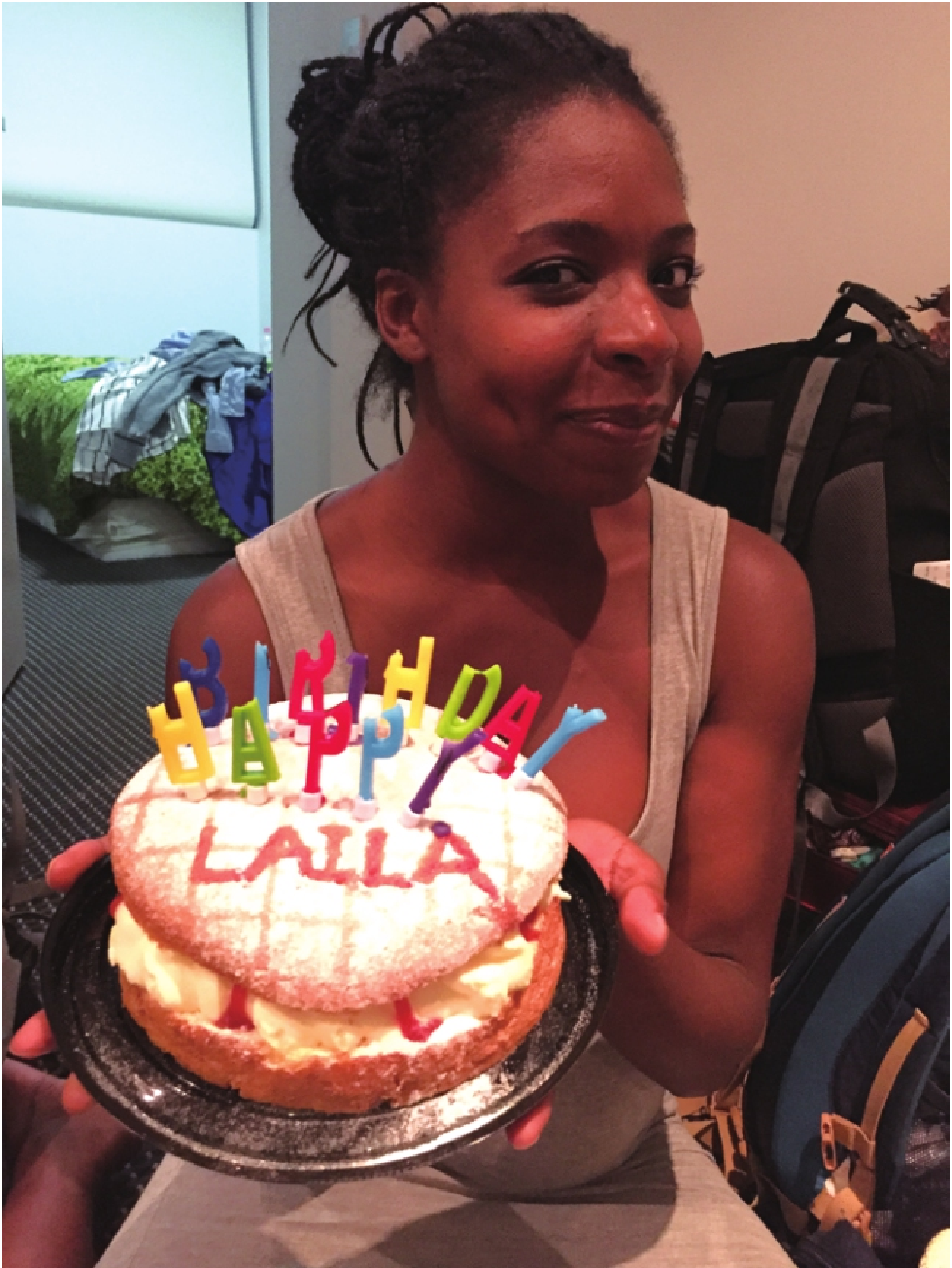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教练：“也是我的生日呀！”

莱拉惊喜，与他互祝生日快乐。高空里，教练打开了降落伞，在缓慢的自由落体里继续和莱拉聊。莱拉问他入行多久了，他喊：“两年了啊！”

以香蕉姿态滑行落地后，教练解去莱拉身上绳索，狡黠地笑，“其实哪有两年，你是我第一个客人。”吓得莱拉，回我家时腿还是软的。

莱拉是个很有智慧的女人，从聊天方式就能看出来——遇到观点不合的时候，莱拉并不尝试说服，多是虚心聆听，但她自己的观点也坚定如磐石。她总是默默地帮我做家务，把沙发客睡后的床铺好，把客厅垃圾桶清干净，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给莱拉准备的生日惊喜

在她生日这晚，我骗她说我在忙工作，让她回家给新来的沙发客开门。

黑灯瞎火的房间里，等待她的，却是躲在角落的我和十几位沙发客，还有我做的生日蛋糕。

这个惊喜成功得很，莱拉眼泪都蹦出来了，轮番拥抱每个人。

莱拉和柯娜，都曾给我留下极好的第一印象，也做过家中的至上宾客，但相处的结果却大有不同。

招待了这么多沙发客，也渐渐懂得，人的确是复杂的动物，情感和行为都没有能放之四海的准则，行善与作恶的界线细小得极易过界。如果仅靠第一印象，就能判断人品，那这个世界，也就简单得太没乐趣了。

_____半熟男孩教的一课

从圣诞夜之前开始，我就进入了疯狂接待状态，大门一直对找不到住宿的各国游客敞开。

当然，也不是来者不拒，自然也有自己的接收标准。英文请求写得流畅，就是基本标准之一——如果英文不好，很难与家中其他沙发客交流，还谈何沙发客精神。其他的标准，就完全视乎我的心情了，有时候，一个沙发客给我写了近千字的请求，我可能不回复；但有时，短短的几段文字，就会打动我的心，让我把家门敞开。

雅尼思却是个例外。

雅尼思是个19岁的瑞士男孩。

收到他的请求时，我瞥了眼他的年龄，只怕他跟此前留宿过的欧洲小青年一样，过于不羁，不叠被子不洗碗，没有太多人生经验可交流——年纪摆在眼前，我们总不能强求中学毕业的孩子有太多人生故事可说。

于是我把他拒绝了，给出的原因是：家里客人太多，没地儿睡了。

这家伙倒是机灵，回我说：没关系，我不挑剔，睡地上都不成问题，我有睡袋。

深知他作为旅人的不易，干脆准许了他的请求。

初见雅尼思时，我把架子挑得很高。

他虽刻意蓄了胡子，但反戴着的鸭舌帽和一身嘻哈装束，都彰显着这是个十足的半熟男孩。

他说，本来对中国知之甚少，但受我接待后，开始期待能去中国旅行，末尾却加了一句，“然而，不得不说，在对待动物方面，中国真是糟糕透顶。”

我的民族自尊一下涌上脑，驳斥他，“对待动物？你以为西方国家就真的讲究动物的权利？你有没有关注近两年，媒体对于新西兰农场虐待牛只的报道？新西兰可是出了名的友善国家，连他们都做不到人道放牧，凭什么就说中国糟糕透顶了？”

雅尼思噤声不语。

事后我回想，他不过是指出了一个部分存在的事实，我何须如此气急败坏。大国国民心态，就是要有纳得下诤言的包容，以及听得进建议的气度。我的表现，实在失礼。

他是个酷酷的小孩，玩滑板，也爱玩花式单车。

但偶尔，他酷过了头。

比如，聊情感关系时，他会抛一句“我是不婚主义者，我认为婚姻很愚蠢，比枷锁更残酷”；阳台有沙发客姑娘抽烟时，他会上前嘲笑“女性是通过香烟来彰显自己的独特吗”；聊业余爱好时，他会教育比他大9岁的德国女生“你该少喝点酒，多点自制力”，以致对方暴跳如雷，指着他说：“我28岁，不需要你这个19岁的娃娃来教我做人。”

我看在眼里，却没有藏在心里，毫无保留地教育他，“你太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很酷，但你只是个19岁的孩子，你需要结识更多的人、走更多的路，来做出更客观的判断。说话直接不是过错，但有选择性地不说，却是一门智慧。”

他不驳，只低低说了一句：“我想，我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只招待一两位沙发客时，他们或多或少地希望在情感或行为上讨好我，各自的相处融洽无碍；但招待一大帮人时，场面就失了控：用完餐不洗碗、起床后不整理床铺很常见，他们清楚，客人众多，我不会知道是谁偷了懒。

渐渐地，早上起床，我会看到雅尼思在替大家整理床铺，把他们用过的被单、床套全部拍打一遍后叠好，还会把家中的垃圾桶全部清空，把厨房擦得透亮，甚至见到快用完的烹饪调料，他也会购置添新。到了后来，新人入门，雅尼思都会迎上去，把家中结构和每个客人介绍一遍。

有时，家中仅我们两人，我会偷偷抱怨哪位沙发客不友好，原因是对方不怎么与众人交流。雅尼思却不置评，只说了句：“I don't judge.（我不会轻易给一个人下定论。）”

“Don't judge.”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日后不断地回想与自省，尝试着不再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世界上的其他人，更不再进行居高临下、优越感强烈的情感说教。

雅尼思没有让我失望。他离开的时候，没有舍不得，只笑笑对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善心的人。希望有缘再见，没缘的话，就祝你一切安好。”

那么淡，那么潇洒。

没丝毫做戏成分，这回的他，是真正的酷。

后记：人生岁月不哀戚，还有梦境与黎明

七年前，有出版社找到我，想把我在中东旅行的故事结集为书，我拒绝了，顾虑是：文笔不够格，资历不够格，精神不够格。即便是此刻，我的这份自知仍没改变。

可为何现在要成书了呢?

是因为，几年来，凡听过我写下的这些经历的朋友都很动容，这让我意识到，这些故事需要被传达，这些善良需要被获知，不然，我便是辜负了旅行中的种种运气。

这本书的写作技巧显得那么粗糙，但因着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它成了一本真诚的书。书里全数游记写于2011年至2015年间，接待沙发客的故事则是发生在2016年。中东、北非、东欧去了几回，第一次是在念大学时，后来几次在大学刚毕业时，因为靠的都是实习收入，这几趟旅行为了省旅费，睡过码头、车站，因为年轻，并没觉得苦。

南亚和中亚也是在大学毕业后去的。印度是从2012年开始，每年都会去一趟。美国、中南美洲国家和南极，则是在我工作了两年之后，趁开始新工作之前的空档去的。摩洛哥和南欧是最近的长途旅行了，那是在2015年春季。书中后半部分的旅途，因为有了工作积蓄做支撑，吃和住的条件好了许多，心智和心境也同初期旅行时不太一样了。

重审稿子，读到自己在中东凭一把小刀或一瓶胡椒喷雾就敢如此无畏时，真为自己捏了把汗。然而，我现在长大了，怕死，那些在你看来好也罢坏也罢的冒险、莽勇都不会再在我的人生里上演了。

我离开喀布尔后不久，阿里旅舍的老板法哈德成为阿富汗大选参选人的俄语、达利语翻译，伴随其参加各种电视辩论和采访，却因此遭到塔利班组织的威胁。他们声称，如果法哈德不停止他的这份工作，就会被砍掉头颅。法哈德没有惧怕，直到有一天塔利班组织差点将他绑架，他才决定逃离阿富汗，去俄罗斯求学。学成后，他通过中介去了欧洲，在挪威申请政治避难被拒，只好辗转到了德国，在难民营里待着。

一日，德国某电视台到难民营拍摄纪录片。在采访环节，上镜的法哈德竟被制片人相中，在德国电视台投资的影片里当上了演员，在剧组，他用6周时间学会了德文。然而不幸的是，他在德国也没有申请到政治避难，只好前往巴黎，等待新一轮的政治避难申请结果。

得知他的命运多舛，我正要安慰他，却发现他已把头像换成在埃菲尔铁塔前的留影，社交状态也改为“我爱巴黎”。多么乐观顽强的人，命运自会有优待他的一天。

从旅途回归到平实生活，好多故事都有了比故事本身更精彩的后续，而法哈德只是其中之一。

我有幸记录这些故事，得因于这些人：

我的父母、家人。读完这本书的你，一定感慨过我的父母该会是何等通达，才允许我这般东西南北地闯荡。的确，他们包容、开明，

二十多年来一直尊重我的选择，无论那是关于旅游目的地、 学业、职业，还是爱情。未来，带他们环游世界是我的人生计划。

湛江一中的语文老师陈华怀。在我的学生时代，陈老师给予我无数鼓励，甚至在我写错字时，他还会与我核对，说“我想，或许是你新创的词呢”。这种对创作的尊重督促着我，也才有了我后来的坚持写作。

前辈梁振涛先生。小时候，肉乎乎的外形给我带来不少嘲笑，那种自卑感萦绕了我整个童年，梁先生教会我不要去在乎他人对外貌的评判。只可惜他再也读不到肥妹这几年的成长经历了。

中信出版社的可可和本书责编雨薇。感谢可可对素未谋面的我的信任和推荐，她甚至在看到书封设计方案时感动哭了。而雨薇，尽管她删了书里几万字的章节而因此被称作本书的“后妈”，尽管在想书名时她曾开玩笑地提出“你花40块，看我到处high”，尽管我曾想打飞的去北京和她掰一架，我还是很喜欢她。

三毛。可能出乎你的想象，三毛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温柔的夜》，因为它曾陪我度过一个慌乱的雨夜。

更少不了这些挚友：麦子、阿咪、卡导、思思、小北、老崔、Emma Xu、Jessica Hu、Chris Yan、DL……还有好些名字，就不一一列出了，他们自会明白，所有的帮助我都不曾忘记。

旅行并没有让我的人生有大的改变，而它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只是偶尔生活遇到了瓶颈时，我会翻出衣柜里的行囊，开始幻想旅行的下一站。是的，无法免俗，旅行也成了我远离生活杂扰的方式。

好多年轻时认死的理，日后渐渐松懈。早年都是背包旅行，后来懒了，去近的国度便拉起了箱子。曾说过最爱住宿舍间，后来却忍不住住进了景观诱人的酒店。再后来，深明这些都是形式，而探寻和求知才是旅途目的；也坚持认为不是只有远行才能算作旅行，旅行可以是一种探索和求知的心态，也可以是一种好奇和无知的状态。如果你抱有这份好奇，家附近一条从未走过的小巷，都可以成为新的旅途。

有时我也懊恼，思索怎样在旅途中做些有意义的事，思来想去，还是因为能力有限，只能满足自己的快乐。做过的些微有意义的事，也许就是积累了百余个国家的人对中国或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吧，因书中篇幅有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我的微博里读到完整的图片故事。

江湖路长，有缘路上相见吧。



COOL
CHINA ES COMO
EL HOMBRE DE HOJALATA
CON LA PIEL DE ACERO
EN BUSCA DE UN
CORAZÓN
ISS.
The one child policy
is finally abandoned
How brittle to think
that the land we stand
on is filled with hollow
Promises and freedom lies.
TimHoWan



“外眼看中国”计划部分照片